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约翰·基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 约翰·基恩 著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John Keane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著　　者：[英] 约翰·基恩
译　　者：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责任编辑：冯韵文
封面设计：孙元明
责任校对：昆　鹏
责任印制：窦建中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125
字　　数：279 千字
版　　次：1999 年 2 月第 2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1—9600

ISBN 7-80050-326-7/D·74　　定价：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英）约翰·基恩著；刘利圭等译．
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050-326-7

Ⅰ．公… Ⅱ．①约… ②刘… 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研究 Ⅳ．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940 号

17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发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毋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基本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一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

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是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作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

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绪 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由于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必定要同时并进，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大大地暗淡了。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这种教条最有影响的版本，这种版本被用来为各种新式的官僚主义统治辩护，同时妨碍各种民主自治理论的更新。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卫民主其实就是为赢得对官僚主义国家机构的控制而斗争；利用这些机构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指挥能力；从而减少或取消私人资本的权力及其应负责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倾向无疑把国家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消亡”看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然而，政治权力暂时还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为了保护这些成就和未来的变革，防止“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报复行动，国家权力还是需要的。在反对这些抗拒分子时，官僚主义的国家会变成存在之物的临时保管人。国家通过保证投资、减少失业和扩大社会保险项目的再分配战略使自己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便能保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公正和平等。于是，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不受限制的生产和大量福利事业的时代便开始了。

这种预测认为，一种比较“民主的”秩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不仅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政策。由于负责实现民主的“均衡模式”（麦克弗森语），即接受传统的选择机制和有权威的政府……这些机制如保证

政党精英之间的竞争的定期选举、法治和立法机构独立等，国家便可以强化以民主名义实行的财产关系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深信这些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设想社会群体不会独立自主地作出政治判断；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扮演被动的公民角色，宁愿选择政治上的精英人物，后者则依靠争取选票获得决定权。这种**统制主义**的均衡民主模式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模式；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过分自信的观点，通过逐步扩大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网络就可以分期建成合作的和民主的社会。

在这种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假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程度。很不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和多元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与整个集体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决定都是由集体所有成员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那么，从某种规范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使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和倒退的）变化。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从前被公认是限制滥用职权的主要手段的民主，现在却变成了无自由权状态的伙伴，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

这里以一种简略方式描述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假设。然而，关于这些假设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却不能有丝毫怀疑。从它自己的政党组织圈子到它已经占领和扩大的国家机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大大地加快了当代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它促成了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分化，给个人和群体贴上了标签并加以限制，通过官僚主义的专业技巧强化了调节和安排生活的一整套制度。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

正在很快地不再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减退和变化以及关于国家官僚政治的争论所带来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保证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时代的目标比它的鼓吹者迄今所设想的更难达到，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

这至少是本书收集的这几篇论文的出发点。这些论文以突出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促进官僚主义化倾向的形式出现，确信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根据这些论文的观点，只要两个以上原先单独行动的个人聚集在一起探讨他们自己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已经和始终置身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一个公共领域便形成了。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结合，公共领域的成员们考虑他们要做什么，确定他们将如何在一起生活，推定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的估计限度内如何才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集体行动。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永远取消这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会像中世纪的农民失去公共土地那样引起严重的后果。支持这种信念的论据大部分来自20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的传统，尤其是马克斯·韦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克劳斯·奥费的著作，而这些论据又被三个互相联系的论点联系在一起。本书非常扼要地概括了这些论点。把这些论点放在一起考虑，可以被看成是对更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贡献，更确切地说，可以被看作重新考虑和说明以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初步尝试。

按照本书所介绍的第一个论点，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在晚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尤其是在它的北大西洋中心地带，例如美国、联

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官僚主义的合理性倾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些国家里，对人的管理会让位于对物的管理这个19世纪的希望正在得到实现，尽管是以一种完全颠倒了的和伪劣的形式。不仅是物，而且连人本身也都在受到形式繁多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管理和控制。这种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不仅限于工厂里劳资关系的变化。正像马克斯·韦伯首先令人信服地论证的，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正因为它是不完善的，所以在生产这一点上是会引起误解的；资本控制工资劳动者只是更广泛的和高度复杂的官僚主义化过程的一个实例。这一点的反证是，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不仅限于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机构已经到了越来越取决于它的运转方式的地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约翰·格雷斯和J.S. 穆勒等人首先提出的官僚主义就是由政府官员来管理的各种依据，现在都必须加以修改；**官僚主义**这个词再也不能被用来仅仅说明国家决策和管理过程的特点了。

诚然，要用这第一个论点的措词来表达，就要冒小看晚期资本主义政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区别的风险，反而强调它们的连续性。这些论文并不打算犯这种错误，因为它们强调，渗入和组织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强有力的官僚主义组织网络，并不完全忘掉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是严格区别晚期资本主义秩序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特征。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国家官僚机构力求规定、抚慰、有时则威胁从家庭到工厂、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由一个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受政党监督和支配的国家——所垄断，它的目的是要使除它以外的权力中心不可能发展起来。由主张政党形式的统治权而合法化的政治官僚主义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即使是充满危机的特点：它统治整个社会，

前提是使公共行动领域消失和受到限制。[1]

相反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消除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区别还没有成为现实；例如，由于资本家和国家官僚机构之间的一贯对立，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趋向于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社会机构和国家机构正在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正像希法亭等人早就指出过的，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是由"天生"自由的个人和遏止国家权力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盛行于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从人狱、交往和卫生到生产、教育、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这个论点的引导下，本书这些论文把注意力引向大多数现代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如何变得像学校、医院和监狱一样，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如何力求规定、监督和控制生活、健康和死亡。据观察，在大众传播领域里，电台、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新闻机构的领导人都在谋求严格规定供他们的公众消化的文化的类型和数量。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监督和纪律甚至可以把影响扩大到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

因此，正确的理解是，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威胁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

---

①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比起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这一点在乔治·康拉德的告诫中有生动的表述："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有自由。找别人谈话，不加掩饰，把秘密公开。你被秘密社团的领袖、部门的头头和副手所包围。最低级的官员为他的秘密感到自豪，甚至幼儿园里的小孩也学会留神他们说的话。在我们的地区里，革命者就是避开秘密的人。所以要把秘密公开、要朴实，要理解你的朋友最朴实的方面。……无论你是否自由，都会在下一分钟里作出决定。你可以在一个街角等公共汽车，在你的房间里等一个电话，在床上等一个梦"（《来自布达佩斯的信》，载于1981年11月5日《纽约书评》第19页）。

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其结果是，各种官僚机构正在使自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圈子，看来谁也不允许离开这个圈子。

这个包围的过程当然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保证合法地管理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的倾向。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二个论点是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据认为，所有官僚主义机构都倾向于对特权、任务和责任作出差别很大的安排，其基本组织原则之一是非政治化。这个论点完全不考虑自由主义理论的悠久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官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是由国家官员倾向于废除均衡民主的目的和方法而产生的。这种假设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官僚机构现在是靠受控制和盲目服从的国民兴旺起来的，他们承认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的正常性和必要性。公私官僚机构寄希望于它们逐步造成的非政治化，当然力求把它们的根子深深地扎进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去。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逐步变成日常工作机构。日常生活受到等级制机构网络的普遍影响，这些机构都由领导人、专业人员和专家顾问来管理，每一个机构都雇用法律顾问、保安人员和宣传人员，每一个机构都力图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变成争取达到这个机构的目标的可靠工具。根据这第二个论点，这就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官僚谋求在没有自下而上的讨论和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各种决定。有关机构的形式及其目标问题，倾向于通过命令主义的和形式上是合理的手段来决定。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主义机构都不仅依靠对声望和权威的崇拜——这是一切寡头统治的一个特点，官僚统治是寡头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对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专业化管理，使这些领域成为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非政治化对象的愿望。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从理论上为这种官僚主义从属关系的过程所进行的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已经尽人皆知。同时，可以

认为，为非政治化所进行的这些辩护已经产生了类似“形而上学的夸张”（古尔德纳语）的东西，这就是说，加强了无法逃避官僚主义命令的宿命论思想。本书的这些论文批判地讨论了这种夸张的许多例子：民主的“均衡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安全状态；公共生活概念的“重新封建化”；官方对“管理”居民的关心；传统的政治概念和早期自由主义合法权力理论的退化；最后是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论述的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非政治化“思想体系”大部分来自马克斯·韦伯，他对官僚主义的透彻分析在这里（论文二、四、七）被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严重妨碍。当然，把韦伯的观点包括在围绕着官僚主义统治的形而上学夸张之内，乍看起来似乎是苛刻的和令人误解的，因为他是打算驳斥无条件地盲目崇拜官僚主义的。他坚持认为，并非所有的活动和事情都能通过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规定和控制；抽象的和精打细算的官僚主义机构压制各种特殊的需要和活动，并且有步骤地引起政治目的感的丧失。不过，这些机构在技术上的优势保证了它们的不断扩张，这是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是不可缺少的进步。他断定，在当代的条件下，放弃争取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被动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

根据本书这些论文的观点，这个结论是很不令人信服的。韦伯为官僚主义的必要性所作的辩护有几个致命的弱点。这里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其中的两个，因为这两个弱点合起来不能不导致这样的结论：韦伯显然不能证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抵制官僚主义统治的“预期进展”。首先，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主义机构在技术上和行政管理上的熟练程度；他因此而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这些机构破坏它们自己要求有效地和按照专业的、表面上合理的规则履行职责的一贯倾向。第二个弱点与第一个不足之处联系在一起：韦伯没有分析官僚机构规定、管理一切现实并使之非政

治化的愿望如何有步骤地妨碍维护其下属机构的纪律。韦伯还毫不犹豫地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都必然是一种副业；他因此而严重地低估了官僚机构可能催化保卫独立自主民主讨论原则的权力斗争的程度。

对韦伯的这些指责是指导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三个论点的前提。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行政机关这部“没有生命的机器”不断地引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要求。在当代，民主的公众自由到处都被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所控制，这当然是事实；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落入官僚主义奴役怀抱中的全体居民被要求心甘情愿地崇拜或暗地里诅咒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行政管理、传播媒介和战争的人。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在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内部或相互之间不可能协调一致；这些机构的霸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奏效，而是依靠在行政管理上不断地玩弄花招和重新适应各种独立自主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对普遍地轻视公共生活表示惋惜往往是为时过早和夸张，因为任何地方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都倾向于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正像卢卡奇在反对韦伯时首先坚持认为的那样），而且成为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各种斗争的对象。这些斗争影响了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不断调整，而且增加了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得到发展的条件。这些反抗直接与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倡的统制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相矛盾。可以说，这些反抗在反对这种模式时也有晚期资本主义秩序所不能痛快地满足的新的需要和期望：对社会和国家范围内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

本书这些论文在为这第三个论点——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辩护时举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首先，某些薄弱环节、计划失误和其他不均衡状态都是由于公私机构不能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协调彼此的关系所引起的。正像奥费和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见论文三），在和

其他官僚机构一起行动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断压力下，官僚主义的精英人物通常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原则上拒绝在非正式基础上办事的做法。这些精英人物想通过非个人的和技术上成熟的运转规则治理他们的环境的愿望，与尽力乞求其他官僚机构和反对派运动的合作——例如通过阶级合作性质的决策办法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是矛盾的。其次，这种对官僚主义试图保证使全体居民非政治化的打算的横向限制，由于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类似困难而倾向于加强。这些机构试图悄悄地履行它们的职责而“不考虑特殊的人和环境”（韦伯语），与它们有邀请其本身的成员参与的义务是矛盾的。这种邀请过程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机构”不论什么时候都至少要依靠其成员的最低限度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官僚机构的非个性化运转方式不断地使其成员疏远并引起他们的积极反抗。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动态经常打断它们变成日常工作机构的趋势。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始终是脆弱的中介以及为信用和权力分配而斗争的结果。按一种自相矛盾的组织原则——非政治化——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地被迫邀请其成员和委托人积极参与，同时又压制他们的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公共领域——集合在一起的国民在其中发表意见、相互影响和独立自主地决定行动的方针——是各种官僚主义权力范围内不间断的、虽然不是故意的虚假相互承认过程的产物。国家和大公司机构必然不断地促使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变成仅仅是行政管理的对象。它们往往还由于假装接受通过争论、公开讨论、妥协和取得一致意见的办法调解利害冲突的原则，激发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需求。大公司和国家的各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所遇到的麻烦的基本根源是，它们必须保证得到其成员和委托人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支持——同时又不引起他们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干预。

在本书这些论文中分析了这种纪律和参与的辩证法的各种实

例：福利国家试图通过使“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和控制”的战略非政治化来满足各种社会要求（论文一），通过传播媒介鼓动和控制舆论（论文三和五），通过各种参与的办法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合理化（论文六），等等。这些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里所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正确的，即官僚主义机构既压制又鼓励独立自主的公众的成长，言下之意是增加使国家和大公司机构受到自下而上的检查、改造和监督的**可能性**。

这种民主的可能性当然引起对新问题和旧疑虑的反思，本书这些论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和疑虑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论文四提出了一些关于（青年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等人）通过恢复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和**实践**的区别来批判官僚主义合理性的尝试的局限性问题。在论文五中，批判性地论述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为“自由和有组织的交流”原则辩护的若干理论尝试的过分刻板的特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某些实质性特征——例如不服从、寻欢作乐和花言巧语——也被看成是任何似乎有理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所必需的主题。对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之间众所周知的争论的重新解释，在论文六中有助于把某些考虑集中在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和当代各种科技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上。最后，两篇论文（一和七）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的机构形式。无可否认，这两篇论文的结论还是初步的，但是它们指出，为保卫公共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不等于自发地取得一致意见的愿望，仿佛民主的社会主义不知何故能够避免一切政体都会遇到的争论、抵制和意外结局。实际上，从一种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被设想成一个把决策权分散到大多数公共领域中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政治**制度能保护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们的要求、调解它们的冲突和对抗时，才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反的，“公民社会”里的许许多多公共领域

（例如工人委员会、独立的保健中心、住房合作社和传播媒介）可以保持有效地检查和监督它们的政治代表的权力；这些政治权威反过来又会严格地为它们的管理活动向独立自主的公众负责。

应该强调的是，指导本书这些论文的三个论点——断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官僚主义的秩序，其瓦解和非政治化作用不断地刺激对立的公共领域的发展---具有一种典型理想的和很不成熟的性质。这些论点显然引起了许多问题，它们的术语和涵义并没有完全得到充分的解释或透彻的研究。正因为有这些空白，所以本书用一系列衔接的论文来介绍这些论点。这些论文的不完整和不连续可以提醒大家，这些有关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著作不能说已经提供了肯定的和毫不含糊的知识。这里所介绍的论点容许官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它们不接受试图把握住当前的“真实情况”以便选定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能够在技术上加以控制的对象。这里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宁可采取鼓吹者的姿态：它们临时提出的主张应该被理解为引玉之砖和进一步论证当前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民主可能性的各种发展的号召。

目　录

绪　论 …… 1

论文一　官僚主义及其不满：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 1

论文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 …… 27

论文三　一个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
理论的发展 …… 80

论文四　技术和实践：哈贝马斯早期重新提出的
政治概念…… 134

论文五　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组成部分…… 180

论文六　资本主义和创造性的破坏…… 240

论文七　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权力、合法性
和现代契约论的命运…… 284

论文一　官僚主义及其不满：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

设想公共生活——我们对此知之甚少——需要有一种几乎是孩子似的万能的感觉。

——亚历山大·克鲁奇

公共生活和危机

几年前，奥斯卡·尼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奇就提出过这样的论点：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通常是在以战争、投降、革命和反革命为标志的充满危机的历史阶段发展和兴旺起来的。由于一切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被一系列新的困境所折磨这个事实，所以这个论点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相当明显，这些困境已经引起了新的困难的选择、政治上的争论和社会斗争。这些争论和冲突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促使危机的形象扩散。因此，评论家们都异口同声地断言，一切经验的迹象都证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使人感到迷惑的是，危机竟意味着无数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且暂时把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危机可以出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从国际事务和种族关系的舞台到经济和最隐私的个人生活。危机已经变成头版新闻——官方言论和日常谈话用词中的一个基本

单词。

这种危机形象的扩散是不能被当作统治集团进行欺骗的结果来消除的。当然，关于危机必然性的轻率论说很容易变成大公司和国家行政官员手中的宝贵材料——但是这几乎和任何其他方面的常识及民众的幻想没有什么区别。必须强调的是，对危机的广泛谈论也包含着一种解放或空想的意思。这种谈论是思想上的，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隐喻：危机形象的轻率扩散既妨碍批判地、解释性地说明“客观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过程，又使人想起（从前也许被掩盖着）这些过程中的矛盾和中断——这些中断扩大了拒绝和主观地干预旧秩序的可能性。可以说，关于危机的种种讨论像一组复杂的叙述那样起作用，通过这些讨论，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既掩盖自己又暴露自己。而这些叙述又像一种物质力量那样起作用，影响它们所表达和宣布的这种制度。总之，紧张、冲突和灾难等形象的扩散通常有助于打破这些幼稚而乐观的信念：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谈到危机就必然要谈到社会和政治形态，这些形态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很容易引起恐慌和失望——同时也引起争取一个不同的、也许比较好的世界的希望和斗争。

在这些推论之后，必须进一步全面研究尼格特和克卢奇的提法，即涉及公共生活和危机的各种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实际上，他们的提法从一开始就只有通过仔细地重新考虑比较传统的危机概念的涵义才能讲得通。和现在随意提到的危机截然相反，这种传统的危机概念本身有两个互相关联和非常明确的主题。一种关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理论不能忽视这两个主题。首先，按照传统的概念，一个受危机威胁的过程是它的生命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是它的再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的转折点。甚至在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的日常主观性遭到损害的地方，也会达到这个转折点。危机过程背着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情地和“客观地”展开，

好像有它自己的生命。把它们看作理所当然和天生的态度会改变，它们正常的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至少暂时会瘫痪。

这种综合症在这个概念最初的医学涵义中讲得很清楚。例如，歌德的著名问题“一切变迁都是危机；危机[①]难道不是一种疾病？”只不过是重新提出古代希腊医生的一个共同课题。按照希波克拉底的见解，危机发生在疾病加剧、转变成其他疾病或完全好转的时候。在修昔底斯的著作中，这种理解的广泛影响十分明显。他对科孚岛革命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雅典流行了七八天的致命的瘟疫危机的著名述评，使人想到一种客观的、似乎是有传染性的过程，这种过程在病人身上引起种种症状，他的个性被打乱，他的正常活动能力被剥夺。在20世纪，这种涵义重新出现在葛兰西关于20年代的意大利的反省中：“危机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还不能诞生；在这个间歇中，出现许多种类的恶性症状。”

然而，危机并非都是致命的、恶性的和“客观的”过程。卢卡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以及（再举一个例子）库恩关于推翻和改变科学论述的分析，都正确地强调，危机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破坏和建设、令人不安的反常状态和干预旧的正常状态的过程。传统的危机概念包含第二种涵义，这种涵义在医学上的应用是含蓄的：危机的种种倾向——打断一个过程迄今一直存在的、人人都知道的连续性——都相当于Dämmerung（黄昏或破晓）。这些倾向预示一个再生产阶段的结束和恢复再生产或向新的、不熟悉的再生产突破的可能性。谈到充满危机的社会过程，这是指，那些已经成为系统瘫痪的人的正常态度的蜕变，既有利于扩大对这种客观瘫痪的认识，也有利于积极地克服这种瘫痪的种种尝试。危机的辩证的不连续性倾向于产生它自身的“另一面”，而且从而产

① 危机一词在医学上指病情或好转或恶化的转变期。——译者

生它消退的一个条件——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的主体。悲剧的传统——险象环生的危机时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把这种意义上的危机作为向自由的主观性重新反对命运之神的表面权力提供丰富可能性的时刻的例子。因此，这样来理解的危机（Kpísis，来自Kpínein这个词，意思是“决定”、“选择”）就是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决定和贯彻不同行动方针的时刻。

在现代世界上，重新有力地提出这种涵义的是卢梭。他确信欧洲的统治者们正在一致盲目地加速命中注定的革命的到来，这也是他希望能够通过政治干预来改造现代社会的根据。

> 你们依靠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这种秩序本身容易发生不可测知的变化。……是不是命运之神的打击很少，所以你们可以指望她的打击产生免疫力？危机正在接近，我们正处于一场革命的边缘。谁能担保你们的命运？人类可以摧毁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唯有大自然的特点是抹煞不了的，但是大自然既不创造王公贵族，也不创造富人。

按照卢梭的看法，把（潜在的）公民塑造成商品、财产和“可以使用的工具”的交换关系的普遍胜利已经达到了极限。即将来临的危机会威胁到市民社会及其国家的志愿奴役，从而增加公民可以按照他们的真正自我的形象在政治上改造他们自身的可能性。

由于危机被理解为连续性中断的时刻，这时暂时受到限制的人们可以考虑并重新坚持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克服危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正常过程。卢梭坚持认为，理论分析是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这种看法现在仍然有效。正像以下几篇论文所证明的，从比较原始的实证主义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有关于危机的中性解释。分析危机的倾向就是接受辩护者的角色，就是推测成功地克服或避免危机的可能性和合意性。技术官僚对危机的分析

——例如威纳和卡恩的《危机与军备控制》——十分符合这个准则。在这里，危机被说成是一系列事件和行动的转折点，它的不确定性加速减少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控制。据认为，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只有通过自上而下地改组社会及其国家才能克服。一种解放的、关于危机倾向的政治理论与这类技术专家的公式的镇压意图完全相反。在批判地说明那些客观的、结构上的对抗性——当前正阻碍着说话、劳动和行动的主体的政治解放——的同时，试图促进从历史上来说是新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的发展。

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消费不足、比例失调）中，传统的危机观念的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涵义（瘫痪的时刻和通过斗争可以复原的时刻）是十分明显的。卡尔·科尔什力求按欧洲革命前景的光明与暗淡来划分马克思写作的时期，这有助于解释这种危机理论。科尔什认为，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前，马克思的公式表达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会在主观上插手按共产主义的设想彻底改造欧洲资本主义的真正可能性。这个阶段的理论顶峰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宣言》的论点："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就是一个通过活的劳动力的斗争不断地改造人类和大自然的过程。

过了这第一个阶段，从《工资劳动和资本》开始，马克思著作的理论重点便转向客观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反对对软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探索自觉的无产阶级干预的先决条件。现在看来，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制度性框架的破裂——通过其肯定性不亚于即将来临的革命本身的危机倾向——才有可能发动革命。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出的警告成为这个阶段的标志和对过去及现在的客观主义说明。社会的历史被理解为物质生产的历史和物质力量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阶段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的"社会关系总和"似乎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的。那些在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变成了物化经济范畴的化身，创造出那些在“铁的必然性”的标记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紧迫性下起作用的运动规律的客体。按照《新莱茵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观主义公式必须修改和补充：“鉴于目前的普遍繁荣……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不可能的。新的革命只有作为新的危机的结果才是可能的，但是新的革命就像即将来临的危机一样肯定。”

福利国家的瓦解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及其坚定的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最大障碍的资本本身）当然在整个第二和第三国际期间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然而，这种理论是否继续有效却很成问题。实际上，以抽象的方式在形式上恢复这种理论的尝试（见尼科斯·普兰查斯早期的论文《关于危机的概念》），或者比较刻板地恢复这种理论的尝试（例如在有关德国 Staatsableitung〔国家领导〕的争论的某些论文中），对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理论来说十分重要，但受到紧迫的和新的政治发展的欺骗。这种曾经使许多人感到吃惊的发展的轨迹正在变得多少有点人所共知：福利国家的瓦解及其党政领导人在大选中的普遍失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把 30 年代不景气的、充满冲突的政治经济转变为战后世界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的繁荣的计划，已经陷于绝境。正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福利国家在政治上的胜利已经变成肯定的失败。福利国家所引起的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它现在通过官僚主义管理手段所能解决的范围。有利的经济增长的条件至少已经暂时遭到破坏；福利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出人意外的是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之后不久。福利国家的历史显然已经中断。70 年代中期，当英国工党采纳了束紧裤带的建议并制定了一个紧缩国家开支计划的时候，

当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执政44年后在大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整整一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当前的种种争论，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个时期的明显自信和乐观主义的舆论形成对照。当时，至少统治集团内部认为，福利国家—社会民主计划的永久胜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一个世纪各种有利于俾斯麦所说的“工人阶级福利的实际增长”的斗争终于有了结果。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进步似乎肯定是当时各种自然趋势的组成部分。这种一度充满自信的计划——它正式承认集体的政治权利和工会的权力，以及由官方支持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和提供更多社会保险等政策——至少显示出五个紧密相关的主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这些主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主题表明，福利国家的计划有某些固有的弱点——从而也表明，福利国家当前所处的困境有其内在的根源。

第一，面对革命的社会党人和传统的自由党人的反对，福利国家的鼓吹者们强调通过国家监督保持社会安定这项原则的重要性。这项原则往往用通过国家赋予的权利使机会更加均等这种说法来明确表达。从不劳而获的经济特权派生出来的不平等是当代社会的一大污点。与这种特权相反，福利国家要变成现状的看管者，使自己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从而有可能实现一种没有阶级、兄弟般合作的生活方式这个最终目标。在追求这个（往往不太明确的）目标时，福利国家会重新分配各种报酬和特权，以便尽量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公正和使机会均等。这种社会安定和重新分配的战略是对现有的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人人机会均等将得到由社会提供和国家担保的平均主义措施的促进，某些人或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好处。这些观点认为，财产、权力和地位的公正和平等分配需要同工同酬。按照这种工作原则，财产、权力和地位的分配理应取决于个人和群体的工作

与技能。这种计划容许各种工作的收入可以不平等。然而，据说个人和群体从此以后会彼此分开，不完全是由于财富和出身的不同，而也许是由于“特点”的不同。按照由官僚机构保证的机会均等原则，(财富、权力和地位等方面的）最高报酬可以合法地给予那些为“进步”和“国家繁荣”贡献技能或服务最多的人。

第二，重申反对阶级特权的社会控制和机会均等，被看作是随着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积累而来的事。就这一点而言，教科书把福利国家描写成每个个人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教育的保证者是使人误解的。诚然，依赖官僚主义合作活动的程度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福利国家辩护人内部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国防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合作农业综合企业、利用政府担保的外债的工业，以及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与发展，都从一开始就不相称地（实际上是大量地）耗费福利国家的资金。为这种“合作偏见”辩护，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福利国家的捍卫者们除了（非常使人误解地）声称，刺激本国资本主义的增长可以间接地有助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还坚持认为：①在居民中有一种已经固定的期待，希望不断地提高自行决定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且因为他们决心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和资本实现“电视机一电冰箱文明”（克罗斯兰语），所以政府必须适当地考虑他们的愿望；②为再分配和福利计划——减轻困难和压力——以及社会资本方案（建设医院、精神病院和学校等等）提供资金，至少在短期内还要依靠这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税收；③消灭阶级统治不再是生产资料的革命性社会化的同义语。例如，按照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由于最近的一些发展，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它指挥一切的社会地位。这些发展包括，国家活动和国有化工业的普遍扩大，有组织的劳工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讨价还价能力的日益增加，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日益分家，以及由于公司的规模日益扩大和技术日益复

杂而引起的科技知识的力量的加强。这些发展标志着这样一个时代的结束：利润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又积累在富裕的资产阶级个人手中。按照福利国家的许多支持者的看法，私人资本主义部门所产生的利润现在倾向于被用来重新投资于生产。利润已经变成集体资本积累的源泉。反过来说，刺激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比较平等和公正地分配财产和收入的必要和可取的条件。威格福斯的忠告成了战后所有福利国家的鼓吹者的格言："必须先生产才有东西可分配。"

第三，私人操纵的资本主义积累将通过官僚主义国家的行动得到鼓励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与作为令人向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媒介的商品化战略（市场竞争）相反，福利国家计划的捍卫者坚持认为，官僚主义国家的权力可以限制这种资本主义机制充满危机和不为社会所向往的种种努力。国家通过各种分配和生产政策，可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公共福利的私人资助者，而不改变私人财产本身的法律地位。在这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和"被动国家"的批评受到了注意。福利主义者声称，好的社会并不是自私的个人在经济、政治组织和家庭生活等领域里掌握并任意行使他们天赋的自由权的社会。迄今为止，这种安排形式一直占上风。然而这种安排形式决没有在私人和广大公众之间产生和谐。从前对利己行为的依赖也不一定是有见识的。

因此，福利主义者建议，国家的议事日程应该修改和扩大。"积极的、负责的"官僚主义国家从今以后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的"指导性智慧"（凯恩斯语）。与此同时，私人的积极性和事业也不应该受到妨碍。在政府坚定有益的指导下，各个群体、阶级、地区和个人可以更充分地为真正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可以减轻甚至完全抛弃个人贪婪和自私的旧包袱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不合理性。据认为，国家可以任意使很大一部分从战略上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决定服从审慎的行政控制。"交换价值"和过分不受

拘束的市场关系时代由此将宣告结束，或者至少被国家干涉主义的“福利价值”原则所抵消。消除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将有可能取得进展——通过许多旨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改变方向，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加快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将包括保持价格稳定、国家收支有盈余以及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本，主要通过旨在在广泛的范围内确定总产出在消费、投资、出口和社会费用之间的分配的财政政策；对富人不劳而获的收入课以重税（通过遗产税、资本收益税和公司税）；扩大起标兵作用的公营企业；推广各种形式的“非商品化”集体消费（例如标准化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以减少公私供应之间的质量差距。通过官僚机构制定的这些（和其他）政策，福利国家的辩护人预见到，某些人在人人都有面包吃以前吃蛋糕的事将一去不复返。“社会性”、充分就业、大量福利性服务和普遍和谐的时代便可以开始了。

第四，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计划使自己在温和的改良主义传统中牢牢地扎下了根。福利国家的鼓吹者们反对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正规民主程序的效力和合法性的矛盾态度，深信能够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而他们的胜利可以为福利国家计划争取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正因为历史似乎对他们有利，所以福利主义者坚决主张通过和平的和现实主义的改良来达到采取鼓励性行动和建设更加侧重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与他们的统制经济相一致，这些改良要由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尤其要得到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走向更加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实际的、渐进的和审慎的过程。福利国家的拥护者坚持认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社会不公正、集体不满的表现、社会低效率和浪费人才还依然存在。不过，在法律管辖和定期选举的范围内，和平改良迄今为止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公正和人道的社会。这些已经给人以深刻印象和不可逆转的成就减少了一度对施粥所、失业救济和反饥饿游行的抱怨，平息了过去要求

罢工和关闭工厂的忿怒呼声。通过国家保证的机会均等，进一步巩固社会安定只是一个时间、耐心和民众自愿重新选举赞成福利国家的政府的问题。

最后，一种比较“民主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尽管他们的统制经济遭到广泛的（而且完全有理由的）怀疑，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们还是虔诚地相信形式民主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它们的民主性质几乎总是说不清——往往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机制。这些机制通常包括：通过充分就业增加体力劳动者的特权和权力，扩大管理部门和工会之间比较开明的共同协商机构（所谓的高层次工业民主），以及集体增产奖金计划；更加名副其实地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便利；把某些决策权下放给私人和准国家机构的“阶级合作”；保留立法机关、政党制度和正规法律的[illegible]保存受到珍视的政治传统和“民族特点”；善意地制定“[illegible]的”社会立法（给艺术提供更多资金，限制较少的酒类销售法[illegible]改革重查制度和有关性的立法，等等）。福利国家计划必然会把[illegible]国家和准国家的官僚机构网扩大到公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一[illegible]点似乎不成问题。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合作就可以导致民主[illegible]社会契约，把提供物质保证和社会监督与控制的机制[illegible]结合起来，这是令人欢迎的“一个长期过程的顶点，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已经被驯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民主的原则”。

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这种过于自信的设想已经开始显得有点奇怪和陌生了。促使福利国家计划逐步消失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不能轻易地通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识别。此外，个人、群体、地区和国家感受到这些因素的强烈程度也大不相同。最后，其中的某些因素无疑是特定国家或地区所独有的。英国经济的严重非工业化，美国政治经济决定性地日益依赖武器生产，早期在瑞典围绕着核力量的斗争，都是这种特性的例子。

不过，所有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至少有两类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由来已久的紧张状态。这些困境都是福利国家计划破产的根源。首先，战后的大规模资本投资和积累已经明显地让位于（公认是不平衡的）停滞。这种战后的繁荣是由（除其他因素以外的）战争、在政治上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尤其是劳工运动提出的）、美国对世界的统治以及福利国家的反周期性稳定和增长的政策所造成的。相反，新的经济形势已经给福利国家计划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际经济形势现在至少表现出3种内在的困难。第一种困难是对利润率的不规则威胁，这种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有组织劳工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寡头资本利用其定价权取得补偿的企图。这种威胁具有明显的打乱投资的效果，而打乱投资又成了增加通货膨胀率、结构性失业、贸易不平衡、金融市场不稳定以及国家打算恢复赢利条件的种种（自相矛盾的）尝试（刺激增长、工资指数化、签订社会契约、控制货币发行量等等）的同义语。第二种困难是，迄今为止未能满足为实现一种“全面的凯恩斯主义”——即类似由国家全面协调公司投资之类的东西——所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同时受到日益相互依赖和合理化、但仍要通过竞争中的民族国家的过时政策来调节的世界经济的鼓励和限制。这种失误由于福利国家计划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现在似乎比从前更不能依靠美国的主要协调作用而更加严重。这种不稳定化过程的象征是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争叫嚣和新型的国际军事紧张局势。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第三个问题是跨国公司普遍逃避国家控制，它们的投资和销售方针肯定使上述两种困难加剧。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正在迫使各公司全面调整它们的生产。这种变化的标志包括，加速把以出口为主的生产转移到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转移到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传统的生产基地和生产形式范围内加速实行合理化方针（有时遇到有组织劳工的极力反对）。

福利国家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卷入第一类困难与第二类困难有关：国家决策的类型更加混乱。在本世纪内，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所有国家显然和经济过程及社会生活过程严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任何认为福利国家是“上层建筑”的讨论（对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都模糊了福利国家的运转方式、这些国家的新危机倾向以及它们在采取各种新的统治形式时大大地扩大了的作用等问题。事实上，继续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外部劳资斗争来说明福利国家的理论倾向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些斗争（和其他斗争）不仅在国家的层次上一决雌雄，而且已经由国家来调停和缓和。福利国家计划的必然结果是，积累过程和一般的社会生活逐步变成了有组织政治斗争的职能和处理国家危机的官僚主义形式。

然而，福利国家的鼓吹者们所支持的扩大官僚主义国家的权力决不是没有人反对。尤其是在来自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压力下，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显然比福利国家的捍卫者所设想的更难实现。福利国家不能成为社会安宁无可争议的根源。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主张福利国家的人曾经认为，更高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分散权力、改善劳资关系和提高就业率不会取决于大规模改变现有的占有和控制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他们估计，为社会使用所进行的生产和为有利可图的交换所进行的商品化生产现在会广泛地一致起来。余下的种种不一致可以通过福利国家的意志力得到纠正，而福利国家的“政治偿付能力”则可以由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来保证。

在投资不活跃的新条件下，福利国家显然不能重新分配财富而不反过来影响对劳动、储蓄、革新和冒风险的种种刺激。相反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结构性压力显然使福利国家不知所措。谈论“财政危机”、“失控”和“超负荷”恰恰意味着，国家的“合法性”和“积累职能”之间现在不可能达到某种平衡

（奥康纳语）。在政治制度的许多机构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倾向冲突类型。尤其是，正像当代许多选举所证明的那样，国家政策隐含的目标和公开宣布的目标之间的新冲突倾向于公开化。这种冲突的局面过去一直是隐含在福利国家计划内的，现在则公开采取下述形式：一方面，政府应该完成一切合法的任务（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各种形式的集体消费，坚持社会控制），而不破坏一般的积累过程和特殊的资本主义利润收益及“商业信用”（卡莱茨基语）；另一方面，政府要继续依靠这些积累过程（作为税收、就业政策、制订计划的信息和合法性等等的来源）。国家政策不得不既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又削弱和抵制其影响。在国际经济体系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压力下，至少有 3 种观点对国家政策内部的这种冲突表示怀疑。我们将在下文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些观点。有些人（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批评福利国家妨碍和忽视自由的私人企业；另一些人（阶级合作主义的鼓吹者）指责这种国家高度无能，因此需要改组；但是还有一些人（那些参加新社会运动的人）则批评福利国家实际上没有实践其民主诺言和谋福利的责任。

下面几篇关于公共生活和官僚主义统治的论文力求批判地讨论这种争论。这些论文的基本论点是，这些批评——福利国家当前的内部困难和未能按诺言运转的种种征兆——已经毫无疑问地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性质。这种关于官僚主义组织和计划的长处和局限性的争论的征兆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能概括地说一下。例如，这些征兆包括对民主政府受到腐蚀的关心；“超负荷”和“失控”理论的流行；对专门执行社会政策的机构独裁主义地调节日常生活的批评；以及对削减生产、建立自由市场和减少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普遍要求。这种关于官僚主义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表明，与官僚主义的拥护者们所说的相反，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计划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结局。正因为福利国

家不知不觉地引起的争论以及政治和社会冲突，福利国家必然被看成是一种很不稳定的过渡形式，一种充满危机的权力关系复合体，它的未来形式现在还不能确定。再回到危机分析的术语上来：当代福利国家计划已经到了一个大概是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一个间断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它的再生能力至少已经暂时下降。福利国家计划的这种混乱也和用反对旧道德的种种干预消除和克服这种混乱的积极尝试相一致。

新的自由主义

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有3种相互矛盾的干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干预方式至少暂时已经掌握了反对福利国家计划的主动权，使福利国家计划的官僚主义性质无法确定——当然是在很不相同的程度上。按照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看法，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肯定在妨碍和限制着自由的私人企业。尽管出于好意，福利主义者还是被说成在个人周围建立了一个国家高压统治制度——一种官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为另一个人的意志服务，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别人的目的”。

明显地和这种广泛的国家干涉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断定自己是被看作任何政治安排的首要（和不言而喻的）目标——抽象的、专为自己打算的（并不总是合理的）个人的自由——的保卫者。在经济生产和交换的领域——一个涉及任何社会秩序的“基本问题”（弗里德曼语）的领域——里，这种自由是在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关系中和通过这些关系来最大限度地获得的。不像由福利国家或工会组成的集中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体制，商品化关系的价格和利润机制保证了竞争、冒风险、有纪律的劳动、革新精神、尤其是自力更生和隐名合作的“自由”。竞争性的交换过程被描绘

成真正自愿的安排。在这种过程中，私人或私营公司据说是最终签订合同的一方，始终享有不参加任何特殊的合同或交换的自由。（当然，新的自由主义纲要认为根本不参加商品交换的自由是不合理的。这种纲要同样忽视这样一些情况：某些人——从暂时失业的劳动力到永远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在多方面的制度压力下被强迫排除在"自由竞争"之外。最后，寡头资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地位得到了原谅。）这种生产和消费领域里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即个人不受国家权力任意摆布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据说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促进政治上的自由，正是因为它把经济上的权力和政治上的权力分离开来，并使两者互相抵消。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这种主张"改变"福利主义对官僚主义国家行为的绝对必要性和合意性的信念。它坚决地认为，福利国家计划已经加快了官僚主义农奴制时代的到来。从家庭到工作和闲暇，日常生活的几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避免国家行政官员和计划制订者试图实行的"有意识控制"。福利国家"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表现出通过扶植它的福利国家逐步成长和把它的影响从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的倾向"。

和这种国家干涉主义（部分地）相反的是，新自由主义坚决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都能够通过重新肯定商品化文明社会的界线和反对国家的蚕食来获得。自由企业、私人保健服务、自费教育和集体服务事业有选择地"重新商品化"，都是真正的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的决定性条件。这种论点准确地强调，福利国家政策从来没有明确地为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服务。在福利国家制订计划的活动和公司官僚机构之间的某些不调和中，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不是有意的发展（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存在的理由）。新自由主义的诊断并不完全使人误入歧途。福利国家由于日益垄断社会政策的制订和日益从应付各种总需求（例如通过"雷恩模式"的充分就业政策减少劳动力流通的阻塞，排挤效益不

高的公司）转向比较具体地直接干预商品化的过程，已经打破或改变了作为分配商品需求和供应的主要手段的价格利润机制。国家无视这种手段，引起了永久性的预算赤字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得到它的肯定行动认可的新需求。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赤字和需求逐步破坏福利国家的社会控制目标。政治分化和社会分化加剧了。国家成了它在正式承认工会的权力和肯定国家监督与集体权利原则时无意中引起的新需求和社会不满（涉及核力量和失业等等）的对象。

和这些原则相反，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从今以后，政府只能垄断和监督那些不能通过自愿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来指挥（或者只有付出极大代价才能指挥）的事。国家原则上应该是一种强大的（不一定是最小的）管辖、裁决和强制手段，为参加“自发合作”的契约双方的自由市场服务。新自由主义补充说，这种监督还应该加上有权威的规范（例如那些与家长制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些规范是“不加思索地接受的风俗习惯无意中形成的结果”；加上某些被指定来管理有心理缺陷者的社会政策机构；再加上家长制家庭、学校和教会这样的自愿联合。在预见到通过强大的、有纪律的国家和自由市场使自由得到复兴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指出自由的敌人是：官僚主义、滥施福利、没收性税收负担、公营企业和所有被看成是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移民、工会会员、骗取福利者、学生和女权主义者。

一种新的阶级合作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为卖方控制市场的竞争性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不同，那些为用新阶级合作主义办法来解决福利国家当前困难辩护的人的争论倾向于集中在官僚主义的国家及其无意中带来的后果上。他们的问题并不涉及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是否必须由

官僚主义的国家来管理，而是涉及官僚主义的国家及其政策如何才能重新稳定下来。他们强调，“有组织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现在经常受到一定的离心倾向的影响，因此急需进行内部的革新和改组。这种离心倾向往往和昔日那种幸福而且甜蜜的（当然也是虚构的）安宁形成对照。他们习惯地提到，在福利国家的时代，政府负责的事务已经迅速增加。福利国家已经变成一种“阶级合作主义的”国家、社会秩序和控制的体现者。国家由于制定各种社会政策和生产措施并规定各基本利益集团（主要是寡头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磋商方案，所以越来越被选民们看成是为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风险提供保险的无限责任保险公司。

据说这就是当前福利国家危机倾向的根源。新阶级合作主义者们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对福利国家的各种需求加速增长，而福利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恰恰在逐步下降。“政府的分配职能”（德·儒弗内尔语）——通过税收、开支和保险等政策调拨和分配资金，再加上对商品化过程的直接干预——的负担太重了。在这里，新阶级合作主义的鼓吹者准确地使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国家不是一个先验地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各种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的主体。相反的，正像臭名昭著的巫师成了他自己的权力的牺牲品那样，福利国家已经引起了误解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收入政策和教育计划等方面的）技术性失误，并且正在受到过量需求和拒绝合作的运动的包围。

新阶级合作主义者们对这些失误作出他们自己的解释：资金短缺；公民的不顺从和/或不关心（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很少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国家的“惰性许诺”（即仿佛传统势力似的保存下来的陈旧的公共政策计划）所引起的财政问题；尤其是逐步扩大的权力和责任关系网日益复杂，国家官僚机构陷入了这个网中——而且变得更加脆弱。按照新阶级合作主义者们的看法，有一种倾向是机构不仅更加庞大，而且效率更加低下，官僚主义的

计划明显地不灵活，各种施政纲领互相矛盾，等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膨胀使效率降低是可以料到的，因为需要协调更庞杂的官僚主义机构。据说，就这个范围来说，为协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已经不能依靠一种可以用来控制单纯行政活动的投入产出的共同标准（例如货币）。

对这些不合理性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提出严厉的警告。据认为，政府可能变成“轮流执政”，结果是它的社会控制职能可能不可弥补地被超政治的争权夺利者们打乱。由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似乎是不可逆转的（比较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公民社会两重性的重新肯定），所以这些不合理性只有在政府不那么优柔寡断时才能避免。政府必须缩小和减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有责任予以满足的社会需求的范围和数量。新阶级合作主义战略辩护人的语言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主义的语言。他们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改变、控制和引导它本身的复杂机构，以便成功地把资金转用于今后能生产出更加符合计划内政策义务的产品的计划。“避免失控的危机首先意味着避免明显的政策失误所引起的失望、挫折和不满。”按照新阶级合作主义者的观点，福利国家设想使公民的权利从法律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这种设想引人注目地扩散已经使国家的活动呈指数性增加——以致“大政府”的规模本身就妨碍它有效地和专横地运转。国家不仅不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且由于使对公平的要求民主化，它也引起了新的期待，这些期待变得就像需要官僚机构去解决的新问题一样多。福利国家必然使民众增加了不能得到满足的愿望，因此，福利国家加深了相对的剥夺在它的委托人中间的含义。

新阶级合作主义者反对福利国家计划，因此比较直率地建议采取使邻居贫穷的解决办法。成比例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合乎愿望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必须从政府的权限内“解除”某些迄今为止一直想当然是政府的职能（例如“不必要的”福利服务）。必

须放松诸如政党和责任内阁之间的竞争之类的原则（进一步减少立法机关对决策程序业已削弱的影响）。此外，其他国家职能应该（至少部分地）移交给非政府机构（例如自愿的社会服务组织和商业，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移交给有组织的劳工）。官僚主义的国家首先应该放弃民主的招牌并减少期待。国家必须宣传克制的原则：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应该学会少向政府提出要求，政治家们应该不时地作出不得人心的决定，工会领袖们应该学会避免提出强硬的要求。新阶级合作主义的鼓吹者们通常坚持认为，国家在民主的压力下发展已经包含着委托人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承认各种利益集团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基层群众运动。尽管这些集团的制度化参与似乎增加了国家的适应性和合法性，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制度化参与者很容易变成否决集团，从而限制政府的办事效率。“过分的民主”直接促使官僚主义机构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在不满意的委托人中间“引起混乱”（亨廷顿语）。

新阶级合作主义的论述必然对福利国家计划使之长期存在的现有的（和突出的）权力不平等保持沉默，似乎那些已经不能接近国家和合作权力的人（例如那些依靠福利和抚恤金生活的人；土著和移民；妇女和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的农村、城市和民族地区的人民）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是在行政官员、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等专业人员的监视下。新阶级合作主义的格言显然是：将来再给那些现在已经有了的人。

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

新阶级合作主义的格言引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什么原则或标准分配（国家计划制订者、可靠的工会和寡头垄断公司的）权力、财富和权威等方面已经规定的特权？为什么要审查某些集团和个人而不是其他集团和个人的各种需要？新阶级合作主

义关于改组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威的结合的建议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这种困扰是所有新阶级合作主义的比例平等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即这些理论的详细纲要不能提出使人非信不可的理由授予某些特权集团作出实际上是比较全面的政府决定的权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大量独立自主的、可能是民主的运动所提出的种种激进要求突出了这个决定性的缺陷。与新自由主义和新阶级合作主义相反，这些运动批评福利国家政府无能和浪费、一贯依赖资本的力量、必然不能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在制定各种政策时限制民众的民主积极性。随着福利国家计划的危机倾向而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关于权力和民主问题的争论正在重新成为所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论题。当然，福利国家政策依然得到许多委托人的支持，认为这种政策是有益的、有成效的和人道的。福利国家计划的“政府至上”（富科语）以及由于能够使一切都受到严格控制和综合调节而有利于生活的自我表现还没有被有效地破除。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政府至上相反的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已经产生了麻木不仁和内心的失望，不参与或主观上不关心有组织的党派政治是麻木不仁和失望最明显的特征。尤其是在和继续断言国家有责任缩小涉及全面的问题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时，这种麻木不仁和失望往往转化为新的独立自主的公众积极性——反对非政治化的国家计划。

现在，当代福利国家没有得到解决的困难——前面提到的资本积累的减少以及国家制定政策时的制度性无政府状态——由于国家计划大多数领域里的公民的积极性（bürgerinitiativen）而大大地加剧了。这些积极性中最重要的是，城市自治团体、地区分离主义分子、住户权利的辩护人以及其他关心城市地区政策和住房政策的人越来越多；公民自由意志论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上；医务人员、学生、教师、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的辩护人在卫生、教育和性政策等领域里所采取的行动；

可供选择的通信媒介越来越多；对能源、武器和移民计划提出异议的运动；劳资关系领域里关于收入政策、生产过剩和削减生产的争论。今天，能避免在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里活动的普通公民实事求是的批评的国家（其实是公司和工会）机构绝无仅有。福利国家试图消除社会抗议并永久保持一个“社会性”时代，却无意中导致了一个“不服从”（米利班德语）的过程、政治活动的高涨和激进的民主期待。

这种不服从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官僚主义福利国家自相矛盾的运转方式。福利国家宣称自己的**政治**任务是对各种社会要求作出反应（即反应性解决问题），和长期依靠**非政治化的**官僚主义战略（即依靠给问题下定义和控制机构）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不仅限于福利国家战略。这是包括资本主义公司在内的所有官僚主义机构的标志。因为官僚主义机构通常不经公开讨论就决定一切事务，并且不受下面的监督，所以是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对立面。官僚主义是非政治化活动的制度；在官僚主义机构的所有层次，下级要受上级的监督和控制。这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是独特地由一系列无名但有效的机制构成的。这些机制包括工资和职务机遇的差别、职务的专业化和分工、对专长的关心和有效的经济核算以及依靠全面的管理制度作出和完成某些特殊的决定。

尽管有这些机制的非政治化影响，官僚机构控制其各个组成部分及委托人的一切活动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官僚主义机构的等级纪律不断地遭到它自己为保证统一、保持行动的连续性和在每一个细节上永远控制长期依靠其行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的破坏。官僚主义到处都表现出自我毁灭的倾向。这是因为它打算依靠行政的、抽象的一般预测加强控制的企图倾向于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疏远，而后者的经常抵制反过来又迫使它要求它们积极地参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僚主义机构必须设法通过承认其组成部分不以故意合理的方式行事的必要性来解决它的

自我保持问题。因此，在各个层次和一切领域里，官僚主义结构产生对立的公共领域，后者不断地倾向于反对并从而改变前者的运转方式。[1]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各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或之间没有预先规定的或必要的协调，这一点变得明显了。因此，说官僚主义已经到了顶点或最后时刻是非常错误的。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或多或少地在官僚主义化的过程中取得进展，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就好像，公司、社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只有在同时破坏它们自己的威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权威性的控制。

在这种比较普遍的矛盾的压力下，福利国家计划以一般的行政手段介入商品化日常生活领域直接意味着控制（潜在的）民主要求。从福利国家计划的观点来看，只有通过综合的官僚主义监督、调节和控制网络，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得到保证和发展。不能容许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在社会或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当前

---

[1]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于官僚主义机构自相矛盾的运转方式的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人类生存条件"（阿伦特和皮特金语）的表现形式，是人类仅仅因为在其中互相交往而体验到丰富含义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基本环节的表现形式。这些论文中所介绍的公共生活理论也不接受理查德·森内特的《热心公益的人的堕落》（纽约，1978年）一书所提出的私人和公众的"地理"模式的超政治的和辩解的涵义。对立的公共领域并不等于由广泛使用的、与"内部"（即私人的内心感情领域）形成对照的"外部"的含义所规定的非个人的和外表的生活空间。第三，不应该把独立自主的公众误解为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众就是由官僚主义国家机构（政府当局）所建立的一个领域，其职能是调整和监督公共的标准，公众应该按照这些标准安静地和被动地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公共生活的冷酷无情》一文〔载斯图尔特·汉普夏尔主编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道德》，坎布里奇，1978年，第75～91页〕中谈到公共行动的道德时，这种观点很明显）。最后，正像哈贝马斯和其他人所暗示的（见论文五和论文七），公共领域由于具有往往像狂欢节似的和充满矛盾的性质，所以不一定等于通过合理的言论形成不受欺骗的舆论一致。

所有的福利国家都在逐渐向大规模武装起来的“核国家”（内格里语）的方向转移，这不仅是这种独裁主义的征兆。这些国家一直依靠强调“不作决定”（巴卡拉克和巴拉茨语）的战略，从而在国家决策中心产生了“边缘性”。换言之，它们一贯采取这样的决策手段：有选择地接受、压制或无视改变利润及财产、地位和权力等特权的现行分配办法的要求。

这种用行政手段限制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办法不仅是国家的一种自我保护法，也是政治制度的一个必要特征；政治制度必须注意其他官僚主义机构（有组织的劳工，而主要是寡头垄断资本）可能形成的巨大障碍，在结构上要依靠这些机构的合作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些社会集团（尤其是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有接近国家决策机构的特权，而且倾向于决定可以正式谈判的东西的形式和内容。这种“合作的偏见”要求福利国家由技术官僚根据“为避免麻烦而设计的政策的最小共同点”来管理。政治决策不是通过不同政见和公开讨论来作出的，而是通过国家和这些官僚主义机构的领导人之间非正式安排的、往往很难理解的和秘密的谈判过程来作出的。在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妥协和平等交换的一致应该是官方政治的标志。福利国家所尝试的妥协必然采取一种表面上看来无休止和无目的地适应与控制、平息不断出现的风险、瓶颈现象和冲突局面的过程的形式。这也意味着，在早期历史阶段与福利国家计划联系在一起的雄心壮志和美好前景已经倾向于让位给达成种种妥协协议的“停滞不前的中庸之道”（米德尔马斯语）。

上述关于福利国家计划内部种种困难的讨论表明，这种妥协和中庸之道是短时的趋势。除了新自由主义和新阶级合作主义的独裁主义改革运动，福利国家计划及其“利益集团自由主义”也已经成为许多激进的公民运动的批判对象。它们的牵制已经成为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潜在

的）民主运动标志着这样一个新出现的事实：独立自主的公开讨论和行动现在已经和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分道扬镳。这种“安全国家”所造成的“政治的结束”引起了新型的公开行动，这种行动的鼓吹者提出特殊的、具体的需求而不必组成代表团。这些运动发现，在没有恢复主观性的条件下，目前的危机倾向是革新现有秩序的一个条件。这些独立自主的运动心照不宣地承认这种看法——马克思和伯克哈特等人在19世纪曾极力强调这种看法：危机倾向会带来独裁主义的后果。因此，这些运动并不一定像黎明前拂面的微风；在它们的分析、行动和对奋力前进的要求中，往往有着悲观的调子、对不确定性的反思和失败的可能性。在这些新的运动中，有许多运动准确地意识到，危机形势促使独裁主义取消许多民主的做法，正式宣布生活早已脱离这些做法；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做法是不可能被如此专横地全部取消的。不过，这些运动正确地强调，福利国家官僚主义地议定的妥协必然要压制大量政治和社会要求。由于这种压制，这些被排除在外的要求在当前的形势下通过现有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化继续表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要求可以说是以非正式的和非常难以预见的方式——通过投票支持和福利国家意见不一致的候选人和政党，通过不参加选举和不参与正式的政治进程，通过对形势提出抗议——轮番地、而且至少以相同的频率重新表达出来。

这种反抗由于怀疑官僚主义的独裁主义并要求通过无休止的讨论和自我承担义务来战胜“按程序行事的社会”（图雷纳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开始形成的对民主的公共生活的重新肯定。这种反抗显然是福利国家计划的自相矛盾的官僚主义特点所带来的一种**并非偶然的**结果。不过这种反抗采取一种折中主义拼凑物的形式。这些新的独立自主的运动倾向于高度区别化、分散化和地方化，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

个部门在结构上有所不同；部分地是因为这些运动对权力问题特别敏感，因此有能力深化它们的自我批评（例如承认女权主义最初对学生运动的家长式统治的批评）；部分地还因为官僚主义国家本身力求对这些运动加以压制和分而治之，不允许它们变成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

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化过程显然决不会由于唤醒被剥夺权利的群众起来反对它而招致它自己的毁灭。所以必须放弃一切关于新旧工人阶级、“人类”、“公共领域”或“人民”的空谈；也必须放弃关于出现一种新社会运动的空谈，这种社会运动明天会接替工人运动昨天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例如图雷纳的期望）。在当前的形势下，冲突的规模和地点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变化不定；这些冲突的异质性不一定趋向于消失并汇集成一个单一的革命阶级或运动。各种独立自主的运动构成公共领域里的某种**多元性**。尽管具有分散的和局部的性质（这种性质实际上可以起到挫败传统国家所作出的招降纳叛和镇压等反应），这些运动却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主旋律在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条件下的出现。这种主旋律采取两方面接近于全面对抗的形式，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试图（得到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合作主义的支持）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国家权力的新阶段改组福利国家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独立自主的运动力求说出并使别人听到自己的主张，力求使日常生活重新政治化，力求建立从性质上来说是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互助、讨论和关心具体需要的公共领域占支配地位。

论文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

对官僚主义的热情……足以使人绝望。

——马克斯·韦伯

官僚主义：现代生活的组织原则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在谈到官僚主义的时候把马克斯·韦伯的主要考虑拉扯进来。韦伯在一心想弄清当前历史阶段与众不同的特性时深信，某种前所未有的“对官僚主义的热情”是现代资产阶级现实的标志。从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历史时期的生活如此绝对地局限于各种专为自己打算的、合理化的组织形式之中。这些组织形式的规模和影响正在逐步变得具有普遍性。官僚主义农奴制的大厦正在各地建立起来；官僚主义的进展看来是不可逆转的。

韦伯当然知道，现代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并非没有先例。通过许多复杂的过程，从前的所有文明都成功地使日常生活的特殊领域合理化了。例如，在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拱顶中就明显地包含着关于结构应力和弓形结构型式的合理考虑；簿记的合理化形式出现在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印度和中国；在严密和深思熟虑的辩论修辞手段中体现了罗马的法学和司法实践；在全副武装的希腊和罗马步兵中已经表现出早期阶段的军事纪律，禁止不

协调的作战；古希腊的军事技术和数学化天文学、印度瑜伽的实验技术以及中世纪的采矿术是文艺复兴时期把合理地计算的实验提高到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的先导。此外，许多社会形态在过去就已经通过高度发达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把自己组织起来：新帝国时期的埃及；尤其是从13世纪末起的罗马天主教会；从秦始皇起的中国；等等。然而，在这些众所周知的例子面前，韦伯却坚持认为，现代西方的官僚主义化过程是没有先例的。这些过程根本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倾向于渗入和支配一切生活领域。现代文明化过程实际上和专为自己打算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发展是一致的。整个生活都受制于“有效的”或有目的的合理性---有目的行为受精打细算的精神和抽象的普遍规律的指导，因此而把它的作用范围局限于管理的对象。在全面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自愿的结合和以实现价值为主的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系日益遭到破坏并被有目的的合理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力求通过把一切情况当作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解决——来下定义和控制的办法实现它们各自的目的。总之，官僚主义化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力求使世界“从着魔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世界摆脱一切无法估量的神秘力量。据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官僚主义的计算手段得到解释、监视和控制。

必须强调，韦伯关于现代生活的独特现实的描述并不认为官僚主义行为的扩散与现代化过程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他本人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特性或个性的论述是片面的。像所有的比较研究一样，他所论述的重点是有选择的，是由关于当代官僚主义统治的意义的种种判断组成的。这些判断完全决定了研究各种官僚主义形式的目的和方法。通过这些判断，官僚主义体制被认为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使它和所有从前的社会历史形态区别开来。相反的，这些判断排除在现代条件下生活的无数一般方面和特殊方面。这一点对下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韦伯的分析

没有详细描述官僚主义化过程的各种动力，他的分析没有声称要从概念上描述或再现现代官僚主义现实的“真正实在的”内容和形式。他的分析所关心的倒是系统地用某些理想的典型范畴来说明和理解这种现实。这些范畴片面地强调和仔细研究官僚主义的某些特征。韦伯一再强调，官僚主义的过程不可能有没有先决条件的、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暴露无遗的表现形式。这些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才能观察、分析或批判，而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要靠一系列概念的抽象。因此，他对官僚主义合理性的描述公开宣称是有选择的，受到当代对这种合理性的历史兴趣的方式的制约。

在这种前提的指导下，韦伯至少分析了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所共有的4个要素。再重复一遍，在现代生活范围内的任何地方，这些要素决不会以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在他看来）这些要素一起构成一切当代公私官僚机构所特有的和值得高度重视的属性。首先，官僚主义可以被分析为一整套始终如一的、在方法上有准备的和严格执行的指挥和服从关系。在有组织的等级制度内，“臣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严格安排的，而且符合自上而下任命和监督的必要原则。这些臣民被“毫不动摇地和毫无例外地指定去执行命令”。

官僚主义是一种客观的权力矩阵，各级官员（和受他们保护的人）都被纳入这个矩阵，他们的活动由这个矩阵安排，而且按照这个矩阵，他们将被当作“需要命令和只需要命令”的人那样无名无姓地受到非政治化和管理。在官僚主义体制的一切领域里，下属被要求依靠他们的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官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不平等制度，是靠下属停止一切个人批评、被动地服从、信任权威和注意命令而兴旺发达起来的。个人如果脱离他们的组织就会感到忐忑不安和无依无靠，他们变成了组织的人，他们一生中的理想就是服从。他们变成了简单的

齿轮，力求在一架不停地转动和相当精确地运转着的机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的行动方向又只能由那些处在最高一级的官僚来改变。因此，官僚主义政府的主要前提是把生产、战争和管理等手段集中在那些管理者的手里，而那些调度和管理这些手段的人又把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仅仅看成是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官僚主义总是通过官僚继续存在和扩大。

其次，这些从属关系受严格的内部区别的支配，换句话说，是按照一种往往很复杂的任务或职务分工来安排的。详细说明这些任务的规章制度通常是通过经验观察来制定的，受诸如最低限度费用等考虑的指导，并且在书面文件中讲得清清楚楚。诸如工厂或百货商店这样一些官僚主义机构巧妙和有效地运转取决于合理的和不断的专门化。在官僚主义机构内部，说话、相互交往等活动和工作人员的劳动都要受到自上而下不断的行政分割的影响。每一个层次和领域的活动都被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由特殊的行动规则来管理。这些规则详细说明机构内部各个层次或工作岗位雇用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资格和应尽的义务：例如，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按他们在机构内部享受特权的程度获得报酬和物质上的好处；如此等等。尽管这些规则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一个办公室及其相应的工作规则却倾向于继续存在到它的工作人员的身后。官僚主义机构的“支柱”和受保护人不得不认为按这些规则行事是他们的义务。

第三，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机构都表现出某种明确的非人格性。“不考虑特定的人和情况”是官僚主义的格言。官僚主义的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刻板的非个性化合理性的体系，受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指导，这些规则百分之百地和始终如一地适应于每一种情况。一切官僚主义的管理（无论是对内部的工作人员还是对外部的受保护者）都属于受规则约束的照章办事，原则上拒绝根据不同的

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按照韦伯的看法，这种原则上的“非个人关系”意味着这些机构都是毫不动摇和不偏不倚地听从任何和每一种需要它们提供高效服务的权力的支配。现代官僚主义机构倾向于消灭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他人提供款项、用益权和服务的做法（这是世袭制的特点）。例如，古代的东方、欧洲的封建主义以及蒙古帝国和日耳曼帝国都一贯地依靠宠臣、宦官和食客，而现代官僚主义机构的指挥者通常按照可靠的客观规则办事。他们的管理不考虑个人。反过来说，受官僚主义机构管理的人也不被看成是个人的奴仆或管理者的财产。

现实的官僚主义机构越是接近这种机械的、非个性化的形式，它们的受保护人和工作人员就是越非人性化，不得不受一般规章制度的支配。官僚主义的统治是特殊性和急躁情绪的敌人。常规化的官僚主义纪律消除一切矫揉造作的狂喜、对荣誉的崇拜以及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对领袖的忠诚；不易于通过抽象的一般规则来推测和管理的“爱、恨和一切纯粹是个人的、非理性的、感情的成分”都倾向于被消灭。就它们机械的非人格来说，现代官僚主义机构保证所有的下级都服从上级，而且比古代的专制主义有效得多。和古代官僚主义地奴役人身的尝试（例如罗马大庄园中对奴隶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或者法老领导下的埃及官僚主义）相比较，现代官僚主义实现下级服从上级通过不那么涉及人身的、更加微妙和可靠的机制——例如发工资；提供职位；给养老金；每年给渡假期；求助于客观的规章制度、对名利的追求、工作经验以及责任感和诚心诚意的态度。在换取这些物质保证时，各级官员和受保护人不是为某些人服务，而是为客观的和非个人组织的目标服务。

最后，极为重要的是韦伯所坚持的看法，即在现代条件下，正规的官僚主义机构倾向于凭借它们的技术优势居于支配的地位。正因为这种技术优势，官僚主义机构才能对付这个世界的种种复

杂性。不论统治集团的目标---例如价值的自我扩张，或者通过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部署常备军来保卫民族国家---是什么，依靠官僚主义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埃及这个最古老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国家里，由于种种技术经济因素而由国家来管理全国的航道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纯粹的技术优势，官僚主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韦伯坚持用机器来比喻官僚主义机构。现代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机械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机器似的统治机构的运转和协调依靠严格客观的专门技术知识，这种专门知识本身越来越在各大学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机构里受到考验。和其他形式的机构（例如家长制和世袭制管理制度）取得成就的能力相比，机械化的、由专家指导的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其独裁统治形式——是不会被超过的。官僚主义机构在原则上力求合理地考虑一切。由于十足地依靠与它的活动有关的专门知识和具体信息，所以官僚主义机构比其他形式的机构从性质上来说更加一丝不苟、毫不含糊、灵活机动、运转自如，而且成本效益高。"一丝不苟、效率高、毫不含糊、熟悉各种档案、不间断性、谨慎、统一、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减少摩擦、减少物质和人事费用……训练有素的官僚主义机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占优势。"在现代条件下，而且正因为这些特性，官僚主义确保自身不屈不挠的进展，就像现代机器不可逆转地保证自身胜过各种低级形式的手工生产。因此，和其他从技术上来说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相比，官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避免性要大得多。

现代资本主义

在上述介绍中，韦伯关于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论述难以捉摸的深度和精确性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表达出来。应该更详细地分析韦

伯的论述所提出的看法，尤其是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现代领域的看法。韦伯坚持认为，只是在现代条件下，调度固定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高度专业化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企业才出现。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变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僚主义组织方法的模式。联结这些机构的各种网络形成一个巨大的、表面上看来不可动摇的宇宙，一种在制度上有所区别的市场经济，个人不得不适应其行动规则：在为满足各种有“功利”需要的斗争中，那些不照此办理的人或者辞职不干，或者被抛入失业者的行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打破传统生活习惯、使整个世界服从其官僚主义管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现代生活中对我们的命运影响最大的力量”。

韦伯强调指出，在这些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支配的条件下，单个的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毫不含糊地、并尽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成本效益来处理它的业务。就其不断合理化的倾向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不合理的投机、不顾一切和不讲道德的追求利润。韦伯否认获得的行为通过某种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例如西梅尔的《货币哲学》一书所提出的）。首先，从一种技术的观点来看，依靠货币需要有最合理的手段调整各种经济活动。此外，毫无节制地流露出贪求金钱的冲动可能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实际上，这种不顾一切的贪婪往往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来：“冒险家的主观态度——嘲笑一切伦理限制——一直是普遍存在的。”企业冒险家们至少长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海盗行为和各种承包活动中扮演投机家和金融家的角色。绝对的肆无忌惮与贪婪和现代资本主义没有相似之处，而强盗、海盗、高利贷者、大商人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诚然，在现代条件下，胆大妄为的贪婪和投机行为继续存在。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根除韦伯所说的“投机性”预测——针对各

种可能性的预测，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难预测的。例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漫不经心地消耗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没有代用品。那些在赢利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或分享财富的人还继续受到冒风险、野心和从有利可图的事业中获取大量收入的机会的推动。而通过领土兼并获得经济收益的垄断性斗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起着关键的和破坏稳定的作用。作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资本主义企业、垄断集团和托拉斯必然都是寿命有限的机构。不过韦伯深信，现代资本主义正在逐步限制或减少投机冒险的落后的不合理性。尽管经济危机的危险并没有消失，但是正因为资本主义不断试图使生产、价格、周转率和信贷来源合理化，所以这种危险的相对严重性已经减轻。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是在严格预测和不断计算的基础上官僚主义地组织它的活动，所以也在消除行会手艺人有特权的传统主义、农民勉强糊口的生活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的行商（例如送货上门的推销员）偶尔进行的资本核算。韦伯强调，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要受比较广泛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规则的支配。为了避免在市场竞争中遭到失败，企业必须避免按不顾一切的和没有商量余地的赢利性逻辑行事。不像那位声名狼藉的荷兰船长，他仅仅为了营利就准备把他的船队付之一炬，资本主义企业家倒应该以更深远的预见以及官僚主义的合理计算利润相联系的谨慎态度经营他们的业务。工业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并依靠具有垄断效果的不断进行的计算有计划地追求利润。在当代条件下，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社会交换的组织原则是在使用货币条件下的"资本核算"。这种核算与公司试图制定计划和官僚主义地支配自然界、有形商品和劳动力作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有关。公司设立资本资产帐户倾向于采取不断地事先预测可能遇到的风险

和获得利润的机会的形式，再辅之以不断的事后计算来核实实际获得的利润或受到的损失。资本主义企业的最终（或定期估计的）收入应该超过它的资本，即它的固定营利手段（厂房、机器、原料、产品和现金储备等等）的估计值。

对有限责任企业来说，这种坚持连续进行合理的资本核算——在现代西方以外很少见到，而且通常不是连续地进行——的逻辑的倾向，是由几个关键性条件共同决定的。至少可以提到4个这样的条件。第一个和最明显的条件是，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倾向于力求全面控制已利用的物质生产手段来增加它们预期的利润。典型的是，资本主义企业控制这些手段的中心需要远离生产场所或交易场所。尽管这种发展不是没有先例（韦伯提到东方的贸易集市），但这种生产力的空间集中和非现代情况形成强烈对照。从前，商业企业或生产企业是诸侯和地主庄园或城市的组成部分（例如比雷埃夫斯的手工作坊〔esgasteria〕）。相反地，随着企业合法地和个人财产分离，企业垄断和生产资本的空间划分开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盛行。

其次，韦伯坚持认为，这种企业垄断和物质生产资料在地理上的集中取决于一种过去是自由的而现在是受控制的劳动力的市场系统。和封建的租佃制度或古代的奴隶种植园相反，现代官僚主义企业是在**挑选**其劳动力的基础上运转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把工人就业和挣钱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反之，这种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所有主对工人的合法占有。通过雇用和开除的权力，同时在来自和其他雇主竞争的压力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力求按照合理地计算的利润组织自由的劳动力。韦伯补充说，"精确的计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企业家享有雇用和开除工人的自由，而工人是为了工资受雇用的条件下，通过资本核算的经营效益倾向于达到最大限度。在这些条件下，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资本投资相对减少（和从前购

买和供养奴隶及其家属相比)。

此外，根据韦伯的看法，名义上是自由的劳动条件形成增加了管理部门按照劳动者的能力和工作愿望选择劳动力的权力。因此，精确的资本核算形成一种新颖的、看不见的“统治系统(Herrschaftsverhältniss)”。官僚主义的企业力求通过确保工人和平地和永远地脱离他们的劳动工具，使他们个别地和集体地永远受机器的奴役。军事纪律是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理想模式；像克伦威尔的纪律严明的铁甲军一样，现代工人成了旨在使“每一个人都组织起来、听候调动、组成班组”的狡诈的资本主义战略的客体。不仅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变成了纯粹的“人手”。韦伯争辩说，这种由管理资本家剥夺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潜在）控制权的情况完全是技术因素决定的。营利企业只有在完全控制生产资料的时候，才能像一个有组织的、内部有分工的、不断受到监督的车间那样有效地运转。只有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才能合理地运用其权力，最大限度控制生产速度，使其产品的质量标准化，并且通过唤醒并引导消费者的需求的进攻性销售战略确保这些产品的消费。

这种劳动力受到全面排挤的情况有引起阶级斗争、尤其是大工业企业家和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斗争的非预期效果——韦伯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这就意味着，企业计算赢利的可能性的过程必须不断地适应与其他法人官僚主义机构竞争以及与劳方讨价还价和斗争所引起的成本和价格的预期变化。按照韦伯的看法，这种预期的变化不一定由于一贯的无产阶级化趋势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而逐渐减少。反对无生命的资本主义工业机器的斗争不等于这种机器不能有效地运转。事实上，一系列条件方便了官僚主义对“负特权阶级”的自由劳动力的控制：劳动者在不同的程度上主观地把他们的劳动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承认他们也永远有

完全不能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属的风险；制定（至少就体力劳动者而言）从空间上来说集中于工作场所的共同的劳动纪律；管理部门不断地试图进行科学管理，减少需要技术的程度，通过不规则地安排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使活的劳动力遵守纪律；最重要的也许是，形成新的、受过商业或技术训练的专业化官员阶层（例如各级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所意识到的利益和被训练来摆弄机器的人的利益决不完全一致。

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官员阶层的扩大直接促使现代企业完成合理的资本核算的第三个条件——依靠"机械似的合理技术"。韦伯极力主张，企业核算和比较收入与支出逐步越来越依靠各种形式精确的假设、估算和预测。合理化的簿记只是企业更普遍地依靠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合理的技术手段的一个例子。韦伯还强调资本主义企业、机械工艺和"有实验作为根据的精密的自然科学日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在一个已经计划好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加入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相应的可预测性"。合理的机械工艺的这些和其他的例子表明，在现代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促进官僚主义地核算的营利。这些例子反过来又表明，营利企业逐步变得更加依靠机械化的能源、机器和管理，韦伯认为，从某种技术的观点来看，这种机械化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合理的技术手段是高度生产性的。这些手段也可以用来训练（和节约）劳动力，并在一般情况下使官僚主义机构的活动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达到最大限度。

最后，韦伯提出，现代企业最大限度地做到有效的资本核算取决于整个政治法律条件，这种条件从原则上来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估计到。现代官僚主义国家是否能够——或应该——满足这种条件，这是韦伯最关心的问题。

官僚主义的民族国家

众所周知，韦伯强调现代国家是官僚主义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补充了他所一般地强调的现代世界的官僚主义化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简单结果。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和胜利不能只通过经济推理来解释。现在支配着现代生活的各种官僚主义化过程决没有相同的、单一的发展史或发展逻辑。因此，韦伯坚持认为，国家的各种现代形式不能被分析为与经济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相对而言的“上层建筑”。他根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国家机构是产生于社会权力内部矛盾的寄生物。国家官僚主义不是现代社会分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国家官僚主义的职能也不仅是保证社会（即阶级）权力结构的各种规则得到正式承认。最后，真正的历史动力——斗争中的各个阶级——的消灭也并不总是标志着国家官僚主义必然消失。

诚然，现代官僚主义国家不得不参与韦伯所说的“以经济为主的行动”。同样明显的是，韦伯在他的政治著作中特别强调分析社会权力的各种条件以及当代国家总是而且已经参与的冲突。不过，韦伯反对现代“对‘经济’的过高估计”，这种过高估计错误地认为民族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一样，仅仅是寄生的上层建筑。在这一点上，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决裂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与黑格尔、鲍威尔和鲁奇相反，马克思始终为这样的论点辩护：现代国家是和市民社会不受约束的逻辑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仅限于进行“拘泥形式的”和“消极的”活动。哪里开始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非政治化繁忙过程，哪里就不再有国家权力。受资本统治的市民社会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变成了现代国家所依靠和不得不作出反应的天然基础。正因为资产阶级是国家税收和贷款的

主要来源，所以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变成了这个阶级为了保证其财产和利益而接受的组织形式。这种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保险凭证，既防备无产阶级，又防备它自己，即防备个别资本家的利益所不断引起的无政府状态。正像最著名的（在韦伯的时代仍有影响）1848 年的公式所说的，这种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按照韦伯的意见，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决定力的说法不无道理。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严格的经济解释，成功地使人领悟到经济活动在构成现代生活的那些事件的特殊重要性。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思考及其片面地从经济上来解释现代国家的尝试，引起了一系列令人困扰的难题。例如，不能用各种经济上的假设来解释的历史政治事件，被认为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而不予考虑；有时，“经济”的概念被定义得如此广泛，以致所有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力的问题都被错误地纳入了这个定义；在另一些时候，通过宣称政治机构是阶级群体的产物（也是各种利益的实际保卫者），把经济因素的首要地位错误地保留下来。韦伯提出，这些难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的盲目崇拜所引起的，而这种盲目崇拜又是它错误地尊重理想的典型分析的自我限制的结果。任何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主义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都必须依靠理想的典型范畴，这些范畴有助于对无数永远在变化而无法全部了解的社会政治现象有选择地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人和批评者所表现出来的对完整知识的信心无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方法论观点。相反地，唯物史观忘记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了解是通过明确和简单易懂的范畴形式构成这种现实的：“各种事件的‘经济’决定因素和‘非经济’决定因素之间的区别永远是概念分析的产物。”

与拒绝不加思考和片面地用“经济”来说明现代生活相一致的是，韦伯否认资本主义以某种方式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一种由专

家官员、法官和政治家统治的官僚主义国家制度。现代官僚主义国家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国家的形成在较大的程度上倒是出于新兴的权力集团在强权政治的背景下建立通过法律来管理和由合法的财政制度提供资金的常备军的需要。韦伯提出，在非现代的条件下，典型的是自带武器装备和给养的士兵（例如古代城市中的武装市民、中世纪早期的城市中和封建制度下的民兵）。与此相对照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国内动乱和远方敌人所引起的战争迫使国家建立永久性的、集中管理的和在技术上有效的武器库。与自带装备和私人管理武器的非现代原则相反，现代国家的指挥官们把暴力行为的物质手段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这个过程始于（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和庄园、君主国和诺曼底征服者的国家。在这些地方，现代常备军随着诸侯国的建立而出现。这些诸侯国设法从迄今为止一直以民间方式进行战争的人（自带装备给养的士兵和军官以及股份有限公司，例如中世纪的"Maonen"手中把战争工具攫为己有。

这种由集中在中央的国家精英把暴力手段攫为己有的做法是同法律和行政管理领域里的类似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决定性步骤也是由诸侯们采取的，他们设法剥夺从前是独立自主的群体（神职人员、受过人道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训练有素的司法人员、宫廷贵族和绅士等等）的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在法律的领域里，这种剥夺使新兴的现代国家及其政府日益依赖由在合理的和可信赖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人员来支配的法律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性质不同的过程。例如，这种官僚主义化法律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法律制度，后者本身只适用于一个发展成了帝国的城市国家结构。韦伯认为，罗马的法律实践决定性地把审判程序置于训练有素的官僚主义专家的法律制度的指导之下。这种法律程序的早期合理化同时削弱了与神圣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判决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得到"上帝恩赐的"公正（例如

神谕、先知的格言）和各种非正式评价的补充（例如在雅典法庭上关于个案的辩论）。法律取代这种传统司法特殊论，变成系统化的和可依赖的。罗马帝国失败以后，合理化的司法程序被中世纪的教会所保留。中世纪教会的行政机构继续依靠固定的教规管理教会的成员和俗人。通过诸侯对这种合理化的“司法”行政机构的剥夺，新兴的现代国家越来越依靠官僚主义化的司法。这种国家和正式的、可依靠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结合也间接地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资本主义企业家在其中合理地适当追求利润的新制度与商业上的要求和交易取决于引用公式时的竞争（例如中国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容的。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的交易是靠一整套在技术上可靠的法律规定繁荣起来的，这种交易的可预见性从原则上来说不亚于一台机器的可预见性。

到了16世纪，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化补充了司法的机械化。或者像韦伯所说的，诸侯在领地上的专制主义占优势肯定依靠了同时形成的包括财政官员、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司法人员在内的专家官僚。在这个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封建时代的官员——通常是被授予司法和行政方面的高级职衔而没有报酬的封臣——被剥夺了他们从前所掌握的管理工具。取而代之的是诸侯任命的有报酬的官员，他们现在完全脱离了他们的职业工具。韦伯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化正好类似于资本主义对独立生产形式的剥夺。现代国家并不垄断生产资料——这是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市民社会领域里的惟一历史成就。当然，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官僚主义的国家开始垄断物质的组织手段（暴力、法律和行政管理）。从国家管理人员的立场出发，所有独立行使暴力、司法和行政管理权的场所都必须清除。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官僚主义的民族国家必然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雇员无产阶级化了。他们既不拥有也不亲自控制国家的暴力、法

律和行政管理手段。韦伯断言，国家“已经使各种物质的组织手段在它的领袖们的手中联合起来，而且已经剥夺了所有凭本身资格控制这些手段的独立自主的有地位的官员的权力。国家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而且现在高高在上”。

作为这种剥夺过程的结果，政治活动越来越成为官僚主义民族国家机器内部和相互之间进行有组织的和训练有素的权力斗争的同义词。在现代条件下，政治活动不能被认为就是为了争取一种美好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政治**的涵义倒倾向于和争取控制国家相一致，被理解为一种在地域上有限制的和强制性的不断行使权力的制度。那些力求控制这种制度的人试图把自己说成是这种制度的合法支柱，并且因此而试图全部垄断这种制度的特殊运转手段，尤其是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实行形式上的民主和人民大众有选举权的时代，争取合法控制国家的斗争是通过制定劝诱、组织和严格训练人民大众的战略来进行的。资本主义的报刊和国家日益相互依赖，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家和党的官员指导的政治机器的扩大，促进了这种公共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生活日益由无原则的官僚主义政党来安排，这些政党的职能（除了为它们自己的成员提供工作）就是在政党首脑和职业政治家的监督下指导“拉选票”的进程。

官僚主义政党——从技术上来说，它更有能力操纵有合法选举权的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的影响日益扩大也标志着作为国家决策起点的立法机构的衰落。除了内阁成员和少数反抗者，立法机构的成员变成了唯唯诺诺的人，他们按党的要求投票而不肯叛党。在立法领域以外的专业政党组织者开始垄断一度由知名人士和国会议员行使的决策权。在韦伯看来，立法机构的这种衰落由于专业国家官员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加快了步伐。当然，在许多非现代文明中都有官员，不过，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从质量上扩大了由通晓商业、技术和法律的专

家官员所组成的行政机构的作用和权力。这些行政机构在军方、法院和官僚主义政党的合作下开始越来越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体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些居民变成了由宪法下定义的国家的一般化客体，国家靠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自卫，靠训练有素的、严格服从系统地制定的规则的专家官员来合理地系统地制定、实施法律和作出裁决。韦伯坚持认为，现代民主政体正在转变成高度有秩序的官僚主义国体。在官僚主义命令的支配下，由法律、军事、行政管理和政党专家和官员来管理全体居民，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企业官僚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的合并

再说一遍，韦伯并不把这些政治进展看成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后果或结果。韦伯实际上提出，在当代，谋求利润的企业的合理资本核算变得越来越依靠可依赖的和可预测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现在，只是为了它们彼此的生存，官僚主义国家和企业资本主义才在它们繁衍和发展的形式上变得相互依赖。韦伯认为，“国家机器对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增长，尤其是随着日益社会化而增长，而且国家机器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增长”。

这种发展有几个原因。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国家和经济的这种互相渗透是由固定资本、合理地核算的企业日益依赖一种可靠的货币制度以及一个严格和稳定的行政管理、司法和军事机构所引起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合理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法律的引导下大大地兴旺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政策的实施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企业对国家军事手段的依赖也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在一个经济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上；同样，国家要求在军事上保证自身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安全，加剧了它对不断扩大和合理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的依赖。由于这些原因，官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越来越成为企业有条不紊地追求利润的**绝对必要条件**。反过来说，资本对国家的这种日益依赖导致国家对资本的日益依赖。这种互惠的过程产生于这样的事实：现代企业资本主义（按照韦伯说法）是最有活力和多产的生产体系，因此它能够为一个稳定的官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毫无困难地提供财政资源。现代官僚主义国家变成一种"税收国家"，整个政治经济都依靠它的稳定。国家日益依赖货币贡献（即税收），这种货币贡献是由它自己的工作人员征收的，而且主要来自资本家阶层。货币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意味着国家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收税人和最大的付款人。当然，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于保证官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扩大来说并不总是决定性的。罗马帝国和埃及新王朝统治下的有组织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就是恰当的例子。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有利于可预见地产生通过征收所得税而获得的财政收入。韦伯比较了现代国家和罗马帝国的财政浮动。由于罗马帝国试图依靠拿薪水的官僚和职业军人在政治上组织几个大陆区，所以导致了巨大的财政开支。但是由于商业和城市的衰落、劳动力的减少以及社会倒退到自然经济状态，所以城市地区越来越没有能力提供税收制度所要求的数量日益增加的货币。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经济间接地促使用公式表示有规律的和有计划的国家预算，因此也有利于消除早期国家如罗马帝国的那种典型的、靠不住的、勉强糊口的作业方式，中世纪普遍存在的那种周期性实物支付（各种费用、货物税和销售税），以及作为像古埃及新王朝这类徭役制国家的特点的强迫性个人劳役（采矿、维修道路和桥梁）。

韦伯坚持认为，社会和国家的日益相互依赖也起源于这样的事实：现代官僚主义国家——以及相应地说现代企业——成功地和**精确地**运转越来越取决于国家对有效的电信和运输系统的集中控制。这些交通手段（例如铁路）的集体形式增加了由中央集权

国家调度的必要性。而电信和运输系统的扩大（以及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数量的相应增加）又有利于在技术上提高国家对包括资本主义积累在内的各种情况作出反应时的效率。下述事实反而促进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种技术上的相互依赖：这些通讯系统的精确工具是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企业开发和投放市场的。

最后，韦伯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界线的消失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对国家的要求日益增加而引起的。遗憾的是，韦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发展及其涵义。例如，他只是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已经开始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各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压力以及国家利用社会政策的形成来提高自身的权力和合法性，都促进了这些福利战略。

韦伯指出，这些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日益相互渗透的例子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表明国家和现代企业的官僚主义操作手段日益趋同。在当代条件下，对工资劳动者的官僚主义控制取决于国家内部同样形式的合理的和可靠的统治。国家组织——现代官僚主义统治的特殊政治形式——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控制不可或缺的工具。工人脱离他们的生产资料不限于工业资本主义工厂或公司。工人脱离

> 生产、破坏、管理、学术研究和财政的物质手段，一般说来是现代国家在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里的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手段都受官僚主义机构……直接服从和在必要时可以利用的那种权力的支配。这种官僚主义机构现在同样是所有那些组织的特点；它的存在和运转是操作手段集中的原因和结果——实际上，这种机构就是它的形式。

从工厂到大学，在所有的行为领域里，操作手段都集中在那些控

制着机器似的官僚机构的人手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完全脱离能够实现其劳动的手段的描述，只不过是更为普遍的官僚主义化过程的一个例子。

官僚主义统治的必要性和限度

正是操作手段的这种官僚主义集中使得现代生活的当前阶段对韦伯来说如此有争议。资产阶级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在这种过程的垄断性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自己结成一个自我奴役的“铁笼子”。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慢慢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抽象的一般统治制度的不断调整。官僚主义的统治是当前的命运，它的将来可能更是如此。一个“冰冷黑暗的极地之夜”像幽灵一样徘徊在现代世界上。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强调的是，韦伯并不打算暗示向一种完全机械化的、可以预测的和钟表似的指挥系统发展必然是合乎需要的。尽管这种官僚主义化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韦伯还是注意强调——明显地不同于施莫勒、瓦格纳和社会福利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中其他为官僚主义辩护的人——当代官僚主义机构有条不紊地引起**不合理的**结果。他注意“反对官僚主义的绝对偶像化”，怀疑现代官僚主义的推断：所有神秘的、难以预测的力量都已被永远消除，现代统治者原则上可以通过预测和指挥控制整个局势。这种傲慢的推断实际上是一种不真实的和不能实现的幻想。与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相反，韦伯清醒地坚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引起的不合理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至少在当代条件下，形式上的合理性方式的必要条件和实质上的合理性方式的必要条件之间有着某种日益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官僚主义

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韦伯论述了这种不平衡的几个例子；以下3节将进一步引述和分析这些例子。现在只需肯定他的主要论点。不论判断实质上合理的行动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实现这种行动的必要条件，或者韦伯想要论证的必要条件，原则上总是不符合形式上的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要求。他指出，任何类型行动的形式上的合理性的程度在于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和实际上是依靠数量计算来构成的。形式上合理的行动是由技术上最合适的方法指导的有目的的合理计算。相比之下，行动在实质上的合理性并不涉及在何种程度上由建立在合理的可计算性基础上的方法构成。相反地，行动及其结果从实质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行动及其结果是由最终价值来调整和判断的，而最终价值的内容和数量从原则上来说是非常变化不定的。

生产、管理和压制特殊性

韦伯关于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不平衡的第一个例子涉及抽象的一般操作方式，这种操作方式是一切高效率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特点。关于特殊的个体、情况和事件，韦伯指出，官僚主义机构长期地妨碍着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从实质上合理的标准（即关于人类需要的各种互相对立的概念）来看，官僚主义机构对标准化的一般预测的盲目崇拜同通常伴随着那些需要的定义的多元性或特殊性相矛盾。这种矛盾是公私官僚主义机构的特征。例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韦伯非常接近于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和专为自己打算的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制度，是一种其满足人类众多具体需要的能力是不稳定的和至多是无意的制度。资本主义企业的官僚主

义操作方式通常既否认工人控制生产的可能，又否认工人们关心的仅仅是保持他们的职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实质上的**不合理性**产生于这样的事实：随着企业主对工人的统治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不得不使专为自己打算的利润追求制度化和合理地加以完善。

在韦伯看来，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事物支配人类”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批评准确地描述了有生命的劳动力默默无闻地服从官僚主义的工厂和办公室合理地制定的纪律。公司形式上合理的可赢利性预测和生产领域里实质性的特殊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消费领域里也存在。韦伯承认，以利润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只能为那些有足够收入、因而有权要求某些商品的消费者服务，而不能**有效地**为其他人服务。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追求货币价格和利润(以及国家权力提供的生产机会，例如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倾向意味着，某些特殊的需要——那些不是由消费资料来担保的需要——可能得不到满足。韦伯说：“可赢利性**在形式上**确实是一种合理的范畴，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在**实质性的**要求方面是不同的，除非这些要求在市场上以足够的购买力的形式让人们感觉到。”这种不合理性由于资本主义企业有权决定生产的类型、数量和技术熟练的程度而进一步加深，而这种权力也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就是说，企业追求可赢利性并不自动地或者甚至必然地等于最优化地利用可以得到的生产资源，以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要。

在国家行动的领域里，官僚主义拒绝一笔一笔地做买卖也直接意味着压制或否认特殊的个人和群体的各种需要。韦伯相信，在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对特殊性的压制已经很明显，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则会变得特别令人困惑。这种信念使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未经过实验的中央集权论产生严重分歧。在他看来，他们的“随声附和”以及天真地认为历史的进步

要靠国家制定计划，完全是误入歧途。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也经常认为，它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失败是倒退的征兆，它的失误是暂时违背历史的判断。这种运动错误地认为，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知识的特许载体——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它对一切挡道的复杂情况和意外结果的憎恶。作为其进化论的结果，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隐瞒了这样一点：没有防止官僚主义化实质上不合理的结果的历史保证。和平、自由和简单地满足各种需要并不一定包含在官僚主义国家计划所指导的未来中。

这种反进化论的信念支持韦伯严厉批评布尔什维克（和考茨基分子）希望调和摆脱一切形式等级统治的目的和通过为人类的需要进行有效的官僚主义计划生产来取消私有财产统治的目的。韦伯典型地至少提出两个互为补充的论据来为他的论点——这些希望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辩护。他以猜测的口气提出，合理地计划的共产主义经济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论断主要来自他的推测（而这种推测又来自第二国际内部的争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需要废除货币、货币结算和货币类型——并从而消除合理的资本结算。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调节、以实物结算和满足大众需求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在最好的情况下，关于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场所、类型和数量等问题只能根据十分粗略的估计来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形式上计算的合理性程度。在最坏的情况下，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定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规则或专横的调节战略，这种规则或战略武断地规定生产、消费和服从的类型。据韦伯估计，执行独裁纪律的可能性会增加，因为共产主义经济会使通常由资本主义企业家发动的那种富有革新精神的、冒风险的和“不受约束的争取经济上生存的斗争”逐渐消退。共产主义减少对劳动的物质刺激的倾向也会产生等级森严的纪律，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则产生于个人获利的机会或完全不能糊口的风险。反过来说，这种纪律很可能使形

式上的生产合理化受到限制。这是因为按照其技能雇用劳动力的自由会大大地受到限制。

韦伯认为，由于这些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普遍的物质丰裕和从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尝试很可能会越来越需要依赖官僚主义的管理。他反对他同时代人的革命希望的第二个理由采取一种预言的形式：社会主义运动可能不得不放弃普遍从等级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幻想。此时此刻，韦伯确信，在反对"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得不接受有效的官僚主义机构。就像它公开反对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革命运动也已形成了一支官僚大军和各级办事机构以及一批热衷于晋升的追随者。

另外，韦伯还认为，有效的管理将是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因此，社会主义的工厂和办事机构的管理不得不依靠制定精打细算的计划、技术培训、市场调查和关于需求的专业知识。仅仅这些因素就需要扩大高度专业化和受过长期训练的管理人员阶层。他们的合理计划——韦伯从普鲁士国营矿山的例子推断——则要靠对劳动力的严格训练和控制。因此，官僚主义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要保留（资本主义）对所有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剥夺，而且通过以国家官员取代私人资本家来完成这种剥夺的过程。总之，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会扩大现代官僚主义统治及其实质上不合理的结果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社会会表现为抽象的一般官僚主义独裁的社会主义形式，会表现为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一种更高级和更集中的形式。

韦伯从一开始就确信，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两个论点提供了证据。布尔什维克信心十足地谴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建议通过标准化的计划使劳动军事化，足以表明他们已经保留或重新引进以前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做法：秘密警察、泰勒

制、工厂和军队内部的等级制纪律。韦伯预料，布尔什维克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会削弱——实际上是摧毁——对整体化官僚主义控制及其幻想作用的最后一点反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公私官僚主义机构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以及通过一种“抵消影响”的过程来约束双方权力的可能性——会被控制整个生活而不考虑特殊需要的集权化管理所取代。生活会变得像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生活那样压抑和缺乏独立自主。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会更有效地达到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所追求的目的——对无产阶级的官僚主义专政！

虚无主义：对技术的盲目崇拜

现代官僚主义机构长期不能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是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上的合理性的要求和实质上的合理性的要求之间不平衡的第二个例子。韦伯指出，现代官僚主义生活的标志是明确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应该被看作是崇拜技术熟练在当代生活各个领域里引起的实质上不合理的结果。正因为这种对技术的考虑即着重手段的考虑的盲目崇拜、现代官僚主义世界才越来越经常丧失目的感。这种盲目崇拜不知不觉地产生一个由各种对立的评价态度组成的令人手足无措和无限大的陷阱。韦伯抱怨说，在这种重视技术实力和盛行伦理虚无主义的条件下，到处都倾向于以一种自发的和危险的无动于衷的方式作出价值判断。

韦伯解释说，这种发展是反常的，如果认为早期现代政治经济在形式上的合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积极保卫实质性目标为标志的宗教运动——新教——的产物。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可能性，并不仅仅是呆板的金融交易的结果。现代世界的官僚主义化

在某种程度上的宗教行为本身先合理化的结果。尤其是在新兴的中下阶层中，按照韦伯引起争论的论点，新教的禁欲主义促进了一种民族精神的成长，这种民族精神大大地有利于现代资产阶级秩序所特有的那种合理的、官僚主义的劳资结构。

韦伯强调，宗教改革不等于消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实际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各种新的新教运动（虔信派、卫理公会、浸礼会、尤其是加尔文派）影响了新的和更认真地实施的宗教纪律，这种宗教纪律深深地渗入了信徒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些宗教运动的**自我合理化**活动受到一种无疑是新的实质性原则的指导：宗教把尽到世俗事务中的职责评价为个人能够参与的最高形式的伦理活动。按照这种原则的辩护人的观点，根据上帝的意志生活不等于用修道院的禁欲主义来压制世俗的道德观念，从这时起，所有的基督教徒在一生中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像修道士那样行事；他们有义务履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的“天职”正是这些为上帝的荣光尽力的职责，它的对象是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个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检验自身，深化他们的“内在孤立”，即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向外部世界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典型的是，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说明这些职责的内容。它强调，人不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即符合韦伯所说的“天然关系”）。相反的，人倒是应该为了人的工作有利于“非个人的”社会公益而活。因此，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

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和它所描述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的浮华和浮夸相反，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力求制止和控制自发地享受占有物，尤其是奢侈品。只有有节制地、精打细算地获得商品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据强调，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注意天命，利用

各种机会。因此，通过劳动追求财富和盈利只有在作为使人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时，才在伦理上被看作是可疑的。另外，强迫节约的禁欲主义和在某种固定的、合理安排的行业中严格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样在道德上是容许的和必要的，因为是奉命行事的。自信的新新教还攻击贵族家庭生活“令人作呕的风雅”。禁欲主义者们劝诱人们用纯洁的、严肃的和管理得很好的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取而代之。正因为自发地享受生活被看成是背离宗教和某种行业中的工作，所以新教形成了新的时间概念、对妇女的新型家长式统治以及对肉体没有先例的控制。通过闲聊、奢侈和纵欲浪费时间应该在伦理上受到谴责。精打细算的、机灵的和自我约束的新教徒坚持认为，浪费掉的每一个小时都可以成为为上帝的荣光而劳动的一小时。同样，舞厅里和封建庄园体育比赛中的装腔作势和自发性行为、小酒店里喝醉了酒的平民百姓的笑声变成了有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敌人，所有使肉体懒散的诱惑都被看作仅仅是使人脱离艰苦地、精打细算地追求的正当生活。

韦伯认为，新教通过成功地宣扬这些主张，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甚至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古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之前，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就已经把新型的（和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当作天意来证明是合理合法的。据说，无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由于他们的普遍贫困，都能经得起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诱惑（懒散、情欲和摆阔性挥霍浪费等）。服从上帝是低工资、现世的节俭和一一虽然是必要的——被禁闭在官僚主义的失业者济贫院制度中的结果。此外，宗教的禁欲主义如果渗入社会的下层，还可以为新兴的制度提供有责任心的、严守时刻的、朴实和非常勤劳的工人。这些“自我合理化的”工人进入了他们官僚主义化的劳动生活，好像这就是上帝的意志。

然而，韦伯最有深远意义的意见是，新教运动的经济影响往

往是在它的伦理狂热消退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消失了，让位于（至少在新兴的有产阶层中）安逸的和有纪律的资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的标志是只以某种“良知”作为补充的功利主义的市侩气。新教改良主义者们的种种努力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甚至并非所希望的结果。在这种非预期的发展中，有一种极大的嘲讽。在来自财富的种种诱惑——禁欲主义本身激起的种种诱惑——的压力下，新教的禁欲主义越来越屈从于世俗的消费主义并试图自我更新（例如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卫理公会的大复兴）。韦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铁笼子”条件下，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几乎已经完全消失。通过形式上的合理化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已经和过去的宗教支持分不开了，这种追求一度是以这种支持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有组织的宗教试图对经济生活的行为施加影响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这种发展的结果是非常虚无主义的。当前全面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使整个生活沉浸在官僚主义精打细算的冰水之中，不断地引起有关合法性的问题。牟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牟利的官僚主义化破坏了牟利自身的含义。那些从前沉浸在新教伦理中的人希望在伦理的基础上经营和从事商业，而我们则越来越被迫这样做：韦伯得出结论说，“职业上的责任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那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徘徊。”不仅为技术实力辩护的人不断地反对和削弱宗教，而且这些已经破坏了巫术的合法权力和传统的规范的“没有感情的感觉论者”和“没有灵魂的专家”提出官僚主义地掌握生活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通过技术手段和精打细算去掌握整个生活的能力的价值仍然很不清楚。这也是官僚主义化的进展就是主观和世俗形式的伦理理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原因。可以说，在官僚主义的社会里，现实变得混乱和混杂。现实的公开标志是“数不清的事件”和无穷无尽的“潜在含义”。

韦伯坚持认为，这完全不是一种倒退的发展。官僚主义化的进展彻底摧毁了个人能够清楚地理解整个现实的神话。现代世界从神话中解脱出来有助于最终消除自称全面了解某种客观整体的说法。行为的所有领域，尤其是科学探索本身的领域，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专门化阶段，这个阶段很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此，对现实的全面了解可以被理解为按了解者片面的、特殊的观点形成的片断的、主观的了解。显然，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命中注定没有能够分配神圣的价值和揭示宇宙真正含义的知识。在以官僚机构的效率和一种世俗的伦理虚无主义为标志的条件下，个人不得不在一大堆令人困惑、互相竞争的文化价值中作出选择；由于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意义不确定，所以他们从此必须选择他们自己的上帝。

保护客观性

韦伯强调，摆脱官僚主义化过程所引起的伦理虚无主义不是通过不加鉴别地依靠经验分析的科学。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唯科学的“现实主义经验主义”（门格尔语）形式的思想——以及在当时的方法论的争论（Methodenstreit）中为这种思想辩护的人，而他的方法论著作应该被解释为他对官僚主义合理性的局限性更全面的关心中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转弯抹角、常常发牢骚，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对韦伯的政治方案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从最早与罗歇尔和克尼斯进行论战之时起，韦伯进行的所有方法论和认识论斗争都可以被看成是试图理解一种拒绝官僚主义思想诱惑的社会调查的含义。他确信，唯科学论述的进一步扩散只会增加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在无规范状态的朦胧中进一步迷路的可能性。

这种信念是他关于文化科学的独特逻辑的新康德主义论点的

实质。韦伯并不总是自相一致地提出，至少有3个论据可以用来反对试图不加鉴别地推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首先，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逻辑**在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尽管两者所关心的事都属于历史文化进程的范围，但自然科学探索的是**普遍有效的**知识。它根据一般概念分析自然界实际存在的事物，指导用公式表示得到经验分析和理性实验证实的各种规律。与这种强调自然现象严格的和普遍的数量方面相反，文化科学的探索明确地把重点放在社会生活的**性质**方面，即放在社会生活在特定的或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上。至少按照青年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文化科学分析（例如对官僚主义）避免解释性地把特殊事件归入代表一般的即普遍有效的过程的事件；不像法则论的自然科学，文化科学所关心的是现象的具体个性（或历史真实性）。这就是说，文化科学不可能获得关于一般规律的知识。相反的，它的经验知识完全是通过把一系列特殊事件（被认为对现代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看作具体因果关系的结果而产生的。

其次，外部自然界是典型的无意义领域，而韦伯则强调，文化科学只关心心理方面和智力（geistig）方面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所提出的问题明确地不同于在精确的自然科学领域里所遇到的问题，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观察和解释事件的规律。毫无疑问，社会行动和自然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常取决于偶然的干扰和盲目的非理性的偏见。但不像自然现象那样，文化人还具有按照实际规范生活的能力。他们能够想象出他们自己，因此能够慎重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这些人主观地赋予他们自己符合惯例的活动以“意义（Bedeutung）”或“含义（Sinn）”。从方法论上来说，这一点对于社会文化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科学不能故意忽视理解行动者赋予他们自己行为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文化科学中，“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探索无视这些意义，因此必然产生从经验上和概念上来说使人误解的结果。这些现实

主义经验主义的探索自欺欺人地回避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这里考虑的是谁的知识？是从各种或然判断出发把行动者看作知识的对象的调查研究者的思想？还是行动者本人的思想？

第三，韦伯批评了实证主义同等看待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种种努力，因为这些努力错误地主张“价值自由”。这种批评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按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文化科学探索的努力必然受到虚无主义结果的不良影响。伦理的理想决不可能是积累规律似的经验资料的产物或结果。或者像韦伯坚持认为的那样，可以指望精密的、用数量表示的科学通过具体掌握上帝的杰出发现通向天国的道路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自然科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宗教的，不能产生代用的伦理行为规则，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在现代官僚主义的世界上生活是否有意义，不能通过参考经验分析的科学来决定。韦伯十分赞赏地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韦伯强调，从文化科学中排除伦理价值观念的努力是骗人的，因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合乎人性的、太合乎人性的”伦理原则总是指导对资料的选择。他重复歌德的见解：理论上的原则总是包含在“各种事实”中。这些原则或“评价的思想（Wertideen）”不是经验调查的产物或结论——仿佛文化科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可以脱离对这些对象的重要性的评价似的。从一开始，这些原则就推测它们调查的经验对象，使这些对象具有某种“价值关联”（Westleziehung）”；这些原则作为先决条件，使社会文化现实成为主观理论探索的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使得它们与众不同，值得重视、注意和分析。因此，在文化科学中，清除伦理上的淡漠既不适当也不可能：（按照康德的看法）文化科学的问题体系总是由一系列带有历史印记的具体问题构成的。这些问题成为某种有几分像制高点的东西，从这个制高点上——有意识地

或无意识地，明确地或心照不宣地——推断社会和自然界的现实值得加以分类、分析、理解、说明和评价。理想的典型分析——韦伯关心现代官僚主义统治及其不合理性是这种分析的一个主要实例——只是这些不可避免的概念调解过程的一种得到明确承认的形式。面对无限不断变化着的事件，韦伯的理想典型研究试图分析这种现实的有限部分；对于那些生活在现代的人的命运来说，这种现实是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有决定性的意义。理想的典型分析以某种程度的（但决不是绝对的）精确性理顺和澄清当代生活过程的潮流中所固有的混乱。

正是因为能够分析和澄清现代官僚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韦伯的文化科学分析自称达到了某种形式的客观性。在关心随着国家和社会领域里的官僚主义统治而来的种种问题的促使下，韦伯的研究确实公开否认国家和社会的地位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相当于不涉及价值的客观知识。它们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具有相当不同的、十分特殊的形式。韦伯的研究承认，它们的知识是在以某种明确的主观性为标志的范畴内并通过这种范畴构成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客观（Sachlich）知识承认它从属于各种概念和先决条件，包括认为这种知识对那些在当代世界上生活和行动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价值的信念。

韦伯一再说，就这种得到承认的主观性而言，他关于现代官僚主义统治的描述的客观性不能超越后者的虚无主义倾向。他的见解不能用公式表示最终的——从毫不含糊和不容置疑的意义上来说——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可以使政治义务具体化并得到保证。简单地说，他关于官僚主义的论述承认与那些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对它们毫无价值的论述无关。因此，韦伯的研究让自己扮演鼓吹者的角色。这些研究相信，关于官僚主义化过程的客观知识是值得获得的，这种信念必然以推荐的形式表现出来。

尽管韦伯承认他的研究是由其他研究的兴趣和关心决定的，

但是他认为他的研究对当代世界来说具有潜在的重要性。这种潜在的重要性产生于这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和其他有关研究澄清官僚主义化过程的意义，我们的行为就是按照这个过程逐步形成的。韦伯深信，由于日益盲目崇拜技术预测和相应地依靠常识作为伦理行为的仲裁者，所以文化科学澄清官僚主义合理性的意义的任务就变得迫切了。同这种技术性和伦理上的无知相反，文化科学研究是“对概念形成和概念设计的批判”。它首先关心的是使人们具有判断官僚主义及其不合理后果的能力这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任务。在一个自信有能力官僚主义地处理一切情况的时代里，文化科学知识所关心的是产生“不合时宜的见解”。它的澄清和挑战战略依靠从根本上分析区别“手段”范畴和“目的”范畴。韦伯提出，行动者或者是为了争取达到对自己来说有价值的目标，或者是为了争取达到作为达到更有价值的目标的手段的目标。

在这种范畴区别的影响下，韦伯的客观研究确实主张避免对那些为了自己的缘故追求某些目标的人作出判断。韦伯宣称，选择和追求这类目标归根结底是行动者自己的责任。就算有这种告诫，关于现代官僚主义的科学分析仍然能够说明实现各种向往的目标的官僚主义手段的适宜性。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统治实质上不合理的后果的论述当然是这种在起作用的说明过程的确切例子。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论述有根据地估计由于（必不可少地）依靠现在可以获得的官僚主义手段成功地实现各种目标（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特殊需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判断这些被利用的官僚主义手段对于达到这些目标来说是合适的还是不充分的。相反的，这些目标本身间接地受到韦伯的批判，或者由于选择使用官僚主义手段而被韦伯认为是能够实现的，即现实的。韦伯的论述以科学为借口不承认有任何指明行动者应该做什么的能力。然而，这些论述能够说明行动者为之而奋斗的基本公理或价值标准（例如新教禁欲主义的价值标准）。此外，这些分

析能够说明行动者能够或不能够达到这些价值标准的可能性，因此也能说明这些标准在本质上始终如一的程度。最后，而且符合这些手段一目的分析，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的论点推测使用官僚主义手段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虚无主义、抽象主义）。因此，那些有关的论点更客观地洞悉种种必然随着决定依靠合理的官僚主义手段而来的合乎需要的和不合乎需要的结果。

民主的命运

尽管对官僚主义实质上不合理的结果感到担忧，但韦伯总的说来还是坚信官僚主义的必要性。这种认为官僚主义是必要的信念成为他的分析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他深信，官僚主义的统治一旦确立，就不可能轻易地被摧毁。由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必要性，“官僚主义是那些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韦伯当然承认，普遍地用民主的、权力分散的和形式上不太合理的机构取代官僚主义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他认为，与现代官僚主义统治的连续统一体的这种决裂会采取倒退的形式：在国家和社会的领域里，这种决裂的结果是大大地降低技术的效率，因此也大大地降低物质繁荣、法律秩序和管理能力的现有水平。因此，放弃不切实际的争取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就变得绝对必要。被统治者如今不能没有官僚主义机构及其合理的、精打细算的工作方式。被统治者依赖有严密组织的、演奏家似的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局势，就不可能革命地建立全新的和民主的权力。韦伯坚持认为：“群众的物质命运越来越取决于私人资本主义日益官僚主义的组织的稳定和正确运作。消灭这些组织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像乌托邦。”实际上，在私人和公共官僚机构中，劳动和权力的等级分工超出了重建的范围。韦伯强调，甚至在短期内，工业企业家也已开始像医生那样变得可有可无了。

鉴于官僚主义统治的这种“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扩大和有原则地发挥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减少或克服它的不合理影响。就这种建议而言，洛维思说韦伯对当代大事件仅仅作出一种默认的诊断是错误的。韦伯一直认为，现在要完成一项艰巨的“政治教育工作（politische Enziehungsaibeit）”。韦伯坚信非个人的、以完成任务为主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机构现在需要向努力保卫和提高国家的主权和实力的**方向**前进。

官僚主义机构提出的基本**政治**问题是如何限制和利用它的技术专长。韦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是鼓吹一种基本的和明确的价值观念：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国家和社会事务中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被理解为得到军事力量和经济利益保证的感情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在一个由武装到牙齿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这就是政治成熟的含义：国家领导有能力给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官僚机构挂上国家权力的招牌。这就可以保护对外的完整性；在国内，这种领导有助于使劳动大众受到保护、**资产阶级化**和适应新的文化，并不断扩大高效的资本主义生产。韦伯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持久的外交和经济（以及军事？）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政治活力和具有神圣权威的统治的根源。通过有能力的领导动员全国也可以减少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遇到过的合法性问题。在“强权国家”和“外表上弱小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中，用行政手段改变一个群体所共有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政治记忆——领导者们求助于民族的“荣誉”——可以补偿对宗教和一切客观上证明是正确的价值观念丧失信心。

韦伯为国家强权政治所作的辩护同时也是为意志坚强的、热情的政治领导所作的辩护。在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领域里，韦伯极力反对施莫勒等人的看法，“真正的官员”必须参与政治，但是必须限于“公正的管理”。他在原则上反对 Beamtenherrschaft（官僚统治）——没有使命感的高级公务员作威作福的统治，正因

为在他看来他们的职权应该（而且只能）限于认真执行政治领导的命令。在政治家关于政治目标和战略的最后决定中，受过技术训练的官员的专长并没有合法的地位。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领袖的民主”——公务员的统治辅之以既没有使命感、也没有超凡魅力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同样应该受到藐视。

在官僚主义机构遭到普遍侵犯的背景下，现在所需要的是通过真正的政治领导保证政治优先于官僚主义。这种领导必须对它的所作所为表现出高度不可转移的个人责任感：在一个如果不这样就令人窒息的普遍和高度官僚主义化的时代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认识到文艺复兴和传统资产阶级的个体化理想。韦伯建议，理想的典型领导人必须体现至少 3 种决定性的素质。首先，真正的领导必须热情地献身于某种事业。对政治领导的忠诚应该是无条件的。创造历史和为他人确定价值观念的意愿只能产生于感情，并从感情中得到滋养。在这里，韦伯的伦理相对主义又重新冒出来（而且有损于他坚持民族国家的目标至上的主张）：为某种事业献身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只能来自信仰。尽管领袖们可以为“民族的、人类的、社会的、文化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目标”尽责，但他们必须选择和忠实地追求其中的一个或几个。

然而，第二，热情不应该屈从于“缺乏独创性的兴奋”（韦伯引用西梅尔的说法）。真正的领袖必须意识到他们的客观责任。他们有目标地争取权力手段的奋斗必须避免“自我陶醉”，相反的，在一切问题上都要力求负责地促进这项事业。他们争取权力的斗争应该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献身的同义语，他们亲自对这个目标的实现、结果和意想不到的后果负责。领袖们根据自己信念行动，所以对他们的行为要负完全的责任；他们不是他们的主人——选民——委任的代表。

第三，这又预先假定，领袖们的行为必须体现一种“不折不扣的均衡感”：能够恰当地平衡现实，清醒地和冷静地考虑现实。

韦伯的建议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准实证主义尊重。他认为，真正的、热情的和有经验的领袖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必须不留情面，而且必须有“能力面对这种现实并……在内心里符合这种现实”。有效的领导不等于纯粹的煽动，也不等于为权力而崇拜权力。热情的和负责的领袖愿意回避任何关于最终目标的不妥协的伦理观。那些依赖这种伦理观的人看不到手段和目标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他挖苦地指出，这种盲目性“恰到好处，而且听天由命”。政治上的幼稚实际上就是不受限制地追求最终的价值；这种幼稚病忘记了，不管怎样理解这些成对概念的内容，恶不一定就只是恶的产物，善也不仅是善的必然结果。相反的，谨慎和成熟的领袖必须受一种责任伦理观的指导。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正常的不足之处，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地努力考虑旨在通过依靠特殊手段达到特殊目标的特殊行动的可以预测到的结果。他们必须采取其手段和目的根据可能的结果和意想不到的后果负责地得到协调的行动。因此，在伦理上负有责任的领袖必须在他们的行动中考虑到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承认，达到某些好的目标靠的是（因此也受到损害）使用从伦理上讲是可疑的或者（在暴力行为中）甚至是危险的手段。

按照韦伯的最后著作，要求在伦理上负责任的领导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希望。当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代都出现过有超凡魅力的领导。然而，在当代的条件下，实行成熟的领导的可能性并非偶然地得到专制的、超凡魅力的成分的肯定，这些成分越来越伴随着官僚主义党派政治机构与立法机构相比日益扩大的权力。这种发展——韦伯认为这种发展在美国的总统制政体下最明显——增加了继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之后的将是甚至超越立法机构的没有领袖的党派机构的可能性。党派机构将服从这种领导，作为得到某些好处的回报。例如，在竞选中，有能力的领袖（“选举战场上的独裁者”，他用语言进行战斗）能够实际上提高

党的合法性，从而也扩大党员个人的职业前程。反之，党派机构会变成有利于领袖吸引群众的手段。但自相矛盾的是，在国家范围内的官僚主义化会促使献身的、负责的和有经验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能够肩负起现在的重担；或者像韦伯所坚决认为的，平民领袖的民主可以由此部分地补偿官僚主义统治的实质性不合理。即使专制的领导会限制和引导官僚机构的习惯势力，有效的、从技术上来说合理的官僚机构也会节制个人领导的创造力并使之合理化。

官僚主义的进步？

自由主义的学者们通常认为，韦伯的政治理论的主要难点之一是，他没有区别两种形式的领导：认真负责的、民主的领袖（例如格莱斯顿和罗斯福）的真正超凡魅力及通过狡猾的、残酷无情的蛊惑民心的政治家（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实行的具有有害魅力的统治。韦伯当然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进程越来越像“依靠利用群众感情的专政”。他也承认，这种利用行政手段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和采取行动的做法不同于（例如）科布登的知识分子式的演说，或者格莱斯顿一贯采取的“让事实本身说话”。此外，韦伯提出，政治制度可以根据它所产生的领导类型来评价。最后他承认，甚至真正的领袖也可能屈从于虚荣。真正的领袖“始终有变成一位演员、对他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掉以轻心和仅仅关心他所造成的‘印象’的危险”。尽管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韦伯还是不知不觉地被指责为坚持这种幼稚的假设：各种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能够抵制这种危险，而且总是具备政治判断力、成熟性和智慧。据说，他认真地把不同类型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被选中的军阀、蛊惑人心的大政治家、公民投票选举的统治者、在党的官僚机构里发迹的现代政党领袖

——混为一谈，这种说法不是不正确的。

然而，对韦伯的这种指责是很不全面的，只要这种指责依然纠缠在所谓杰出人物均衡民主理论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越过这个有限的范围来看，韦伯的遗产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它向一切持异议的政治思想提出挑战，尤其是否定可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统治理论。韦伯在1908年写给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著名信件中概括了这种挑战，他谈到："'人民的意志'、'真正的人民意志'这类概念对我来说早已不再存在。所有旨在消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的打算都是'乌托邦'。"

应该强调，这样来谈论韦伯的遗产所提出的挑战，是为了避免实证主义地批判他的论点。例如，几乎成了惯例的是强调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的描述不确切，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要加以修正，因为这种描述不符合官僚主义机构的现实，等等。正因为这种描述性假设，这种推断遭到了反驳：韦伯关于现代官僚主义机构及其不合理结果的描述是理想的典型描述。韦伯不断地（和正确地）强调，关于现代官僚主义现实各组成部分的描述性分析是永远不可能详尽无遗的。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时候，构成这种现实的事件在质和量上所受到的影响都是无穷的。因此，详尽无遗地弄清官僚主义机构具体现实的尝试是不真诚的，因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关于官僚主义进程"运动规律"的明确和详尽的科学知识是不可能获得的。韦伯正确地认为，一切有关历史文化事件长河的知识都是产生于特殊观点的知识。这种知识受关于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的制约；反之，这些判断或评价性看法又支配或使调查研究者在其中进行调查研究的历史时期具有特性。

因此，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统治的描述采取借助理想的典型概念，公然片面地或教条地强调其非常分散和不连贯的某些方面的形式。由于这些概念排除大量对研究来说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事件，

所以这些概念不仅仅是描述某种先存的官僚主义现实。这些概念不是官僚主义经验特点同一的、真实的和忠实的复制品。这些概念必然而且明确地不考虑官僚主义机构的许多特殊方面和一般方面。韦伯的官僚主义理论采取在概念上重建现代生活的形式，而在历史现实中简直找不到这种理想的、纯粹形式的现代生活。这种重建产生于通过想象的思想过程强化和浓缩的经验，以便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多种经验。总之，这种分析从来没有详尽无遗地论述官僚主义的客观意义；不完整是韦伯研究官僚主义的方法论的一个逻辑上必然的特征。由于概念和概念的对象处于一种永远变化不定的状态，所以这种研究必然是暂时性的、"永葆青春的"。这种研究始终是它自己规定的目标："对任何'无稽之言'既不让步也不掩饰"。

就这种研究所承认的没有围绕着它的目标进行——实证主义批评家们恰恰忽视了这种承认——而言，韦伯的理想的典型描述可以被分析和批评为乌托邦式的描述。由于不能建立一个可以表示官僚主义现实的本质的完整的、普遍有效的范畴体系，所以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的理想的典型论述永远会受到进一步的质问和抛弃。这种论述不可避免地引起它未曾涉及或预见到的新问题（例如关于官僚主义机构的其他局限性的问题）。

韦伯不关心这些问题，这和他的下述论点是一致的：任何无限复杂和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只有某些方面才是值得了解的——尤其是被认为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那些方面。然而，这种先决条件引起了标准的反驳：对谁有意义？这种反驳使人联想到，韦伯为官僚主义的绝对必要性所作的辩护有一个自我毁灭的弱点。如果认为，在19世纪理论论述的语言中，合理的官僚主义这个概念是一个语法错误，那么，韦伯想当然地认为他关于官僚主义的描述无论如何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就确实难以理解了。这种过于自信的推断压制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理论争论以及关于官

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由于他依靠一种颠倒了的进化论而不无争议地得到强化。现代、古埃及和没落的罗马帝国的综合比较；对官僚主义刻板化的“进步”的评论；放弃虚假希望的告诫——这一些和其他一些主张都暗示，韦伯为官僚主义所作的理想的典型辩护本身是以关于世界历史进程当代阶段的倒退性的先验的、不言而喻的悲观假设为基础的。

然而，这种假设遭到韦伯另一个论点的反驳：认为官僚主义化进程成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种不确定性论点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含义：只要官僚主义化进程在变化，就必须承认，有关这个进程的新的“事实”、各种问题和解释就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承认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官僚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被认为是不民主的而遭到反对（见论文一）。站在这种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而斗争的高度来看，韦伯的论点显然被用来为官僚主义机构辩护。韦伯傲慢地假定进一步怀疑官僚主义的统治是多余的。相反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压制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必要。这种假设构成他关于官僚主义的描述的遗产，这种描述的作用是压制关于一切官僚主义的独裁、自相矛盾、因而不是逻辑上必然的特性的进一步讨论。

至少有3个相互关联的例子说明这种压制的作用。首先而且最明显的是，韦伯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公”“私”官僚主义机构的技术效率。可以回想一下，他认为官僚主义机构不停顿的进展就是它在技术上占优势的结果。只有官僚主义才能依靠它的速度、精确性、成本效率、毫不含糊和等级制的统一充分和有效地对付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这种理想的典型评价（正像论文三详细地论证的）没有考虑到官僚主义形式长期存在的低效率、即从技术上来说不合理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谈其中的两个方面。首先，韦伯没有充分分析不同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会在公民社会各个

领域和国家的内部之间不断引起骚乱的程度。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疏忽，因为他为现代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的要点之一就是现代资本主义能够保证社会和政治官僚主义机构的区别。因此他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逻辑、资金供应方式和目标与国家行政机关决不完全相同。例如他指出，国家政策的实质可以经常面向非经济的目的，从而限制资本主义的、合理的、精打细算的追求利润。他也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化进程的特征始终是不平衡。

韦伯决不可能系统地发展这些看法，正因为这些看法会严重地损害他代表官僚主义行政机关形式上的合理性提出的种种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私官僚主义机构不能自动地或官僚主义地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的内部运转方式不可能有计划地获得一种机器似的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受到在往往不稳定和变化无常以及充满矛盾的环境中协同或反对其他（公司、教会、工会、国家）官僚主义机构的压力下，官僚主义行政机关被迫破坏拒绝逐个处理的原则，参与各种判断并在不能利用可以精确地运用的固定不变的客观规律的情况下作出各种决定。在一直不稳定和经常动乱的环境中，稳定地达到有组织的目标取决于官僚主义结构本身的不断变化。这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考虑特殊的人和情况”是一切官僚主义机构都不能实现的口号。官僚主义机构不可能依靠彻底和一致地运用于每一种情况的抽象的一般规章制度始终如一地达到各自的目的。实际上，试图严格地通过这些形式上合理的规章制度监视和控制所有情况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地发生各种不同性质的竞争和斗争，而这些竞争和斗争又具有在内部瓦解官僚主义机构的作用。相反的，这种竞争和斗争的长期存在阻碍着社会和政治生活在形式上的合理化。官僚主义化的进程表现出明确的不平衡性或缺乏一致性。因此，不断努力调整、改组和重新部署指挥系统——例如通过阶级合作形

式的决策和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也是官僚主义机构的标志。官僚主义机构不一定经常强迫自己小心翼翼和“谨慎行事”，这是僵硬地、学究式地怀疑经验主义和脱离常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不一致的、往往互相矛盾的观点来看，日常生活的官僚主义化达到了不同的程度。

其次，这种对公私官僚主义机构形式上合理的运转方式的环境限制由于这些机构内部的类似困难而象征性地强化了。韦伯当然知道历史上官僚主义生产和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形式上的合理性遇到障碍的许多例子。然而，这种了解并没有有意识地被延伸到现代。韦伯的论述再一次严重地夸大了官僚主义机构能够而且确实按照一种基本的效率标准、即“不考虑人”并按照抽象的一般规律行事的程度。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尤其是当他谈到容克地主们的政治权力时，韦伯偶然也承认这一点。然而，他有意识地低估其意义妨碍了他去分析官僚主义机构能动的和扩张主义的特性。必须强调，官僚主义机构形式上的合理性长期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是官僚主义机构具有一种在权力范围内即使不是不断地扩大也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的倾向的最重要原因。在官僚主义机构的上层中，特殊的个人或集团通常根据自身的利益占用和分配权力资源。作为他们“谋求更高地位”（马克思语）的结果，官僚主义的精英人物通常不能系统地阐述并有成本效率地、隐名地完成他们的使命而不考虑特殊的人。

正像诺伯特·伊莱亚斯首先指出的，被官方称之为官僚主义机构必须履行的职责和需要的东西，总是由争取权力的斗争和权力的垄断化来确定的。与这种看法相联系的论点也许非常熟悉，以致不需要再一次详细说明。不管官方怎样声明，官僚主义机构并没有完全消除利用担任公职获取“超额收益和报酬”。各种形式的裙带关系、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以及简单的亲信关系，都是国家和公司官僚机构并非不重要或例外的特征。各级官僚主义机

构工作人员的任命和安排决不是时时处处都根据毫不含糊的职务标准来进行的，就好像职业机会和任务的合理分派不受点头和眨眼、游说、不够格、拖延、威胁、部门间的斗争、政治分肥和事倍功半等的妨碍似的。在公私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之间的竞争中，掌握领导权的人办事并非完全 sine ira ac studio（没有火气和热情）。他们倒是不断地力求把机构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通过增加部门和职位、无视人为控制和非生产性职能的增加、为受他们保护的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地位的稳固、消费和收益等等来增加自己的优势。勒福尔正确地指出，"官僚主义喜欢官僚，就像官僚喜欢官僚主义一样。"最后，官僚主义的掌权人还典型地通过自称掌握着知识和高级机密、通过（从一开始就）隐瞒自己的计划和意图，力求增加他们的指挥权。尤其是在高级官员中，有权接近技术细节和知识就等于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像马克思已经强调过的（也像韦伯有时所承认的），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倾向于变成秘密会议的管理。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是一种知识、信息和秘密联系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权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是它能把专门的和官方的知识变成官方的机密、秘密材料和专业知识。

毫无疑问，这种倾向还可能大大地扩大。不过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更全面的论点：与韦伯的描述相反，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地暗中破坏它自认为能够按照形式上合理的规则经济地和有效地完成自己的职责的断言。官僚主义机构不可能永远是中立的，好像它能够把自己交给巧妙地要求它一丝不苟地提供服务的任何一种权力支配似的。

这种论点当然得到了充分的注意和广泛的领会。然而它是一种并不经常得到承认的政治含义的载体。简单地说，韦伯过高估计公私官僚主义机构能够而且确实按照严格的、形式上合理的规则行事的程度，直接损害了他的下述主张：公民在独立自主形式

的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对有效的官僚主义行政管理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机能失调，因此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诚然，或者像韦伯所说的，现代争取成立符合宪法的民主政府——争取建立一种承认全体公民形式上政治平等的政治制度——的斗争到处肯定地促进了官僚主义行政管理的发展。现代群众民主政体典型地采取了官僚主义化民主政体的形式。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被统治者的平等权利等要求加速了旧式特权、尤其以出身为依据的特权的毁灭。

然而，至少在国家这个领域内，这些要求已经促使官僚主义行政管理向显要人物的局部统治发动进攻。通过官僚主义机构安抚被统治者——韦伯称之为“被动的民主化”——是老百姓争取群众性代表制民主的斗争一个意想不到然而又是直接的结果。

然而，韦伯指出，未曾预料到的结果是官僚主义和代表制民主之间心照不宣的联盟的特征。尽管原先支持官僚主义化的进程，对民主的要求却越来越经常转而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按照韦伯（并非不准确）的观点，为实现与形式上的代表制民主相联系的更实质性的原则而进行的斗争，与官僚主义的统治及其独裁主义指挥、保密和压制批评的倾向肯定是有矛盾的。要求任何人都能进入办公室、民众选择和撤换行政官员及其下属工作人员，也直接危及官僚主义机构的精确运转。因此，韦伯得出结论说，争取民主的公共生活（无论是在经济领域里还是在国家领域里）的斗争会给官僚主义命令的顺利表述和执行造成“技术上不合理的障碍”。

按照他的观点，官僚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之间的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得到缓和。他提出，公民投票产生领袖的民主制度有利于真正的政治领袖的产生，这些领袖既可以成为群众的自由受托管理人，同时也可以成为群众实际上不能约束的主

人。由于韦伯坚持过高估计官僚主义机构的技术能力，所以他的提法看来非常难以置信。

实际上，在官僚主义机构实质上起不合理的作用（韦伯论述过）和长期在技术上无能的情况下，韦伯反对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理由依然显得十分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根据。

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的理想的典型论述中的第二个内在弱点大大地强化了这种暂时的结论。这第二个难点和第一个难点不是没有关系，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后者的延伸。应该说，韦伯的论述从根本上低估了官僚主义行政机关这个“无生命机器”激起对公共行动提出新要求的能力。指挥与服从的等级关系无疑是一切当代官僚主义机构的典型特征。官僚主义机构把它们的根子深深地扎进了一切人际关系；正像韦伯指出的，它们都有重要的持久特性。它们倾向于变成处理例行公事的机构（Alltagsgebilde）。然而，在官僚主义机构内部，个人和群体是一部有力的、精确地运转的机器非常非政治化的齿轮。被统治者受到挫折并非官僚主义统治顽固的形式主义和好管闲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梦魇似的结果。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不仅时时处处都倾向于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正像卢卡奇坚决反对韦伯时所说的那样），而且成为工厂和办公室领域以外的各种权力斗争的对象。这些斗争除了影响这些机构的改组和调整运转方向外，还造成争论、审议和决策等非正式公共领域趋于活跃的条件。

韦伯当然坚持认为可以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排除冲突。冲突的手段、目的和“冲突双方”完全可以是偶然的，尽管冲突本身不可能永远被消除。在这种公理的指导下，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官僚主义化进程是充满冲突的。举两个韦伯提出的例子，过去现代化曾在美国引起庄园主贵族对城市资本的血腥抵制，在欧洲引起传统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权力集团（例如罗马天主教和路德

教教徒）反对城市理性主义文化传播的斗争。[①] 在此时此地，韦伯参加社会福利政策协会对工业劳动过程的调查提醒他注意工人抵制官僚主义化劳动的各种形式。关于未来，韦伯也考虑到冲突很可能会成为自上而下独裁地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征的程度。这种官僚主义的独裁主义很可能会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的扩散、为工作条件举行的罢工、联合抵制和强制解雇不得人心的管理人员。

韦伯令人遗憾地没有进一步论述这些意见，恰恰是他偏爱把官僚主义当作稳定的指挥与服从系统来进行理想的典型分析的结果。进一步的思考使人想到，他过于自信地假设，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会在被管理者当中确定不加思索地遵守规章制度的方向，这种假设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偏爱。他想当然地认为，很少人注定要作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为政治而活着。对于韦伯这位民主的杰出人物来说，"相对来说少数人首先对政治

① 从下述论据的观点来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从来没有深入和系统地分析过这些斗争。因此可以说，他关于官僚主义化进程的论述严重地低估了各种抗议运动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一种其历史尚待编写的作用。这些集体抗议运动构成了现代官僚主义社会形成、提出挑战和改变方向的过程的组成部分。这种抗议有时采取反文化的形式（例如塔波尔派的千年至福论、英国的泛神论、浪漫主义、公社运动），这些反文化以它们所谓的自然的、自发的和非常有感情的生活方式反应性地反对官僚主义化的人为状态。在另一些时候，这种集体抗议围绕着谋求分享国家或社会权力或分散这种权力的政治运动（例如加尔文派教徒、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工人、妇女、农村民粹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地方分裂主义者的运动）组织起来。在现代化状态的整个早期阶段，这些反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是典型地分散的（即本身并不一致），往往有极大的地理差别。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运动，它们不能完全控制、阻止和改变官僚主义化的进程。因此，它们遭到暴力镇压、同化或处于内部蜕变和自我毁灭的过程。至少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它们很少与规模很大、强有力的抵制"理性时代"的联盟——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是最后一个重要的实例——结合起来。

生活感兴趣，然后才对分享政治权力感兴趣”，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是少数人的法律——由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优越的政治机动性——决定政治和社会活动。只有少数人力求通过使有组织的政治成为利益和收入的永久性来源靠国家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时时处处却自然是一种业余爱好。

广大公民群众只能是官僚主义统治集团的勾引对象，这种信念得到各种——非常矛盾的——言论的支持。有时候（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而且多半涉及古犹太先知的超凡魅力），韦伯设想官员们和其他人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领袖们及其事业所吸引。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们能够引起其他人甘愿无条件追随他们，这种能力大大地促进了自愿受奴役的趋势：“在内心深处，为一位领袖工作本身更令人满足。”在其他场合（在使人联想起古人的语言中），他读到，建立“老式”的直接参与民主的种种努力（例如在瑞士各州所进行的尝试）总是蜕化为贵族式的民主。他坚持认为，政治上的卷入总是伴随着放松争取满足经济需要的日常斗争。至少在一个地方，他甚至声称，当代人口分成积极分子和（大部分）消极分子，是真正自愿选择的结果。这种“自愿无权”论点的必然结论是，增加公民卷入的程度和质量的尝试（例如通过颁布强制投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最后而且最似乎有道理的是，韦伯说，在当代官僚主义条件下，群众的非政治化只是有纪律的、公民投票的和机器似的政治进程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政治上消极的公民产生领袖，而是政治领袖力求通过蛊惑民心组织、招募和赢得追随者。这是韦伯试图作出的解释中最可信的解释，表明为什么那些要求彻底民主化的人反过来总是被他恶狠狠地斥之为“夸夸其谈者”、“乌合之众”、“暴民独裁者”和相信“反政治的哥们义气”的人。

这些解释中最诚实的解释也是最有理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准确地提出，非政治化是国家和社会领域里官僚主义地组织起来

的权力关系的基本组织原则。然而，韦伯的解释同时也是自我限制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了解，在当代生活的所有领域里，这种非政治化不断地产生政治化的反倾向，即要求独立自主地论述、改革和改组官僚主义机构。公私官僚主义机构的运转方式中的基本分割状态或矛盾不断地产生这些独立自主的要求和斗争。可以说，所有的官僚主义机构都是按否定它们实际成为官僚主义机构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不能依靠诸如求助于专家鉴定、客观的规章制度、对名利的追求、支付工资和薪水以及责任感之类非个人机制经常保证它们的工作人员和委托人遵守纪律。正像韦伯正确地强调的，官僚主义机构力求通过运用抽象的、形式上合理的指挥规则使它们的工作人员遵守纪律和非政治化。实际上，任何官僚主义机构规模越大，它的活动就越是多样化、专门化和分门别类，这些协调和控制的管理机构的规模就越大。

然而，因为这些严格执行纪律的机构不断地挑拨离间各级个别的工作人员，所以官僚主义机构的指挥者不断地被迫恳求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工作人员积极地、有控制地参与活动，而官僚主义机构本来是力求使他们作为不活跃的、缺乏独立精神的对象非政治化的。在官僚主义机构中，麻烦的根源是，它必须默认它充满了具有首创精神的特殊的群体和个人。官僚主义机构无疑始终倾向于把它的工作人员和委托人变成单纯的“执行者”。假定这种倾向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如果仅仅因为引起了积极的抵制，因为对各级工作人员的首创精神的依赖会彻底遭到挫折——官僚主义机构就不得不欢迎其工作人员的参与，于是后者的一切首创精神和控制手段便遭到禁止。官僚主义机构要求它的成员和委托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绝对的具体化是不可能的。大量印发的报告和备忘录，堆积如山的文件，越来越多的会议，用阶级合作的办法调停冲突的趋势，“参与”、权力分散和共同协商等现象，宣传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下述事实的表现：官僚机构是靠使其下

属人员参与但又拒绝给予真正的自主权而存在和发展的。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取决于虚假的相互承认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都同时**预先假定**、**否认**和**期望**调节独立自主的公共关系的理想。

就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分离状态以及与之有关的冲突而言，韦伯所强调的官僚机构机器似的特征不是逻辑上必然的。官僚机构的统治是为权力的分配和可靠性而进行的（潜在的）公开的民主斗争的并非总是可靠的手段和结果。韦伯认为，形式上合理的机构扩大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可能导致一个新的、由无精打采的人组成的、机器似的农奴制时代，这种担心是使人误解的夸大。官僚主义的指挥系统不能永远妨碍各种在政治上得到保证的个性和以价值为重的行为。从这种行为的立场来看，这些指挥系统都是非常互相矛盾的组织形式。甚至在按照它们自己宣布的精打细算的技术合理性标准来判断，官僚主义也必然被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过程。因此，韦伯认为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在当代官僚主义条件下是行不通的，这种看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在当代生活的所有领域里，官僚主义过程压制又鼓励独立自主的讨论和决策的公共领域的扩大。

最后要讨论的是韦伯根据全国自觉公民投票选举领导人的原则为官僚主义统治所作的辩护中第三个没有解决的难点。这个没有解决的难点的由来是他没有进一步分析他为**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原则辩护的可能性的条件。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一贯认为关于价值判断有效性的判断始终是一个信仰问题。从他的判决主义观点看来，不可能确定并科学地证明据此能够毫不含糊地得出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办法的基本伦理原则。所谓的最终目的，以及甚至由数学和自然科学产生的表面上可靠的知识，往往是可以争论的，因而在时间和空间中常常发生变化和转化。因为可能的最后价值标准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各种价值标准的斗争永远不可

能导致一个决定性的最后结论。"我们应该为哪一位战神服务?"这是一个在官僚主义时代永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暴露了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有效性。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严重，因为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和按惯例安排;由于陷入复杂的官僚主义分工，个人至少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先为这位神祇牺牲自己，然后为那位上帝牺牲自己。于是，在现代条件下，古老的多神论重新出现，不过是以一种不使人着迷和不具个性的形式。韦伯强调，这些神祇不是也不能和平共处。他们争取潜在的信徒，互相无休止地斗争。

正因为最宝贵的最终理想是不确定的和暂时的，所以现代世界的居民再也不能让生命像自然界的某种事件那样流逝。韦伯坚信：解决神祇们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个权力和政治问题。我们这个多神论时代的最高理想始终体现为相互间的斗争。韦伯坚持认为，"每一种对别人的**愿望**富有意义的**价值判断**必然是根据自己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作的批判，必然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反对**别人的理想**的斗争。"

韦伯为受全国自觉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指导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反民主目标所作的辩护，无疑是符合这种多神论原则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他反对民主的公共生活——为官僚主义统治的**必要性**辩护——是否反过来与这种多神论、斗争和争执的原则一致。进一步的思考使人想到，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的，他不承认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和他承认价值相对论从逻辑上来说是矛盾的。他没有进一步批判地考虑实现多神论的斗争所必需的制度上的根据或条件，就证明了这种自相矛盾。显然，多神论的原则，即假定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包含着本身在政治上得到实现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例如，理想能够而且必须具体表现为和其他理想的斗争，这条准则不言而喻

地以反对否认这条准则的一切主张和情况为前提。相反的，在这一方面，韦伯的多神论基于这样的主张：原则上能够而且必需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或一致意见，以便促使各种独立存在的原则永远争论下去。行动者很可能已经而且总是不言而喻地同意意见不一致。

此外，对别人的理想所作出的每一种有意义的评价必然包含着从自身立场出发反对其他人的价值观念的论战，有条件地同意这一点就包含着这种争论能够永远和不受限制地在其中进行的制度性条件。本质上合理的决定的隐蔽的任意性，归根到底不可能像韦伯所以为的那样基于前理性的决定或唯我论的信仰行为。隐蔽地遵守和捍卫各种规则的决定正像韦伯所理解的那样，倒总是必须取决于主体间构成的讨论、争辩、作出决定和不服从的公共领域。只有在不受限制地辩论和有许多制度性机制保证这种辩论的条件下，行动者才能熟练地、胜任地、或者甚至最低限度地捍卫他们的理想。韦伯为官僚主义所作的辩护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悖论：多神论的原则包含着对民主的公共生活的诋毁（他对实质性的民主的驳斥就是一例）。这个原则设想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形式，关于这种形式的有效性，行动者必定已经同意——换句话说，它假定现有形式的公共生活是有效的，行动者能够求助于这种公共生活，而且只有依靠这种公共生活才能反对（或同意）其他人的理想。总之，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是一个反事实，是一个必须建立的条件，如果韦伯所捍卫的那种价值相对论要得到公认的话。这个条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应该”，它采取一种受外界支配的形式被推荐给在奋斗中的行动者。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行动者可以决定暂时满足这个条件，以后再拒绝这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仅仅是许多条件中的一个条件。相反的，不可能放弃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反事实地预期的条件而不同多神论原则相抵触和完全抛弃这个原则。

尤其是，假定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技术优势和实施纪律的能力的理想的典型论述是难以置信的，那么他不承认这种诋毁就使本文所提出的全面指责更加有力了：韦伯明显地不能证实保护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不受官僚统治的"进步"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马克斯·韦伯去世以后，就要由别人来详细回答这种指责了。

论文三　一个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

福利国家使人为难的奥秘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变成破坏性的……，然而它的废除却可能是彻底毁灭性的。

——克劳斯·奥费

走向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

在马克斯·韦伯去世以后的几十年里，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性或片面性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普遍的兴趣。许多哲学、政治和美学著作就一个崭新的、铁板一块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和没有反对派的世界的出现提出了警告。至少在德国的理论传统中，特奥多尔·阿多尔诺的著作也许是这种关于片面性的论点最使人感兴趣和最有洞察力的说明。阿多尔诺的论证公认地被某些欠缺和疏漏所削弱。这些难点无疑妨碍进一步考虑表示官僚制度化过程特点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已经很快变得显而易见了。然而，阿多尔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倾向的描述对于任何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来说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关于克劳斯·奥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对这种理论的新贡献的分析，就是从重新考虑阿多尔诺的论点

着手的，而且有三个特殊的理由。首先，阿多尔诺的论点正确地强调，非政治化的、官僚制度式的生活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其次，这些论点也提供了一个更当代的（即韦伯以后的）争论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可以重新考虑有关官僚制度合理性的局限性和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的问题。最后，和这一点有联系的是，阿多尔诺的论点突出了十分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局限性。阿多尔诺声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绝对地受官僚制度商品化过程的支配，这种看法尤其没有考虑到这个过程越来越取决于**非商品化的**国家权力关系。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阿多尔诺因此低估了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导致瓦解组织机构的结果和引起反对商品形式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斗争的程度。

阿多尔诺的论点当然众所周知地难以理解和复杂。不过他所特别喜爱的主题是明确的：他强调，资产阶级现代化过程的现阶段就是极权主义的管理。所有的晚期资本主义形态都受两条错误的（和互相联系的）组织原则——逐步扩大的商品化和物化——的支配。首先，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是按**等值**规则组织起来的，所有的商品都不得不根据等值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货币手段来比较和计算。其次，这种等值规则通过**物化**过程得到强化，其结果是这些商品偶然的和历史地形成的特点被它们僵化的和被崇拜的外表所掩盖。按照这两条原则——在这里将要讨论和分析——，所有的晚期资本主义形态都在制度化和保护某种“交换法则”。阿多尔诺强调，这种交换法则现在完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如何展开”。在交换法则的魔力的支配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居民越来越按有魔力的极权主义机构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些居民仅仅是商品化的动因，所以盲目地屈从于物化的交换过程，好像这种屈从是命中注定的。其结果是，尽管表面上看来具有进步和能动的特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却在倒退。它表现为陈旧的、充满神

话的、完全封闭的时代的形式。过去对商品化剥削的义愤和抗议——就像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典型地分析的那样——变成了过去的事。"整个社会组织通过大企业及其完全反常的技术已经……完全掌握了世界和想象。"

应该强调的是，不应该把阿多尔诺的论点看作在感情上悲观地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前景而粗鲁地予以驳斥。这些驳斥不仅典型地基于心理学的前提，而且过分依靠简单地从字面上解释他的著作。例如，阿多尔诺过分注意他自己的文字结构方式显然已经假定有可能与传统的哲学论述以及（只要这种哲学论述表达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日常生活的官僚式商品化和物化决裂。正因为当代资产阶级吹嘘现有秩序是正常的，而且要求"公民们"正常地说话，所以阿多尔诺坚信，对这个社会提出挑战必然（而且可以）包括对它的哲学的和普通的语言提出挑战。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熟悉和简单易懂的语言仅仅是摆脱唤醒批判的想象力这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阿多尔诺否定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对绝对知识的要求导致他抵制叙述性论述的假透明性。他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和物化，同时也是反对（相应的）哲学信念：静止不变的理论概念——同一性的思想——能够毫无遗漏地包围然后捕获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能动的客体。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同一性思想必然与"反辩证"、反官僚主义形式的论证相对立。通过某种改变方向的步骤避免落入物化的同一性思考的陷阱，阿多尔诺的反辩证的批判往往通过各种理论概念的集合来表达。这种集合力求通过相应地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理想的表现形式来引起一种"非同一感"。由于这种感觉是被占优势的商品化和物化强迫进入休眠状态的，所以阿多尔诺坚持认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应该利用反官僚制度的结构形式——例如谦虚的论文形式或片断的笔记和"分析"。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结构形式可以得到一系列叙述式批判技术的支持：重复和颠

倒某些句子（交叉）；拒绝给某些术语下定义；借助于嘲弄；使用夸张法，这种方法丑化它的对手，以便有效地揭露它们外表上的自然状态。

从本文的观点出发来看，阿多尔诺依靠夸张法是非常困难的。他关于全面管理的论点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论点确实被认为从字面上和事实上来看都是正确的，但从逻辑上来看当然是不可理解的。简单地说，如果受官僚制度支配的交换过程的虚假平衡和物化现在已经完全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就不可能有主见地和批判地意识到它们的霸权地位。阿多尔诺避开了这种相当明显的自相矛盾。他的全面物化论点倒是修辞学上引起人们注意出现一个全面受管理而没有政治反对派的世界这种吓人的可能性。反过来说，这种论点力求揭露那些导致宿命论地、消极地默认这种趋势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总之，他的反辩证的夸大是在探索“物化的爆炸”。

在追求这个目标时，阿多尔诺的理论设计既扩大了又破坏了韦伯以后试图把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重新变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官僚制度化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批判的种种努力。不像那些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欺骗和统治的新形式的不太正统的论点（例如马尔库塞提出的论点），阿多尔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马克思的图式。根据这个图式，可以想到，资产阶级产品化过程迫使生产者、他们的产品和大自然成为同质的物体，其重要性可以用货币来比较。在生产者看来，有潜在区别和不能比较的社会劳动及其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表现为相等“物”之间的关系。这些物的交换价值又似乎必然来源于它们作为以幻影似的——模糊的、不可思议的生命似的——品质作为标志的商品的属性。这就是说，生产者与自然之间以社会为媒介的相互作用似乎是可以比较和可以衡量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物体对它们的生产者有指挥权。

阿多尔诺盗用马克思的这个论点确实是经过一番选择的。例如，他没有对马克思的下述推断表示怀疑：物体的使用价值具有某种不成问题的直接性和透明性。同样严重的是，阿多尔诺实际上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是与榨取剩余劳动、危机倾向、阶级的形成和具体社会劳动的可能性等理论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阿多尔诺重新提出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仅仅是为了推翻它的中心论点：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整个人类处于被奴役状态和通过进步的斗争过程得到解放，根源就在于生产过程的辩证法。这种使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空谈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像韦伯本人已经通过多少有点不同的论据所指出的那样。然而，阿多尔诺削弱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论点的做法所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把批判理论的实际意图或政治意图排除在外。阿多尔诺盗用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好像这是一种批判性认识的理论，一种其有效和实现似乎不再取决于它所针对的那些潜在的政治主体。换句话说，与公开宣称的意图相反，他的反辩证批判倾向于使自己重新变成一种更加微妙的第一原理的哲学。它不知不觉地变成（用阿多尔诺自己的话来说）一种“第一辩证法”。

从另一种对我们与官僚制度化的关系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被改变了。按照阿多尔诺的说法，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和交换过程的“二重性”已经消失而成为一个虚假的整体：“交换价值为了自身的缘故被绝对享有。”在这里，阿多尔诺首次提出他关于极权主义地和无所不包地控制人类需要的基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由于交换价值无可争辩的霸权而不再自发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实物的商业化生产、分配和消费赐予交换过程以一种天生的有用性。然而，这个过程的商品化和物神崇拜的特点实际上并没有被消除，而是被肯定地扩大了。“交换价值……支配人类的需要，而且取代

这些需要；幻觉支配现实。”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或者像阿多尔诺所说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不再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逻辑具有批判的洞察力。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得不活跃了。辩证法失去锋芒，即现存生产关系作为绝对的必要而出现，标志着物化的资产阶级世界没有遭到反对便出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今天完全是一回事。……物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样受到控制。”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分成“两个敌对和对立的”阶级的预测不能得到实现。尽管阶级的区分和对抗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潜在冲突完全被抵消了。像奥德修斯的水手们不顾乌托邦的召唤一样，当代无产阶级在全面商品生产的魔力及其等价和物化原则的支配下劳动。世界的全面官僚制度化等于群众的麻木不仁和非政治化。他们的痛苦不能再被当作痛苦来主观地经受。各种政治冲突消失或者充其量集中在次要的问题上。革命表面上看来已经无限期推迟了。

因此，绝对的物化和商品化倾向于完全同化思想及其关键官能。阿多尔诺写道，“商品的偶像性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意识，而是从产生意识这个突出的意义上来说的辩证法。”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商品通过货币价值达到平衡和标准化相一致的是，数量上的相等成了这个社会的神圣标准和语言及思想的形式。新的和不同的商品被简化成可以计算、处理和任意支配的抽象的数量而变得可以比较。自然界、社会行动者和他们的产品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有公度的和认同的物的价值。凡是不符合实用和计算规则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可疑的。阿多尔诺大力宣扬韦伯对官僚制度化的进步的关心，“（交换）原则的普及迫使整个世界变得一致，变成一个整体”。阿多尔诺认为，在概念上把价值表述为可衡量的商品的本性似的特性和在哲学上把概念表述为它们的对象的等价物——认同思考，是同一个合理化过程的两个方面。认同思考就是官僚制度的思考。这种思考力求把不同的对象和过程表述为基本上有公度

的涵义，从而详尽无遗地知道它们的全部特殊性，其结果是这些对象和过程反过来被错误地认为和它们的概念是一致的。“真理”只能是准确地反映历史的，这种见解受到了压制。官僚制度的认同思想假设各种不变的常数，这些常数似乎存在于历史中断和变革的可能性之外。

阿多尔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化事业的兴起加强了这种官僚制度意识的优势。这些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设计的企业产生和散布老一套的认同标志。尽管这些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它们也随时准备（按照它们物化的、变幻不定的性质）表现得明白易懂。文化事业的产品鼓励人们去想像他们是跟上时代潮流的，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情况。工业化的新闻报道和文娱节目的泛滥使它们的消费者同时受到教育、感到迷惑和变得麻木不仁。因此，阿多尔诺坚持认为，高雅的文化和通俗的文化通过它们的官僚主义商品化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导致民主的解放，而是导致大众文化企业的“风格化的野蛮状态”（尼采语）。倾向于神话学的商品化文化完全肯定现状。这种宣称脱离实行官僚制度的工厂和公司构成的世界的经过加工的文化，把它变幻不定的要求和诺言说成是立刻可以由每一个消费者来实现的——而无需对现状进行一次政治改造。在这种文化的盲目崇拜的幻觉或“空想的神祇”的影响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点也不（与韦伯的看法相反）感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或不抱幻想的。

阿多尔诺坚定不移地认为，所有这些发展协力“移植”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现在具有十足自相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大规模的企业和随着商品化过程而来的合理化计划的出现倾向于消灭许多困扰过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无效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可能不太复杂和神秘的社会关系能够变得更加名副其实地可理解的可能性被这种社会关系比较虚

幻和迷惑人的性质所限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陷入了这种“抚慰”和迷惑人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变成这种假透明的牺牲品、商品化交换及其思想方式的体现者或因素。因此阿多尔诺同意韦伯的看法，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作为手段的、精打细算的个人主义现在逐步被消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无自由权状态和不可理解性（更确切地说是虚假的可理解性）标志着抽象的一般日益支配特殊。尽管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非商品化飞地依然存在，但是完全“过分社会化的”社会却征服并诈取它的个人成分。它们的心理实体（黑格尔的说法）在消失。一个完全商品化和非政治化的“后个人集体主义”时代即将到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第二天性”在它现有的成员周围固定下来。对它试图以启蒙和进步的名义合理地和有效地征服外部自然界的嘲弄是，它产生各种“盲目的自然界似的发展（Naturwüchsigkeit）”并使之永远存在下去。它的组织原则的历史性从而被掩盖。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都有明确的结构，好像这些关系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切事物都像是“命中注定的”，好像真实的生活是静止不动的生活，是**没有生气的自然界**。甚至反辩证批判把这些自然化的结果当作历史上产生的第二天性来揭露的尝试也倾向于被拖入当前这个僵化的深渊。向一个盲目的、全面受到管理的、官僚制度的不自由世界的过渡看来差一点就完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和奥费似乎一致同意这种预测。他们在进一步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同时，强调进一步运用旨在严格管理和控制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管理战略。现代资本主义秩序被看成进入了一个新的计划管理阶段。作为一切现代社会的特点的官僚制度合理化倾向进一步得到加强，并且越来越依靠复杂的有计划选择技术——依靠经验分析知识、职业化、预测以及处理危机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永远可以被动员起来反对破坏性的危机倾向。因此，哈贝尔马斯和奥费有时谈

到宗主国是“独裁主义的全面管理”制度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阿多尔诺关于全面管理的社会的论点。然而，这种和阿多尔诺的论点的共鸣是相当表面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哈贝马斯和奥费并不赞同阿多尔诺用“空洞的反省”来取代批判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他们看来，他的论点过分依靠抽象的一般警句（例如“第二个自然界”或“全面的管理”），然而这些警句的修辞价值倾向于掩盖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制度化权力和政治反抗的具体类型。此外，他们在明确地反对阿多尔诺的同时坚持认为，这种制度不能被设想为（甚至在修辞上）它的平稳和精打细算的统治是不可动摇的总体。他们指责阿多尔诺发展了一种与一度流行的极权主义统治理论相对应的左的理论。按照奥费的看法，“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产生地方性的系统的问题和大量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哈贝马斯则断言，“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就是要提出这样的假设：甚至在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发展也包含着种种‘矛盾’或危机。”

本文以下几部分所要论证的是，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著作中最没有异议的主题之一是，坚信社会和政治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意识合理化并非故意地没有意识到它的逻辑和局限。这个主题对于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理论来说有着极大的重要性。按照哈贝马斯和奥费的看法，官僚制度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像大自然似的袭击它的居民是不可能做到的。有组织的福利国家资本主制度不断地产生瓦解的作用。这种制度并非偶然的标志是，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商品化过程的周期性动态，国家的计划和公司的计划不一致，国家计划经常不能达到目的，群众的不忠和政治抗议带来威胁。这种发展决不是伴随着逐步消除不稳定和计划问题而来的后遗症，也不能被当作官僚制度诡计的产物和晚期资本主义无所不知的统治集团引起的各种“人为的消极性”来清除。奥费

和哈贝马斯正确地坚持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目前不能满足官僚制度统治所需的制度和群众忠诚等条件。与阿多尔诺的主张和所有关于技术文明或（就比较不成熟的表述来说）后工业文明的理论相反，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在合理化的极权主义方面使社会和政治生活变得千篇一律。

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

在详细研究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论据的逻辑、涵义和弱点时，首先应该扼要地强调提出几点重要的说明。第一，下面引述他们的著作时不要求详尽；这种引述更多地是为了分析他们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论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各自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合并。第二，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论点应该被看成是高度纲领性的，因为他们经常着重反对那些常见的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些论点的尝试。不应该论述这些研究，好像这些论述是已经完成了的结论性的经验陈述，因为这些论述至多只能被看成是作为进一步探讨和经验研究初步框架的理论表述。第三，眼前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对历史进程更全面理解的组成部分。哈贝马斯特别试图根据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期，这里可以概述一下这种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有助于澄清哈贝马斯和奥费对阿多尔诺的全面管理理论的几点反对意见。

哈贝马斯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与弗朗兹·诺伊曼、卡尔·波拉尼和谢尔登·沃林这样一些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早期现代文明化过程的经典解释非常相似。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描述。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自由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换关系占优势的程度。他把自由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社会进化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经济生产和交换领域摆脱了正式的亲属关系和国家权力关系的约束。这种发展与古代的（vorhochkulturelle）和传统的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生活模式形成强烈的对照。在中石器时代结束以前一直居支配地位的非常有秩序和稳定的古代社会里，年龄与性别角色以及亲属体系的礼仪和禁忌紧紧地控制着生产力的扩大。生产多半是为了部落成员的直接消费。随着国家统治的传统社会的出现，亲属体系开始交出它的生产权和社会化权力。生产成果的分配不再是亲属关系的职能，而是更加取决于能否接近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本身则由于家长制和宗教世界观这顶神圣的保护伞而合法化了。在这种按照以政治形式进行阶级统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传统体制中，城市与乡村之间和本地城市市场内部的非政治化交换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而且，因为技术革新是相当偶然的，所以对劳动力的剥削要么间接地通过政治手段强迫交付地租，要么更直接地通过强迫劳动。

现代化过程，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过程，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各地的现代化都成了合理化的劳动、贸易、运输和通讯入侵传统日常生活的同义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在阶级和国家指导下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已经开始盛行。资产阶级力求使独立自主的私人商品所有者之间分散的交换关系制度化和合法化。以家长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为补充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通过市场交换有目的的和作为手段的合理性得到解释和安排，它的劳资关系被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述为等价或互惠关系。诚然，哈贝马斯并不否认保持城乡无产阶级成员从属性的其他机制（家长制的和宗教的传统，暴力）的重要性。不过，等价交换思想日益盛行就等于传统的世界观丧失有效性。从这一点出发，“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自上而下地来自传统文化，而是自下而上地来自社会劳动”。市场交换关系——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看来是公正的，因为这种交换关

系是等价的。

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市场控制外部自然界冒充摆脱了强制的个人权力的市民社会和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的交换关系倾向于变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指导机制，变成政治权力和家庭生活领域内种种发展的起搏器。应该强调指出，哈贝马斯坚决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市民社会说成是彻底非政治化的、自我调节的、互惠的社会关系领域这种传统的解释——这是一种与以“自由资本主义观点”知名的历史学派相联系的解释。哈贝马斯在反对这种观点时强调，家长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是自由资本主义私生活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家长制家庭形式既是资本形成的所在地，又是父权和家庭传统内在化的根源。

哈贝马斯还纠正这种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重新提出韦伯的论据：市场交换关系的职能始终取决于现代官僚制度国家的税收、军事和立法活动。他强调，只有在绝对君主政体（例如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这样抽象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庇护下，才能成功地强制形成抽象的市场个人。中央集权的国家掠夺教会，镇压外来的敌人，敢于用武力来建立国内的秩序。这种集中管理机构的运转越来越脱离生产，决不能用新兴市民社会的需要或必需履行的职责来解释。哈贝马斯继韦伯之后坚持认为，现代国家机构开始体现一种特殊的权力。组成现代国家机构的逻辑是受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部需要和促使这些国家保护并扩大它们的领土、反对外来军事入侵的外部需要支配的。最后，哈贝马斯在反对“经济主义地”描述现代国家时提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是各种力求对这种状态进行辩护和/或批判的内在的政治论述。起先，这些论述极力反对用神学观点为国家权力辩护（例如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论述）。后来，有些人（例如洛克）在反对博丹等人的君权理论时，试图详细说明个人的基本自由并为之辩护，这些自由需要得到适应日益分化和能动的市场关系的公法和私法的保

证。

正是在这种论述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特性**的范围内，奥费和哈贝马斯都试图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越来越局限于一般地保证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协调**。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倾向于变成“自动调节的市场贸易的补充性安排”。国家力求保证各种有严格界限的社会领域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外再现。奥费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正是通过它强加给它的权力的物质限制进一步肯定它的阶级性。”根据这些物质上的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用税收、银行和贸易法来约束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动力，通过警察和军队来保护资产阶级的贸易和家庭生活，通过正式的法律来求得公正。所有权制度从而开始脱下它的政治外衣；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使之合法化的方式倾向于变成直接的经济结构和方式，而只是间接的政治结构和方式。这就好像这种社会制度可以分割开来似的：整个国家机构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协调和保护家庭的亲密关系和私人领域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私人领域里，摆脱了旧的“有害调节”的家长可以追求他们的利益和行使私下作出判断的天然权利。然而，哈贝马斯和奥费坚持认为，这种维护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国家的做法决没有取消形成阶级结构的过程。自由资本主义就是把这个过程非政治化为社会劳动和交换过程。换句话说，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阶级关系非政治化和阶级统治不明显”的真实迹象。

阶级关系的非政治化是受家长制家庭和“市场参与者的战略性功利主义方针”支配的，当然允许生产力有引人注目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曼彻斯特式国家变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使其生产力几乎自给的增长制度化的社会形态。这种制度真正与从前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消除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技术革新的官僚制度合理化所受到的传统束缚。然而，哈贝马斯和奥费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所梦想的非政治化的、普遍受到欢迎的阶级统治导致了相

反的恶果：无产阶级反对这种社会的形式和内容。对早期现代化所要求的周期性饥荒、苛捐杂税和征兵的局部性反抗开始被社会各阶级的对抗所取代。在利润率受到威胁和资本实现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被阶级斗争和使社会发生混乱的经济危机倾向所动摇。例如，哈贝马斯指出，以前的社会形态从来没有为革命变革的可能性如此担惊受怕和激动过。自由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危机倾向开始明显地同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已在其中被抵消的制度的思想相抵触。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自由资本主义患自身中毒症、繁荣与萧条交替的特点生动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真理：在这种合理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必然被这种社会发达的生产力和受阶级约束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彻底改变。关于互相竞争的个人之间的互惠和公正关系的空想——一种从卢梭时代以来就一直在理论上受到攻击的空想——开始在实践中消失。新兴的工人运动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不一致，开始意识到需要采取革命的行动以摆脱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固有的社会和政治暴力。

晚期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危机倾向自 19 世纪最后 25 年来的转移和劳工运动可能进行的政治斗争因此而受到挫折，在哈贝马斯和奥费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论点是，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富于战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转向。阿多尔诺深信，商品化的阶级结构形式（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仍然没有变化。他们的看法则相反，认为阶级冲突的减弱就是这种制度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他们谈到卖方垄断的经济部门的出现及其与相对来说有竞争的部门的区别。在后一个部门中，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力由于要取决于雇用工人人

数的（而不是技术的）增加而受到限制，工资率和条件要比工人组织得更好的寡头垄断部门低和差。相比之下，最明显的是，寡头垄断部门能够依靠国内和跨国的工资、商品价格、利润、消费、工作任务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不断地扩大生产力。

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在协商确定工资率的情况下，公司确定价格的出现特别关键。在寡头垄断的部门内，可以以与国家税收的范围和私营公司确定价格的权力相一致的提高产品价格的形式，满足通过工会提出的更多地分享盈余的要求。用货币来确定的一般价格水平主要由通过谈判确定的货币工资率水平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上各种盲目的自然力来调节："市场关系对于劳动力的所有者来说已经变成虚的而非真实的。"尽管这种价格管理制度和官僚机构关于工资率和条件的谈判经常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不利于无组织的雇佣劳动者和其他边际群体），但也倾向于促进阶级和解和寡头垄断资本制定投资计划的可能性。由于有组织的劳动力和寡头垄断资本变成价值理论的实践者，所以阶级冲突倾向于转变为公司和工会的谈判，它的影响又可以外表化。决定工资的机构变成捕捉有组织劳动力的计划网。这种计划往往由于工会和公司就国家和/或公司提供资金、被认为对彼此都有利的某些项目的必要性达成协议而变得更加重要。

旧的市民社会的部分改组使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倾向于下降的论点（这个论点本身是以关于有竞争性的市场的假设为依据的）变得更加复杂。此外，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假设——利润率趋向一致——需要按照哈贝马斯和奥费的建议来重新考虑。在他们看来，竞争性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寡头垄断性的生产和消费转变既没有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性，也没有完全消除其无计划的无政府主义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到阿多尔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盲目的自然发展的论述。他评论道，"寡头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扩大，

> 当然意味着**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不管有多少公司扩大了它们的时间观念，扩大了它们对环境的控制，市场的支配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只要投资的决定是根据公司利润的标准作出的……不管商品所有者私人独立自主贸易的范围在管理上受到多大的限制，也不会在政治上制定分配短缺资源的计划，只要整个社会的优先权表现为一种无计划的、自然界似的(naturwüchsig)状态——即作为私营企业所采取的战略副的作用。”

换句话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按照商品交换和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则、而不是按照公众确定的使用规则组织起来的，所以官僚制度的计划生产仍然表现出某种盲目性和不合理性。根据这个论点，盲目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只是部分地被强化的官僚制度计划所克服。因此奥费提到私人资本积累的“无政府状态的增加和减少”。哈贝马斯也谈到“经济进程的独立的周期性动态”。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十分明确地阐明资本主义商品化自我瘫痪倾向的逻辑。劳动力和资本继续周期性地被这种商品化交换过程所排斥，而不是自动地被结合在内，这一点看来毋庸置疑。但是，从关于当代经济危机的争论来看，这种倾向是不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投资出路的必然结果，由于有组织的劳动力增加了讨价还价的权力而降低了利润率的结果，或者由于科技革新的潜力耗尽导致生产率下降的结果，在哈贝马斯和奥费的分析中还是一个没有弄清的问题。他们认为盲目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尚未完全被克服，这个引起争论的论点当然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然而，坚持这种论点而不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周期性动态”的必然性引起不必要的模棱两可的解释，而且也许在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中引起理所当然的怀疑。

尽管在他们的论点中有这样的空白，哈贝马斯和奥费仍然坚持认为，这种不合理性和积累率的周期性下降不是直接通过公开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他们并不断言老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投票倾向、消费模式和家庭生活）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年轻的哈贝马斯还说（重复阿多尔诺较早提出的论点中的难点），由于没有实际上控制生产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大众在客观上仍然是无产阶级。虽然如此，奥费和哈贝马斯仍然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合理化和分裂导致了劳动力再分工并能够组织起来提出和保护它的需要。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集中化”趋势（“多数人的少量财产变成少数人的巨大财产”的另一种说法）的论点及其推论（客观的“劳动社会化”）都还没有过时。相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不平衡地和非常有偏向地分配财产和收入；劳动力的分工导致至少“收入的再分配暂时不利于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其他边缘群体”。这种再分工的过程倾向于促使民众支持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保守的政党，同时有利于把富有战斗性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各官僚主义政党之间有组织的竞争。

国家权力的扩大了的作用

官僚主义国家权力从性质上来看扩大了的作用是通过强化了的官僚主义计划转移危机倾向的另一个基础。据哈贝马斯和奥费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家权力的扩大一直是宗主国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普遍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特别关键，因为这种干预大大地有助于克服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分裂倾向。众所周知，这种变化是在19世纪晚期经济卡特尔化和劳资争议及关税争议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许多发展过程：政党逐渐从属于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出现了

专门操纵民意的政党核心小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经济动员。拯救自由资本主义免于危机只有按公司的形式重新安排才有可能。国家逐步开始同资方和有组织的劳方（或者得到认可的伪工会，例如在意大利）谈判；国家由于把资方和劳方纳入它的结构，消除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原有的两重性。这些发展早已在希法亭和拿弗他利等人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在科尔什、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得到承认，而且在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著名警告中得到强调："行将结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它的自由阶段。"

哈贝马斯和奥费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他们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已经和积累过程交织在一起，以致后者成了官僚主义的国家活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冲突的一种职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用上层建筑和基础的比喻来描绘。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已经重新政治化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这种分离已被两者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状态中相互联结所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是非政治的阶级统治，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统治只能以官僚主义的国家形式继续下去。在为特定目的进行的社会化生产中，（潜在的）对抗已经重新采取直接的国家干涉主义形式。现在只能在全方位政治协调的基础上实现私人控制的资本积累（用奥费最喜欢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商品形式的普及化"）。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进一步变成社会秩序的体现者"。

哈贝马斯和奥费在其他著作中为这个论点辩护时把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至少划分成两种不同的形式：（暂时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行使全面制定计划的职能及实施市场替代和补偿的战略。与不太精确的"国家干预"概念不同，哈贝马斯对官僚主义国家的职能的分类不是根据这些职能的范围或系统化；更确切地说，他的分析依靠某些关于重复积累过程所必需的国家活动的类型和国

家力求完成这些过程所使用的手段的假设。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机关努力在国内和国际领域里造成和保证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这些全面制定计划的职能的例子包括稳定通货、管理贸易和关税、力图（用军队、警察、法律）镇压这种制度在国内外的反对者，使税收和法制（银行结算，公司法）适应寡头垄断和竞争性的积累过程的动态。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中，某些全面制定计划的职能固然重要，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职能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倾向由通过精打细算的、用数量表示的、专业化的手段行使这些职能。全面制定计划的扩大和系统化的最新例子包括武装到牙齿和密切配合的国家军事/外交战略的扩展（这种发展哈贝马斯或奥费都没有充分论述过），以及力求通过一系列旨在控制投资与需求总体水平来节制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国内财政和货币计划——确定利率，给寡头垄断性资本和竞争性资本以财政补贴，提供或撤消政府合同以刺激或减慢投资的增长率，等等。

哈贝马斯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全面制定计划的活动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基本上是反应性的。只要“私人掌握生产资料仍然是经济进程的基础”，这种计划就只能对私人筹划的资本积累的种种要求作出反应，这些要求似乎不在国家决策的范围之内。就这方面而言，全面制定计划的政策应该区别于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第二种形式国家活动。

哈贝马斯和奥费强调，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积极地力求调整原来自由资本主义的非政治生产关系。与米勒、诺伊黎斯、布兰克和“国家派生”理论的其他鼓吹者的主张相反，这种论点不能被说成是一种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绝对脱离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或充分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论点。归根到底，上面提到的国家的全面制定计划的活动仍然长期取决于合理化的私有制。更确切地说，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论点真正的新意就在于它动摇了

米勒、诺伊黎斯、布兰克和阿多尔诺等人的观点：市场交换过程仍然是权力和控制的主要媒介。阶级统治的过程不再通过价值规律的隐蔽性展开。尽管货币形式延伸到早先没有商品化的社会生活领域（例如阿多尔诺曾经试图证明的家庭），但是哈贝马斯和奥费坚持认为，市场调节的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已经受到国家权力相对独立自主的关系的限制。（阿多尔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商品化的魅力已经至少部分地被官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打破。官僚主义国家试图依靠本身并不直接受商品形式影响的战略和组织形式维护家庭生活和商品化过程并使之普遍化。国家机构生产和分配并不总是受交易价值的逻辑控制和支配的使用价值。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部门里的非商品化规定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既促进又因为它的资本主义方向而阻止一系列政治关系摆脱官僚主义商品形式的可能性。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潜在的）具体劳动的被解放了的基础决不是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残余。它标志着这种社会形态已经引起的一种新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它依靠这种需要，但又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这种非商品化活动至少有两种主要形式：补偿和市场重置。国家的补偿活动——例如提供卫生设施和住房——旨在抵消引起抗议的官僚主义合理化的结果。哈贝马斯和奥费提出，这些福利政策的根源是同19世纪及20世纪初有组织劳工的斗争和政治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两点上，这种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补偿政策的新颖之处的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它低估了市民社会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已经成为国家和私人慈善和志愿援助组织所进行的多方面安抚活动的对象的程度。实际上，资产阶级作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现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通常取决于影响社会生活大多数领域的监督和惩戒机构的发展和普遍化。从17世纪起，医院、教养所和贫民习艺所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这些机构是打算确定、隐藏和限制那些行为古怪的人、乞丐、流浪

汉、被遗弃的妻子、酗酒者和疯子的，这些人既是文明进程的产物，也是对文明进程的威胁。在18世纪，这种管理失去理智的人的办法日益得到官方人口管理（为了婚姻、抚育孩子、接种牛痘等等而发起的运动）的补充，家庭“管理”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补充性惩戒机构的普遍存在使人对哈贝马斯和奥费关于这些机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颖之处的看法产生怀疑。其次，他们关于国家现在是补偿性政策唯一根源的含蓄提法忽视了私人福利、卫生和教育机构继续有效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官僚主义公司通过建设住房及娱乐设施和提供小恩小惠来控制劳动力。

除了这两种反对意见外，哈贝马斯和奥费强调国家补偿性战略在数量上的增长总的说来并不使人误解。他们准确地强调，国家行政机关通过其福利或补偿职能现在在承担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费用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生活实际上并不直接取决于这种制度的商品化生产关系的逻辑。哈贝马斯和奥费把官僚主义国家的这些补偿性政策和它的市场替代活动对比。他们把这些活动解释为对旧的市场机制已被觉察到的弱点和危机倾向的反应。这种市场替代战略所谋求的或者是鼓励资本主义投资，或者是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其新颖之处就在于试图在预期私人控制的积累领域里会发生动乱时提供积累的投入。国家力求在私人市场决策不提供或不充分提供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地方补充日益减少的资本供应。因此，市场替代政策就是对付危机的战略，国家通过这种政策对积累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的或已经觉察到的障碍作出反应。

通过这种政策，国家自觉地试图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地追求利润所造成的使社会分裂的后果。国家力求使生产关系免除传统的劳资冲突。“危机的避免成为主题。”这种用对付危机的战略取代市场支配力的尝试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通过提供正规的

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产生“有思考能力的劳动力”。这种有思考能力的劳动力——例如工业化学家、工程师和教师——可以被看成是用在自身的劳动力，其目的是提高直接的一级劳动力的生产率。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考虑到这种二级劳动力的扩大了的作用，通过直接生产者的不熟练（简单）劳动力生产剩余价值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不像在传统的、甚至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无计划地发展技术革新，这种由国家制定有思考能力的工人的生产计划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就其开创了一种更灵活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而言，国家的这种市场替代活动标志着马克思（在他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论点中）关于剩余价值率趋于稳定的假设已经过时。国家管理劳动过程只是国家更全面地有计划地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科技支援的一个例子。这种国家活动由官僚机构来安排的特点（大学经常为军事目的进行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暴露了那些认为当代科技进步是由科技本身的逻辑所推动而这种逻辑的要求又支配着科技本身的实践的人的错误。哈贝马斯强调：“技术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投资。”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在那时还没有通过由国家提供资金为军事和寡头垄断部门进行研究与发展而工业化。因此马克思可以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自然资源，就像水或空气。实际上，寡头垄断性的和军事性的生产过程的逐步“科学化”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时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通过劳动日的延长和犯人、妇女、儿童的强制劳动）开始让位于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化榨取相对剩余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联合一直是不稳定的。这种联合的过程不仅帮助寡头垄断部门消除各种技术革新的破坏性的不可靠性，而且还在这个部门内提高直接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减少资本的固定部分。因此这种联合有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尽管哈贝马斯承认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但他的假设却是，

这种发展已经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因为寡头垄断部门有了给有组织的劳动力支付较高工资的能力。科技革新通过官僚机构的计划直接促进寡头垄断部门内部的阶级调和，也促进这个部门内部有计划的生产合理化。哈贝马斯的论点是使人非信不可的：作为教条地为马克思最初的价值分析辩护，不能认为国家为避免危机而采取的这种战略是无效的而不予考虑。

边际性和合理化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替代职能和补偿职能都是政治权力对商品化生产和交换的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的表现。奥费和哈贝马斯都认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经济两重性已经开始消失。国家在试图防止积累危机倾向以一种直接的经济形式再次出现时，“同时填补市场的职能空隙，干预积累过程和补偿它在政治上可以容忍的后果”。此外，由于国家和市场领域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不仅国家行政官员在社会劳动和商品交换领域里承担某些职能，而且“社会权力”（主要是有组织的劳动力和寡头垄断资本）也承担直接的政治任务；国家在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国家机器有选择地特别优待（因此又依靠）这些社会群体，它们的屈从对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来说是关键。国家把某些责任和特权交给这些群体（尤其是资本家），维护这些特权对制度有利。

哈贝马斯和奥费依靠这个论点越出了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之争的有限范围。他们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被分析为阶级势力的被动工具及力求组织和改组许多利益集团的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和独立自主的主体。因为国家的全面制定计划、补偿和市场替代等政策的成功以及它的总预算款项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所提供的收入，所以国家必须继续执行自相矛盾的战略。与此同时，

国家必须既对私人积累过程**作出反应**（作为履行全部职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选择地**进行干预**（作为一个市场补偿和替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他们强调，国家对积累过程的干预是受到“结构上的”制约的；这不仅是国家、企业界和金融界内部行动者的个人联系、协同作用或共同社会出身等造成的结果。

奥费和哈贝马斯还认为，这种积累过程普遍政治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进一步削弱了马克思陈旧的“两大敌对阵营”论点的可信性。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纵向对立的阶级被社会和政治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差距的“横向”系统所取代的倾向——这是那些继续利用“劳动”、“资本”和“阶级斗争”等理论范畴的人所忽略的一种发展，或者像奥费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公式忠实地设想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的东西。奥费确实特别强调，国家在把决策特权交给寡头垄断资本和有组织劳工时特别歧视后者。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给予某些“发言权”来减少有组织劳工（潜在的）起阻碍作用的政治反抗。然而，授予某些方面的国家决策权的做法通常力求**剥夺**有组织劳工的某些“退出权”，以便防止他们对私人资本和国家的决策行使否决权。由于类似**贵人理应行为高尚**的双边效应，有组织的劳工要受一整套限制性义务的支配——例如，通过放弃与官僚主义决策程序所依靠的非政治化截然矛盾的要求和策略可预见地和负责地进行活动。这种限制有组织劳工集体收回其基本资源（劳动力）的能力的做法与直接支持寡头垄断资本联合起来的做法很不相称。寡头垄断资本的个别成员能够继续行使他们不投资的权力（因而破坏国家的政策）而不必组织雇主联合会。私人资本的权力仍然没受到挑战；相反的，这种权力是可以在阶级合作主义安排的范围内现实主义地进行谈判的一个条件。正是这种国家阶级合作主义战略的不对称效应经常在有组织劳工、国家和资本家之间引起新的政治冲突——例如关于通过阶级合作主义决

策机构作出的各种决定同样具有约束力的程度。

不过，这种冲突显然很难被说成是重复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对来说是同类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哈贝马斯和奥费都坚持认为，社会劳动领域的不稳定合理化和国家把由结构决定的特权给予有组织的劳工，就等于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分化或再分化。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或剩余价值和工资之间的比率）变得非常不稳定。许多蓝领生产工人和维修工人及有工会组织的寡头垄断部门和国营部门的所谓中产阶级男性白领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倾向于变成相对优先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劳动精英。这就是哈贝马斯有点隐晦的说法所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只是处于潜伏状态而已。

应该强调，哈贝马斯和奥费在这里不是指出另一种全面管理或**资产阶级化**的主题。相反的，他们认为，那些处于边缘地区和战略上不太重要的地区的人（例如住在收容所的人，依靠福利救济和养老金生活的人，土著居民和移民，经济上不景气的农村、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交通、卫生和住房等领域），在这种方案中都相对地被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越是集中和通过国家的行动来管理，整个群体的需求就越是被排斥在这种制度之外。这就好像自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贫困化开始让位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在结构上被忽视的”地区的贫困化。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种“边际化”的程度直接取决于更紧急项目——即力求平衡保证和促进私人投资而不引起价格膨胀的需要、充分就业、避免（或挑起）通过武力外交的重大军事冲突、国际贸易的繁荣和镇压国内动乱等政策——所需要的国家资源的程度。

因此，哈贝马斯和奥费坚持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立法、行政、管理、镇压和司法等部门都是作为“过滤器”或“分类过程”来运转的，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偏见。国家机构不受特定的政党、公务员和政治家公开表明的意图和诺言的支配，而积

累过程的支配，这是国家机构给政治需要下定义的先决条件。官僚制度的国家机构有计划地实施各种"非决定"。然而这也意味着，与此同时，私人资本利用方式中固有的潜在冲突不大可能爆发。自相矛盾的是，其他形式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却由于它们给寡头垄断生产部门带来的危险后果减少而增加。潜在的阶级冲突倾向于退居产生于在结构上遭到忽视的领域的由政治决定的新民粹主义冲突之后。这种冲突——经常反对管理程序不再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证明，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管理**不能满足一系列集体的需要"。

公开性和技术官僚主义的计划

通过了解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授予特权的选择性，奥费和哈贝马斯既能说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性偏见，又能至少说明为什么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方式现在倾向于变得更加技术官僚主义化的一个原因。他们多次指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受冲突支配的有原则的政治正在典型地被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和对付老百姓所取代。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决定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领域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人物之间进行神秘的和外人不得而知的谈判的结果。由于国家批准的政策越来越接近普通公民的生活，所以政治上的决策不受这些政策的直接控制。哈贝马斯和奥费在这里提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互相矛盾的政治管理规则之一：越是通过国家和公司的行动来管理这种制度的组成部分，就越是希望它们非政治化，希望它们在一种促进对职业、闲暇和消费的普遍尊重和个人选择的政治文化中奔忙。真正参与性的决策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减少并不是偶然的。哈尔马斯和奥费正确地指出，试图通过非政治化来保持群众的忠诚是这种制度的绝对需要。至少从国家行政官员的观点来看，一系列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那些

涉及私人占有社会化生产的事——应该不通过真正的公众讨论。

反之，国家机构处理危机的战略都要依靠必要程度的群众忠诚。不像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力求以不干预商品化过程中不露面的人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爱管闲事的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是中立的，或者是法律秩序、福利、民主、进步和繁荣的促进者。不像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比较隐蔽的统治，"政治机构所体现的官方权力发现自己不得不宣布和证明自己是有权力的"。奥费把这种绝对的必要性说成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群众对国家的忠诚变成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国家既要表现出它的阶级偏见的特点，又要掩盖这一点。用奥费的话来说，"国家只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运转，求助于掩盖其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的象征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以有意识地否认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为前提。"在来自这个结构性问题的压力下，国家的精英人物明确地不支持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这是因为实质性的民主化过程会使这部已经受到压力的机器因各种要求而负担过重，而民主化过程又可能导致人民大众意识到国家的生产社会化和继续依靠私人占有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作为这种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后果，并且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相比较，"政治……越来越缩小成管理和（官方）获得喝彩"。相反的，正像哈贝马斯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官方认可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不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福利的期待和预测的一般态度，但不打算实际上作出决定"。

哈贝马斯特别分析了这种抑制充满冲突、赞成合理化管理和被动公民身份的政治的倾向。特别重要的是他的《社会的结构变化》，这部著作原来是为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而写的论文，为他在德国知识界（后来在学生斗士中）赢得极大的声誉。在这篇论文

中，哈贝马斯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尽管是自相矛盾的）关系，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容易受到合理化过程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公共生活系统及其相应原则（言论和集会自由，法庭公开审讯，对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合法性，等等）的出现是和17～18世纪资产阶级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神秘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论点看来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这个时期各民众阶级所实行的持久的权力转换。他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一种历史形式的公共领域，结果使其他（平民的）形式仅仅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受到压制或不重要的变形。正像富科曾经指出的（至少就18世纪的法国来说），这是非常使人误解的。公开折磨和处死那些违反了统治者的法律的人往往引起狂欢节似的集会，在这种集会上，各种准则被颠倒，权威受到嘲弄，并且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动乱。然而，哈贝马斯正确地强调，在来自新兴的资产阶级公众的压力下，推论被当作新文明秩序的组织原则。就捍卫推论的原则而言，或者像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可以被理解为从古希腊用哲学消除神话开始的世界进化过程的一个革新阶段。这个进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已经使推论作为一种决策原则逐步系统化和普遍化。与这个进化过程相一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是文艺沙龙、咖啡馆、科学团体和辩论场所的大量出现，它的发展又受到不再仅仅是贩卖新闻的地方政治性报纸的出现的推动。资产阶级为公共生活所进行的斗争力求在市民社会里确定一个介于国家机器和个人及家长制家庭的私事之间的场所或空间。

这就需要（正像哈贝马斯分析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时所揭示的那样）彻底改变中世纪最高公共权力原则的含义。按照这个比较古老的原则，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封建君主是一种无所不在的高一级权力的全权代表，他在他的创造物——人民——面前重新显示这种权力。这些臣民的生活的唯一公开方面应该是诚惶诚

恐地服从，被动地接受一些小恩小惠；公共生活应该完全和君主的光荣统治相一致。与这种中世纪原则相比较，新兴的资产阶级公众认为聚集在一处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作“舆论”的体现者的场所。按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原则，“所有公民都保证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产生于每一次交谈，在交谈中，个人集合成一个公共团体。……公民们在以一种无拘无束的方式——即保证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的自由——谈论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时，表现得像一个公共团体”。舆论的形成应该通过一批在政治上有能力和在社会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的联合，他们坚持认为有权非正式地和正式地（通过选举）交换意见，从而使统治的国家机构及其神秘的政策受到批判性的监督。

哈贝马斯认为，18 世纪的公开性理论充分表现了公共生活的这种发展。就重农主义者来说，**舆论**的概念首先在他们的圈子里得到准确的分析，**自然秩序**的规律应该由君主来维护，君主使事物的自然秩序起积极作用的尝试又应该由开明的公众来指导。尽管舆论——通过公众讨论产生的开明的共识——不被看作是权威性的决断，但是据信专制的统治者却受到它的洞察力的约束。苏格兰的道德主义把这种公开性学说当作它并非不加批判地为自由主义社会辩护的特殊政治依据。在这里，从不开化到现代文明的复杂进化需要——实际上是保证——哈贝马斯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两种发展：由阶级支配的市场交换的自然规律的逐渐呈现和据说保证公民权和社会等级平等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

哈贝马斯清楚地知道，18 世纪这种关于得到解放的公众的理想并不等于普遍民主的原则，后者被理解为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和有效地自由参加“推理的意志形成（diskursive Willensbildung）”的公共行动。首先，除了少数例外，公众仅仅指男性财产所有者。哈贝马斯特别提到 J. S. 穆勒和托克维尔，强调这种公众掩盖了嘲弄其假定的真实性的阶级和性别剥削。他坚持认为：“真正的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承认真正的政治伦理观。”

尽管有这种批判性意见，哈贝马斯还是强调不应该忘记公共领域原则，或者简单地把这种原则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予考虑。这是一种有点使人困惑的论点，因为他力求在晚期资本主义非政治化的背景下恢复和捍卫一种过时的资产阶级幻想的重要性，然而他又力求批判这种幻想的资产阶级性。尽管有不真实性，这种有制约性的理想也以一种从根本上破坏市民社会及其国家权力有目的的合理的官僚主义合理性的生活方式为前提。它以自我启蒙和有推理能力的公众致力于通过真正的政治活动达到一致为前提。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力求通过建立公共生活及其“管理原则”来维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力求使公民权力和国家权力接受自我管理的公众的监督来控制和废除各种形式权威主义的公民权力和国家权力，这就毫不奇怪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可以说突出了它的阶级和性别特征，这种论证在工业革命期间产生的悲惨的和明显的财产和政治权力不平等中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在经济危机倾向和政治反抗（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增加的压力下，男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式和内容都扩大了，而且被迫允许无产阶级第一次进入这个领域。随后，公共生活被迫变得在社会地位上不那么排外，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上诉法院和被反抗、动荡不安及暴力镇压折磨的领域。资产阶级的推理原则和一贯互相交易的能容忍的公民开始分裂：“显然产生于‘群众压力’的法律很难被看作是产生于参加公开讨论的个人的一致意见。法律或多或少明显地符合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分裂过程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潜在的解放力在向有组织的、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过渡时都受到了压制。由于大的官僚主义机构越来越在国家权力的范围内互相谈判，所以许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包括大公司、有组织的劳工、卡特尔化

的政党、负有责任的政府和有组织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对公众施加影响——以便在公众中获得声誉。这种变化无疑是由来已久的。它首先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于欧洲和北美，而且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是后来的“公共关系工作”、“从信念新闻学向商业新闻学转化”、“容纳各色人等的党派”的兴趣、以及越来越明显地在国会以外形成一致意见和对付舆论的预兆。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民主潜力在国家和公司试图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世界时受到压制。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某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从而被保留下来。这种公共生活的保留有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官僚主义国家和公司明显地增加必须是正当的，并且向它们的成员作出解释。这些机构所体现的官方权力不得不表明自己作为权力的身份。“公开性”（或者哈贝马斯有时称之为人口的“调解作用〔mediatisierung〕”的东西）不能被当作遮羞布或伪劣商品而轻易地抛弃。因为，正像选举时的宣传和商业广告所表明的那样，公开性对于那些在官僚主义机构的高度上制定计划和进行管理的人来说终归是有用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被非常熟练和巧妙地制造出来的舆论所包围：“今天，公开的过程相当经常地仅仅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神秘政策有用；它以‘公开性’的形式为人民和事业赢得公开的声誉，从而使人民和事业在缺乏舆论的气氛中受到欢呼。”日常生活被各种迹象所渗透，这些迹象被当作“事物的本来面目”和难以理解的常识来表现和重复。舆论的制造者毫不含糊地依靠战时宣传和消费品广告的战略承担制定意识形态计划的任务。他们力求通过有计划地引导现有的各种幻想、偏见和无意识动机，在国家的受保护人中造成一种恭敬地追随领袖的倾向。公共领域里经常出现各种公共集会、质询和选举委员会，政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现在受到破坏）的私生活引起的轰动，以及发生党派冲突和其他引人注目的事件。公共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公开性（demonstra-

tive Pultizität)”。公民们落入了官僚主义奴役的怀抱，就不再仔细考虑；他们应该高兴地表示崇敬，或者悄悄地发出咀咒。

这种关于操纵舆论和公共生活的论点确实由于缺乏特殊性而显得软弱无力。结果，各种 20 世纪形式的殖民化公共生活（例如米尔斯所论述的那些公共生活）仍然没有得到研究。此外，哈贝马斯令人困惑地号召既恢复又废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已经引起他的反对者的许多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的结构变化》一书从来没有充分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协调与矛盾。

这种弱点明显地与至少其他 3 个难点有联系并被强化。首先，哈贝马斯似乎过分坚持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我形象，其结果是他倾向于夸大这种公共领域的内在一致性和一贯性。其次，他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论述过于接近阿多尔诺关于大众文化事业的论点。其结果正像奥斯卡·尼格特认为的，哈贝马斯没有分析当前重新坚持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可以利用晚期资本主义通讯手段受到限制的潜力（如果有的话）的方式。最后，他始终表现出不愿意设想其他可供选择的或相反的公共领域的前景，尤其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它们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们鼓励争论和作出关于需要的决定，并且试图在政治上调和不仅产生于正式的政治进程而且产生于家庭生活和资本主义生产等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可以认为，这些弱点加在一起使哈贝马斯的论点产生了一种十足的两重性。至少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的怀念和关于形成新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的极端悲观论调令人苦恼地同时并存。总之，哈贝马斯所开创的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的前途因这种研究不公开地取决于其批判对象而受阻。

然而，哈贝马斯强调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退并非完全

没有道理。与批评他的人相反，他正确地警告说，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权力批判职能遭到了严重的侵蚀。国家和公司的计划者力求通过制定自己的政策来自由地废除已经形成的政策。因为这些寡头政治的利益自称是官方的利益，所以这种公共领域开始经受某种形式的重新封建化。公共领域变成由独裁主义的国家和公司机构建立和管理的空间或领域的同义词。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应该符合官方规定的公共标准、公共秩序和礼仪的原则。

按照这些标准和规则，晚期资本主义倾向于变成一种非政治化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选举人受到有意识的鼓励变成奉公守法的臣民，只有为负有责任的政府和政客喝彩的权利。“交往的行动地带正在干涸”，“真正的公共领域遭到侵蚀”。可能成为公众真正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和需要受到官僚机构的控制、被个人化或贴上“越轨行为”的标签，被专业人员当作疾病、犯罪或精神病来对待。在来自晚期资产阶级公开性及其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的压力下，自由资本主义关于民主的玫瑰梦破灭了。公共生活的重新封建化甚至在理论上也有所表现。有一些按照据说是行政管理上的要求重新界定和用公式表示民主的概念的活动。民主开始意味着是一种合理地保持制度均衡的手段。自我发展的各种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早期模式的社会概念（例如J.S. 穆勒所提出的）倾向于被遗忘或被看作“不现实”而不予考虑。类似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关于非政治化的必然性的新论述有利于使历史上产生的非政治化作为第二种本性得到加强。

官僚主义的计划获得了成功？

现在可以扼要地概括一下本文关于哈贝马斯和奥费对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的讨论了。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认

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结束及其危机倾向的克服就是生产和消费强化但不平衡的合理化，以及寡头垄断资本和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公开斗争至少暂时中止。尽管积累过程内部继续存在各种不合理性，尽管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边际化，全面的计划、市场替代和官僚主义国家的补偿活动还是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合理化。老的市民社会的改组只有通过国家行政部门的协调及其危机处理战略才能实现。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生活重新封建化的论点表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包括国家本身）日益试图通过永远控制舆论来获得认可。

虽然这些看法有一定的正确性，虽然这些发展确实表明一种更广泛的历史倾向，而且不仅仅是暂时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对现代官僚主义合理性的批判看来仍然使人感到吃惊。批判的意识必定是不适当的。难道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论点一定不会陷入忧郁的绝望？难道这些合理化趋势不使人想起韦伯所说的“冰冷和黑暗的极地之夜”的幽灵，即一种有计划的异化会表现得非常自然的新兴社会的幽灵？哈贝马斯和奥费当然承认当代向独裁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相当实际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不是当前惟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在回答早先批评他们的人（例如阿本德罗思）和反对新韦伯主义的全面管理论点时，他们深信所有官僚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引起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自相矛盾的制度。他们认为，不仅必须提出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改变的问题，或者资本主义是否以极权主义倾向为标志的问题，而且必须提出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是否容易有自我削弱的倾向的问题。总之，他们要知道，是否仍然有理由谈到（在论文一中所分析到的意义上）危机倾向并因此而谈到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解放斗争。

哈贝马斯和奥费总的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计划过程倾向于破坏其自身对一贯性和合法性的追求。这些

过程倾向于削弱它们继续重复进行所依靠的非政治化的条件。官僚主义计划的现实性就是非现实主义的目标和行动方式的现实性；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非偶然地引起各种没有预见到的困难、问题和对这些形态的最高权力的挑战。可以依次讨论合理化过程的这些并非偶然的失误的两个方面。第一，在这些以国家的形式实行阶级统治的制度下，官僚主义不可能有计划地消除国家管理系统和积累系统内部和两者之间的阻塞和不合理性。实际上，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国家和公司制定计划的逻辑是一贯互相冲突的。第二，也许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制定计划时所遇到的这些难题是和全面的、由来已久的象征性解体方式、即破坏群众对现有权力关系的忠诚的倾向交织在一起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合法性和动机资源存在长期的不足。这些不足表明，政治经济学和这种社会许多成员的明确需求及合法期望之间存在着非常不平衡的关系。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势力不可能必然地或者甚至轻易地获得群众的忠诚。

国家计划的局限性

首先，哈贝马斯和奥费指出，国家不可能变成“理想的集体资本家”（恩格斯语），因为国家为私人控制的资本积累制定中期官僚主义计划的尝试不断地在结构上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这个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和韦伯的论点的重大对抗，后者认为，非个人的、官僚主义形式的国家机构获得进展的决定性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胜过达到目标的其他手段。他们固然承认国家活动特定的反应性及其政策受到阻挠和反复的情况可能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形态的普遍特征。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并非每一种渐进主义——即每一种局限于中期的、对外界刺激敏感的计划——本身都反映出负担过重的行政机关没有足够的合理性。”不过，在晚

期资本主义的特定条件下，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协调落实全面计划、市场替代和补偿政策的尝试通常以大量的失误和意外结果为标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这种决策不断地遇到各种形式有组织的抵制。关于工资和条件的争论（尤其是在国营部门内）由于不平衡的部门合理化而加剧，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不断竞争，劳动和资本的国际化使国家计划受挫，资本和其他群体（环境保护论者、和平运动、持异议的工会，等等）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些不同性质的抵制都倾向于阻碍或使国家全面制定计划的活动"私人化"。社会动荡不断地渗入国家机器内部。与韦伯相反，奥费和哈贝马斯提出，国家政策的产生经常依靠固定不变的一般规则往往使这种官僚主义国家不能灵活地和首尾一致地对产生于国家和社会领域内部的特殊的、具体的斗争和要求作出反应。不灵活的技术官僚主义计划的这种局限性是由不同的国家官僚机构之间典型地缺乏协调和国家的市场替代活动周期太长相结合而造成的。

作为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官僚主义国家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和主动反应性的特点；这些无能的状态又促使某些有组织的特殊利益渗入行政管理机关。在许多情况下，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在打算进行干预和政治上被迫放弃这种干预计划之间采取一种笨拙的折衷办法。这种"和稀泥"的办法和由此而造成的依靠（往往是无效的）间接控制由于下述事实而进一步加剧：一系列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试图重复私人操纵的积累过程）被纳入其他形式的政策设计和公共管理。国家对于商品化过程的逻辑的依赖关系往往妨碍国家向依靠广泛深入的公开辩论来制定政策的方式敞开大门。国家决策者们积极鼓励这种公开讨论（例如关于核动力的危险性或污染和城市规划问题）引起了更多的争论，而解决这些争论的可能性却由于国家依赖它被排除在外的商品生产领域而受到限制。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增长不合需要的结果长期

与国家试图平息这种反对和加速这种增长的打算相矛盾。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晚期资本主义在（国家）合理性方面的局限性在于在结构上不允许这种……可以被称之为民主渐进主义的计划。"

这些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意识限制国家计划的论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重新提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批判。奥费和哈贝马斯认为，潜在的阻碍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寡头垄断资本从结构上来说有进入国家决策过程的特权，都不知不觉地使政府服从特定的私人利益。国家计划制定者（反民主地）依赖这些有组织的集团的信息和合作，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必然具有的特点。因此——尤其是在上述产生于资本的投资和积累率下降的压力下——国家和公司控制的社会生活领域之间并非偶然的冲突倾向于公开爆发。奥费和哈贝马斯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计划只能是有偏向的，因为私人为利润而控制生产的指导标准本身不可能轻易地受国家计划的影响，国家应该完成它自己导致的全部任务（保证经济增长、满足集体对商品的需要，改善现有社会不平等的类型，等等），而不违反作为一种自我扩大价值的商品化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换句话说，国家计划不应该介入私人指导的积累过程；不管怎样，国家的收入和计划资源基本上仍然要依靠这种积累过程的周期性动力。

这种矛盾的动态还有两种不变的结果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第一，哈贝马斯特别谈到国家长期不能有效地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经常引起的环境问题。他认为，当前对自然界的要求过多——例如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类型引起气候突变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可能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形态（即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不过他认为，国家处理环境问题特别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的不合理性的限制。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轻易地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类型，而不放弃这种制度的关键性组织原则；把半计划性和由国家保证的资本

主义增长变成质的增长要求按公众决定的使用价值来安排生产——这种安排当然公开违背这种公司和国家官僚体制的逻辑。

国家和公司合理化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第二个结果是不利于国家计划的长期财政困难。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国家试图支配积累过程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资本的自我扩大（尤其是在更有利可图的寡头垄断部门）越来越取决于必须有巨大的基建投资和日益增加的社会间接费用的巨大投资计划。此外，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内，存在着永久性的资本利用不足和缺乏投资场所等现象。由于国家力求通过使资本和社会间接费用社会化的办法克服私人资本（周期性地）减少投资的倾向，因此财政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此外，正像哈贝马斯和一篇关于西德建筑工业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国家试图增加收入或来自公司的合作有可能使资本闲置起来。

在资本主义的增长遇到阻碍和减慢的条件下，这种两难的困境变得特别严重。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为了保证积累过程的延续，国家必须承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明确的制定计划的职能。但是这些职能不一定可以被看作是国家负有责任的行政工作，因为要不然国家负有补偿妨碍积累的责任。"这些财政问题根源在于国家使资本和社会间接费用日益社会化和私人继续占有利润之间的不对称。按照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论点，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开支（其成本效益的计算特别困难）倾向于超出国家的收入，以致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加以"削减"和使国家开支的类型合理化。他们提出，这些财政问题的存在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若干措施（例如降低增长速度，控制工资和价格，"使国民不依靠政府开支"的货币政策，等等）只能使（已经分析过的）边际化过程恶化。这些财政问题甚至可能破坏群众忠诚和晚期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战略所依靠的非政治化的基础。

即使国家试图节约使用和保持寡头垄断资本的做法取得成功，奥费还是强调，这种成功只有冒着导致形成“剩余劳动力”的风险才能取得。尤其是在寡头垄断生产部门内，有一种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的趋势，即劳动资本比率不断上升的趋势。自相矛盾的是，这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是国家试图推广商品形式的做法的另一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一部分劳动力失业不仅是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且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这部分劳动力决不是政治经济其他部门的“失业后备军”。这部分可能威胁到财政紧缩计划或（正像学生运动所表明的）非政治化条件的剩余劳动力生活在城乡贫民区、保留地、军营以及有效地延长青春期和失业期的学校和培训机构里。

哈贝马斯和奥费坚持认为，这些对国家计划的不同限制一贯地抑制向“全面管理”推进的动力。这些计划问题的持久存在也使人对那些通过顺利运转的、由专家治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象来描述当代现实的理论（例如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像自觉地统一“集体垄断资本主义意志”的不受约束的计划机关那样运转。实际上，由于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不协调和充满冲突的，所以当代国家注定要以一种特定的反应方式制定计划。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促使特别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取得成功，而这些集团接近国家权力的特权地位又妨碍着通过公开讨论形成真正民主的政策。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不民主的国家，不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破产、失业、财政困难、环境恶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解决的（不）可能性是**这种制度所特有的**。这种国家处理和抑制危机倾向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成功。这种国家力求合理地安排不可能官僚主义地安排的东西——私人占有社会化的生产。哈贝马斯和奥费认为，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活动的根本矛盾：“控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的原则是

不能任意使用的。”当然，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倾向于成为）一个无意识的执行机构。它毕竟有意识地试图避免经济危机，承担社会开支，等等。哈贝马斯和奥费正确地认为（与阿多尔诺的看法相反），国家倾向于按照官僚主义的妥协、讨价还价和斗争的逻辑来制定处理危机的政策；这种逻辑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个性特征的、无意识的和自然的交换过程。然而，由于它实际上被它力求控制的积累制度所牺牲，所以当代官僚主义国家及其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受到一种更广泛的“继发性无意识”的损害。

重新出现群众忠诚问题

应该强调，奥费和哈贝马斯警告说，这种继发性无意识标志着国家有意识地力求处理和压制危机倾向，不能被解释为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危机倾向。例如，许多当代评论家认为，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的消蚀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制度在制定计划时遇到困难的自然结果。这就好像国家和公司计划之间的自相矛盾被直接解释为普遍地意识到这种两难处境和旧的思想行为方式自动衰退一样。哈贝马斯和奥费反对这些客观主义的危机理论。他们正确地指出，分析官僚主义合理化的局限性必然需要考虑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制度所产生的合法性和动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这种考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群众忠诚的根源可以抵消或补偿国家和公司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所引起的混乱。换句话说，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在能够证明缺少可以得到而且必不可少的群众忠诚——首先是某种共同的有明确目的积极性以及对现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尊重——时，关于不可能有全面管理的社会的说法才合乎情理。

他们在各自的分析中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他

们既说明了现有的合法性和动机不能充分证明政治经济的运转是正确的，也说明了主要的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混乱导致这种政治经济的“变性”。至少有下述3个特定的论据可以用来支持这种说法。每一个论据都加强他们的总的论点（与阿多尔诺的论点相反）：晚期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保证其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作为第二性的程度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

首先，他们提出，有助于使自由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类型具体化的前现代的老传统和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活力”或重大意义现在正倾向于遭到破坏。宗教的命运以及家庭和市民生活的私人习惯是两个恰当的例子。两者的消失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权力侵入了商品化交换领域和受传统约束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次，哈贝马斯特别提到文化和艺术运动的持久存在和扩散，这些运动的要求和期待对于延续官僚主义权力的支配地位来说是不起作用的。最后，奥费和哈贝马斯用下述论据来强调这两种说法：制度对群众忠诚日益增长的需要看来很难得到满足，主要是因为在结构上限止民众民主地参与官僚机构的决策过程。

文化传统的消蚀

宗教与醒悟

哈贝马斯首先考察现在处于来自官僚主义化过程的压力下的日常生活中非现代的、受传统束缚的那些方面的命运。这种对传统的衰退的关心显然要归功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的革命性的论述（“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等等），也要归功于韦伯关于现代世界的“醒悟”的论述。在发展马克思和韦伯的论点时，哈贝马斯重申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和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取决于强制消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文

化。传统被束之高阁决不是瞬息之间的事；尽管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胜利，但传统决不是立刻就消失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利用传统的残余。”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些非现代的残余几乎都已经变了样：“在文化上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已不再适用，自以为正确的传统已经遭到破坏。”哈贝马斯认为，最直接的例子是科技发展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功对宿命论的基督教的不可逆转的打击。这种结果（韦伯也曾指出过）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为现代自然科学是产生于宗教的，加尔文派说上帝远离世俗的世界，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可以探索、推测和改变的——而且可以破坏加尔文派本身的基础。实际上，宗教信仰原有的威力现在已被群众性的无神论所削弱，而科学化的、被资本加深的积累过程所创造的奇迹证明了后者是可信的。

哈贝马斯提出，这种醒悟过程至少产生两种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在不再承认自己和世界是属于上帝的不信宗教的人当中，基督教的乌托邦（即反官僚主义的）成分有可能被抛弃。宗教倾向于变成至多只是一种主观的信仰。普遍无意义状态的幽灵是一种结果，尤其是因为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面对涉及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存问题时无法作出解答。

出人意外的是，奥费和后来的哈贝马斯都没有回答向更高更成熟的消费形式推进是否能避免这些虚无主义的发展这个关键问题。无论如何，尤其是哈贝马斯仍然相信，宗教的推动力的消蚀是晚期资本主义为何倾向于发扬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神的一个原因。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精神倾向于变成科学技术的、道德相对论的、追求事实和效益的、唯物主义的精神。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当前这个时代在发展“一种盲目崇拜科学的背景意识形态”。正像在职业的科学化或关于从学校教学大纲到消费等一切事务的官僚主义计划（根据专家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的，由于迷恋有目的的和合理的计算和数学化以及几乎只强调达到“经济增加”或

"稳定"这样一些设想的或未受挑战的目的的手段，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关心越来越淡薄了。这种科学化过程有着明显的非政治化后果，只要权力和政治等问题能够悄悄地变成专家们的劝告和他们关于客观要求的议论。尽管哈贝马斯否认科技专家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开始掌权，但是他们近来在建议和设计国家战略和公司方针时所发挥的影响却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而且代表了韦伯所分析过的那种合理化管理的高级阶段。正像哈贝马斯在论述官僚主义地改组旧的有优越感和传统人文主义的西德高等学府时所警告的，"唯科学主义"——不加批判地相信科学的东西——进入了学术界，甚至掩盖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社会历史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各种科学论说的胜利加强了对一丝不苟和可预见的必然性的追求以及给关于认识论和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扣上过时的帽子的尝试。打算通过科学论说产生控制外部自然界的技术力量的尝试的逻辑公然延伸到了社会政治关系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发展是极大的倒退。这种看法支持了他关于后黑格尔社会理论的科学化的论述，而且是他的引起争论的论点——自康德以后，哲学一直不认真地了解科学——的核心。洛克希望哲学老老实实地成为清除阻塞知识道路的垃圾的清道夫，这个古老的愿望倾向于得到实现。"唯科学主义曾经扬弃哲学而没有成功。"不过哈贝马斯坚信，科学论说使晚期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倾向处于合法地位的能力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在的。哈贝马斯要说的是，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国家制订计划的办公室里，科学的论说不能充分证明官僚主义权力是正当的，正因为它不承认对它自身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它不能区别它对权威的要求和这种要求的真理基础。正是专家治国论意识的这种根本性的固有缺陷引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意义状态的发展和对这种意识的真理基础的怀疑。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唯科学主义也确定了它自身可以被批判和被认为是后效教条主义的标准。专家治国理论和精英

理论——这些理论坚持有组织的公民只顾自己的态度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对，因为这些反对意见也必须自称是理论。”

哈贝马斯还提到在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宗教信念消蚀的第二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他认为，醒悟过程也影响有组织的基督教的剩余部分，关于恢复基督教教义中神圣的和更新的学术价值的谈论就是证明。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圈子里（例如超凡魅力运动），人们热衷于试图恢复教会工作和拯救灵魂的含义。哈贝马斯提出，有时候，这种恢复和更新是沿着民主的政治行动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激进的政治神学“要求破坏**来世**而有利于**今世**在社会上实现宗教的许诺”，只能用来反对官僚主义合理化所要求的非政治化。

公民文化的瓦解

哈贝马斯和奥费分析了其他关于消除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统的例子。哈贝马斯特别讨论了晚期资本主义“公民文化”的衰落。他吸收了阿尔蒙德和维尔巴的杰出论文中的观点，这篇论文指出，在美国和英国的居民中，至少像“是的，公民们必须密切注意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信念经常被涉及“不与政治搀和”的需要所削弱。这种观点认为，公民文化是各种富有意义的隐蔽的信念、现代以前的顺从和积极参与政治的倾向的折衷主义混合物。“民主的公民”被号召去追求各种互相矛盾的目标；他或她必须参与，但又不参与；积极，但又被动；有影响，但又顺从。哈贝马斯补充说，这种公民文化已经典型地被普遍依附于职业规范和家长制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所强化。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公民文化倾向于不可逆转地被官僚主义计划的普及所削弱。

这种论据（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严重的低估了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对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实行制度化控制的程度。

因此它夸大公民文化消蚀的新奇之处。不过哈贝马斯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道理的。他正确地指出，日常生活的某些领域一度被认为受到家长制家庭生活的私人权力的适当调节，现在却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纳入商品形式以及私人机构和国家机构的福利条款之中。例如，就家庭服务来说，私人的家庭生活越来越被过多的社会政策和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服务——从提供大众消费品、义务教育到由“服务行业”来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所渗入。尽管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形式可以比这些渗透过程存在的时间长得多，但是它的实际内容却倾向于受到严重的削弱。许多发展的结果证明了家庭越来越依靠各种外部机构：对一夫一妻制表示极大的怀疑，更早地达到青春期和获得性经验，对年岁的增长忧虑重重，等等。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这种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消蚀相联系的辩证法首先产生于国家计划的侵入。如今，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机制侵入和控制了最隐蔽的（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私生活领域。国家保证其地位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非私人化”了。它不再是私人资本形成和个人接受（家长的）教养的典型场所。具有更大政治意义的是，这种国家干预有利于暴露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是保护和调动财产的一种自愿组成的“感情结合”的种种虚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歧视、低质量的（或引起依赖的）卫生保健以及教育的质量和范围再也不能被认为有其天生的起因，其不可挽回的后果必定要由私人或者通过宗教实践来承受。“国家计划实际上使本来在文化上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成了问题。”当前对家长制家庭生活的重新攻击以及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打算引起新的自我认同的尝试，可以被看成是公民文化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削弱的重要征兆。这些运动不仅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各种传统的内容的偶然性，而且甚至对文化生活的形式提出挑战，因为文化生

活的形式本身是偶然的和可以改变的。这些运动要恢复和重新肯定某些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流行的规范的要求（例如涉及个人承诺权的种种概念），这种倾向只能加强这种挑战。总之，正像哈贝马斯和奥费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些运动提出广泛进行公开讨论的要求，是对官僚主义的、有阶级结构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借以成长起来的万马齐喑状态的强烈谴责。

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

国家和寡头垄断部门内部的官僚主义合理化也促使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支持遭到破坏。哈贝马斯和奥费都没有充分分析这种发展（见论文七）。他们的争论几乎完全（而且有点过分狭隘地）集中在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成就原则”的命运上。他们论证说，从17世纪起，这种世界观就在整个欧洲和新大陆证明由得到国家保证的成文法制度协调的作为手段的交换关系的扩大是合理的。到19世纪，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标志着资产阶级官方对本体论的理解的一次革命，（男性）个人的本质被看成是得不到满足的期望者和公用事业的用户的本质。（男性）个人的日常生活被认为是由竞争性成就的精神、追求地位的压力和得到法律保证的无限止的财产积累适当地规定的。按照这种精神，（男性）个人的自由的实现只能通过得到国家保证的整个竞争性市场关系，在这种市场关系中，（男性）个人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和财产当作手段来使用，即不考虑其他竞争者的实质性目标。在重视成就的社会里，私人协调和外部自然界的交换被看成是最理想的积累社会财富和幸福的途径。奥费指出，“重视成就的社会风气是以下述一般规则为基础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应该取决于他在工作和生产领域里的地位，而他在生产领域的等级制机构中的地位又应该取决于个人的成就。”

哈贝马斯和奥费指出，从主观上来说，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原则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居民不像对那些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人那样令人信服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对自由地通过市场分配劳动力作为个人取得成就的原则的制度性保证已被抛在一边；代替这些保证的是相对说来不受劳动后备军的竞争威胁的有计划的、由工会协调的、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过程。其次，由国家（向年轻人、老年人、失业者或身心有残疾的人）提供转业费和补助金的做法倾向于破坏个人为取得成就而进行的活动和这种活动在市场上所获得的报酬之间据说是直接的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劳动和报酬并不是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个人暂时或永久地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从前取决于商品化市场的波动，现在则越来越取决于官僚主义国家的补偿。最后，随着官僚主义国家活动领域的扩大，旧市场的交换过程的理论基础遭到了破坏。

奥费特别强调，试图通过非商品化手段再现商品形式（即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国家政策的扩大，肯定既破坏制度化的权力，也破坏商品化过程的合法性。公营部门的生产和使用价值的分配（交通运输、邮政系统、教育、卫生、失业保险），对于一种继续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经济来说，倾向于对后者表示怀疑。国家扩大了它的全面计划和非商品化的市场取代政策，使自己成为关于应该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方式的政治冲突的焦点。在这些“集体商品生产”领域里的社会劳动和技术发展的量的消耗和质的目标很容易变成独立自主的公开批评的对象。当哈贝马斯和奥费谈到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颠覆，不充分就业的不合理影响也许最好不过地说明他们的意思了。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失业往往被说成是经济循环中的一种盲目的、周期性的事件，或者被看成是懒惰的或无能的个人的过错，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行政部门试图增加失业的做法（例如通过国营部门的缩减生产）直接导致

人民对行政部门的动机的怀疑。失业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而且实际上经常在争论，因为失业问题是故意引起的，或者是由政治引起的。

艺术的批判潜力

为了支持晚期资本主义倾向于不能充分地证明它自己是正确的和激发它的选民这个总的论点，哈贝马斯提出了第二个重要论点。这个论点把重点放在现代文化的某些方面上，现代文化的推动力似乎在对合理化过程进行报复。艺术和美学理论的批判潜力，它们经常为那些被文明化过程所排斥的需要辩护，就是这种论点的说明。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至少某些所谓的资产阶级艺术的特点一直是控诉现实世界和争取使资产阶级世界觉醒过来。例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艺术和美的哲学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激进化。可以说，它们变成了官僚化过程的反对者的掩蔽所，用艺术的形式保留自然而然产生的幸福、相互承认和团结一致等梦幻般的希望。

独立自主的美学理论战场（在18世纪）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激进化的过程。从前，艺术曾经意味着任何比较高级的技巧（例如中世纪的大学把修辞学、语法学和天文学称之为艺术）。对比之下，由于康德和鲍姆加登，美学发现自身正在从一般关心关于美——包括自然界本身——的种种理论过渡到关心艺术的哲学，即“无偏见的令人愉快的经历”的哲学。哈贝马斯认为，放荡不羁的生活观是19世纪这种关于古典资产阶级艺术的美的幻想的理论转化为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呆板的不自由和牺牲的典型例子。第二代**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兰波和科比埃等）经常出入于啤酒馆，脱离统治阶级生活的秩序和摆阔性的挥霍浪费，而且，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长大，但变成了一伙致力于推翻他们父辈的社会的不

守法的流浪汉。同样，“为艺术而艺术”嘲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幻想，而且警告说，艺术本身可能变成工业资本主义官僚化的牺牲品。

或者像哈贝马斯所希望坚持的那样，这些运动表明这样的真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艺术不是表现希望，而是表现资产阶级合理化不可弥补的牺牲”。为了证实这个论点，他提出需要重新考察20世纪晚期“后黄金时代的”艺术和美学的反抗潜力。在这里，他以过分简单的形式（见论文五）围绕着本杰明关于因技术革新（无线电收音机、扩音机、电影）而引起的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的消失以及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含义的论点进行各种论战。众所周知，有些作家（例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和T.S.埃利奥特）把这种艺术的工业化当作群众的庸俗和一切真正艺术的破坏的预兆而加以拒绝。相反的，本杰明认为，艺术“气氛”由于工业化而淡薄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和集体的艺术创作和感受的潜在的新基础。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论点又被用来驳斥阿多尔诺所强调的伴随着文化工业使文化生活商品化而来的危险。文化工业支配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理解完全以破坏高级艺术的气氛为动力，只是把高级艺术当作粗制滥造的明星地位及有计划安排的耸人听闻的手法和幻想来复制。艺术的物化和商品化促使阿多尔诺转而代表反面的、批判的艺术形式（例如塞缪尔·贝克特和阿诺德·舍恩伯格的作品）；争取解放的斗争必须承认，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的合理化已经使美本身陷入一场危机。

哈贝马斯对这些争论的态度是复杂的。与本杰明相反，他坚持认为，在机械地复制艺术以前，以高度意识到艺术本身是手段而闻名的运动（例如超现实主义）就已经试图使艺术“降格”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相应地消除旧的艺术气氛。与阿多尔诺从内心里怀念传统的资产阶级艺术相反，他指出，艺术从它原来对传

统的、专制主义的权力结构——保卫资产阶级公共生活——的义务中解出来，从一开始就和它的商品化是一致的。自相矛盾的是，艺术变得“独立自主”（即变得不依赖那些力求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之外策略地利用艺术的前资产阶级政权），只是因为艺术变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里的咖啡馆、剧场和展览馆里的商品化消费品。不过，哈贝马斯和阿多尔诺一样，承认形式上独立自主的艺术具有合理化的商品形式并受到这种形式的限制。他认为，这种发展当然说明艺术因为堕落为受到操纵的公开宣传而放弃其批判能力的可能性。如今，所有独立自主的艺术都倾向于被官僚主义消灭。因此，前卫文化——流行艺术运动可以算一个例子——很容易工业化并成为受到崇拜的大众消费和娱乐品。这也可能是所谓的政治艺术的命运，而且甚至是已经垂死的艺术（例如勃鲁盖尔的艺术）的命运，政治艺术有计划的商品化使艺术回到商业生活中，但也使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僵化（Musealisierung）”。

尽管有这些危险的倾向，哈贝马斯还是深信，用行政手段创造文化如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过程。官僚主义地创造和消费艺术的意外后果是增加了艺术对大多数人来说将失去其深远意义和推动力的可能性。文化的官僚主义化增加了文化的消费者们既难以认识自己，又难以充分表达和满足他们意识到的各种需要的可能性。应该强调，这种论点并非重复庸俗保守地相信作为传统的传统。哈贝马斯提出，不经必要的破坏，文化传统就可以反映地或习惯地被这些传统的继承者们所接受。但是，正因为日常生活总是通过用来促成（或阻碍）个人或群体认同的意味深长的规范准则，所以不能官僚主义地随意加工制造各种文化传统。哈贝马斯捍卫本书所熟悉的一个论点：官僚主义化作为手段的逻辑同交往过程的发展和社会化互为主体的逻辑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他正确地强调，由于这种对抗，传统不可能用行政手段来创造和传播而不变成名存实亡和对接受者来说毫无意义的传统。他认为，这

也是为什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不知不觉地促进反文化和非传统形式的艺术、决心破坏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业中的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运动的发展的原因。

官僚主义统治的局限性

反文化的出现以及宗教、家长制家庭生活、公民文化和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蚀——这些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奥费和哈贝马斯的一般信念：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定过程有意想不到的瓦解作用。即使制度发生总危机的可能性由于国家采取处理危机的战略而减少，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部的持续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计划本身的继发性无意识也从根本上限制形成一种全面的、顺利进行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的可能性。这种社会对合理性的追求是躲躲闪闪的；甚至从这种社会本身的官僚主义合理性标准来看，晚期资本主义也一贯产生不合理性。官僚主义的合理性用天生的命运来掩盖其组成部分看来也不可能。传统倾向于被全部清除，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可靠性倾向于被推翻，用行政手段来创造取而代之的象征倾向于被看穿。文化一体化的机制越来越负担过重。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含义’是一种稀有的资源，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最后，新民粹主义的政治斗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最有组织的部门的周围爆发。这些斗争是否有可能破坏当前的非政治化，从而使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怀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斗争能不能和其他运动联合起来，尤其是和有组织劳工中的激进分子。总之，国家试图处理私人积累过程的要求不断遭到失败和这种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机关使自身合法化并激励其当事人一贯遭到失败是一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这些发展所形成的令人为难的双重约束。晚期资本主义制度自称要克服自由

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的不合理性和不公正的意图（比较关于福利国家计划的初步论述）不可能实现。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引起了关于行政机关打算达到繁荣、进步和其他目标的能力的普遍期待，肯定破坏现实生活命中注定的外表。这种制度倾向于引起它不能顺利地满足的各种新的需要、它必然要使之失望的新期待。与阿多尔诺的看法相反，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使一切事物都表现为"命中注定是有结构的、预先规定好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因为经济危机已经被制止并转化为政府一贯的过重负担（财政困难，决策混乱，等等），所以这种制度已经扔掉了社会天生命运的外衣。如果政府处理危机的做法遭到失败，那么政府就落后于它曾经向自己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对这种失败的惩罚就是合法性被撤销。"此外，奥费和哈贝马斯还提出，通过不起阻碍作用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和公开讨论来恢复国家（和公司）机构的权威的可能性一贯受到这些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权力主义性的阻碍。他们正确地把晚期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非政治化的制度。因为①国家特别倾向于对它自愿承担的诺言负有责任，②国家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毫无困难地调动群众的忠诚，所以奥费和哈贝马斯提出，这种国家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不可能通过使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而轻易地得到解决。实际上，重新封建化的公共领域的争论、拟定口号和公共关系工作并不忘记不成功的官僚主义计划的瓦解作用："象征性地利用政治……变得越来越容易受自相矛盾的传统做法的影响。"

哈贝马斯固然谈到使现在生活在（或多或少）有意义的交往结构中的（潜在）国民的活动自动化的危险的可能性。在公共领域中官僚主义地创造各种信条，可以用来控制个人行动的心理技术，用科技计划像警察似的监视一切的普遍倾向，这些都是这种权力主义倾向的标志。但是哈贝马斯和奥费关于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和破坏群众忠诚的分析为他们怀疑创造一个实行有计划统治

的奇妙的新世界的可能性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他们特别注意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后天获得的”风气和过去几十年里在妇女、和平主义者、环境保护论者以及积极的和消极的青年中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有助于加强他们所坚持的看法：合理化的局限性和合理化的变质是一致的。

哈贝马斯和奥费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点诚然有许多模棱两可之处和局限性。本文至少已经讨论了4点不足之处：关于资本主义商品化的自我麻痹倾向缺乏明确的阐述；没有充分论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居民的控制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由私人制定社会政策；没有考虑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最后，关于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论点遇到了若干难题。哈贝马斯和奥费倾向于用抽象的一般陈述来讨论群众的忠诚问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模棱两可之处和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其结果是不再详细论述关于新的（而且可能是民主的）运动（例如妇女、环境保护论者、地区分离主义者、同性恋者和种族群体的运动）的长期存在和最近的活动等一系列与理论有关而且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由于他们严重地低估了公共机构打算用来镇压在制定计划和群众忠诚方面遇到的困难所引起的抗议运动的反击战略，所以这个空白倾向于进一步扩大。特别关键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和系统地分析社会和政治加速瓦解时普遍怀念腐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正像弗朗兹·诺伊曼早就警告过的，这种怀念可能经常被统治机构中的统治集团成功地加以利用。

尽管有这些空白，但还是应该承认，哈贝马斯和奥费所提出的比较全面的论点是非常有见识的：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同化倾向被有意义的社会政治关系的生成和再生成的速度降低所抵消。被官僚主义计划的瓦解和矛盾作用所强化，这些群众忠诚问题降低了统治集团诱导其依附者们并使之遵守纪律的能力。这种失败（正像奥费和哈贝马斯所承认的）由于日常生

活的机械化和利己主义化所引起的心理压力以及随着作为有意义的活动的闲暇和消费的消蚀而来的意志消沉而更加严重；由于作为一种可以在战略上用来反对国家和社会的潜在敌人的手段的民族主义的削弱而进一步深化。

奥费和哈贝马斯认为，这些群众忠诚问题，加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矛盾的价值观念所引起的混乱，倾向于导致在有组织的官僚主义生活范围之外广泛地探索独立自主和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他们就是按照这些假设优先选择"晚期资本主义"这种叫法的。使用这种叫法决不意味着这种制度自动崩溃，注定要在一定时期以后痛苦地死亡。谈到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并不是预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崩溃。这样说是要比较适度地表明这些社会和早期自由主义阶段之间的区别，也是要表明，在官僚主义计划的不合理性和失误中，群众忠诚这项资源有被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在这种制度的范围内不容易得到更新。总之，"晚期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要人们注意下述事实：这种制度以现有的形式存在，现在主要依靠群众忠诚这项资源——经济和国家这两种资源可以说在处理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时就已被耗尽了。奥费自信地说，除了核战争战略，"没有可以在其中找到并运用……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永存新机制的易识别的方面。剩下的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合一的自我适应机制的变种和改进，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已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这种改进了的机制"。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和奥费都知道，晚期资本主义在行政管理和文化方面的矛盾倾向于形成独裁主义国家和某种准军事社会组织。面对这些倾向，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哈贝马斯和奥费的贡献，继续认为这些矛盾同样可以被看成是肯定独立自主的公共决策领域的条件，反对官僚主义统治在国家和社会领域里的霸权。

论文四　技术和实践：哈贝马斯早期重新提出的政治概念

我认为，构成社会主义思想的……是克服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的简单化的可能性——所谓简单化是指认知—工具性的诸方面上升到统治地位，其他的一切都因此而被驱入表面上不合理的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这些方面似乎会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

——于尔根·哈贝马斯

回顾合理性的概念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点，不论指导行动的是什么目标，“实质上合理的”行动从原则上来说总是和形式上的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的。只要行动明确表明的目标是用从技术上来说最适当和最熟练的手段来追求和指导的，这类行动就可以被认为形式上是合理的。反之，只要行动是根据各种根本不能调和的价值标准，即根据数量和内容很不相同的偏爱构成的，这类行动就是实质上合理的。正是实质上合理的行动的这种变化性或偶然性最终使这类行动系统地进行和逐步发展。因此，韦伯关于行动的合理性的论述以某种不可能发生误解的偏向为特点：形式上的、有目的的合理行动被描述为唯一能够“进步”的行动。只有形式上

合理的官僚主义行动才容易合理化。

然而，重新考虑韦伯赋予合理化概念的多重含义却引起了怀疑，怀疑他并不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个有力的论点。毫无疑问，他典型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国家及其作为合理制度的司法制度；按照这种观点，现代世界只要受到多种专为自己打算的官僚主义思想和行动不可抗拒的影响，就要合理化（见论文二），在另一些情况下，韦伯显然在用合理化的概念来表示除有严格纪律的官僚主义机构以外的一系列事件。这是因为他的官僚主义合理化概念似乎由于自身缺乏精确性和发挥余地而被过分夸张和削弱。例如，关于宗教信仰或法律行为的类型，韦伯不太严格地谈到合理化是一种过程，与这种过程相一致的是，活动的范围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活动的规则更加明确地用有说服力的概念和专门的知识来规定。他对各种传统的、有感情的、有价值合理的和有目的的合理行动所作的区别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区别不言而喻是根据涉及这些较新含义中的合理性程度的考虑形成的。

可以说，韦伯关于合理化的论述中的这种模棱两可之处不知不觉地为后来把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机构当作唯一容易受合理发展影响的行为来分析的理论尝试铺平道路。这种细分、回避、从而限制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的努力是许多直接受韦伯影响的思想家的著作的特点。近来，这种早期坚持认为官僚主义合理性是一种有限地衡量行动可以逐步合理化的程度的尺度的看法已经重新出现，尤其是（至少在德国）在加达梅尔、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下述评论不是要全面而深刻地分析这些关于合理化概念的著作，而只是要指出这类著作的某些政治含义。因此，在叙述过程中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形象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合理性理论的政治潜力正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得到明显的发展。哈贝马斯对当前关于合理性的争论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他在50年代写的最初几篇论文里就已经开始不断地试图分析一切给官僚主义

形式的合理性以特权的尝试。在哈贝马斯看来，与众不同和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烦恼的是这种社会使有目的地合理的官僚机构的权力普遍化的倾向。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立宪国家不合法地谋求通过借助于各种传统的、象征的和制度上的实践打破这种合理性的一切界限来保证“有目的的合理行动的分体系不断扩大”。正像哈贝马斯在给宗特海默的一封信中写道，“现代社会不得不为发展生产力和强化法律统治时所取得的极大成功付出代价：逐步迫使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接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管理上的合理性以及受到抑制的实践上的合理性。”

哈贝马斯当然要证明，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的官僚主义化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过程，即使从生活内部，即根据生活本身有限的合理性的标准来判断也是如此（见论文三）。他认为，正是这种不合理性削弱了对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若干早期批判的可信性。在来自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的新的和矛盾的结果的压力下，一度被用来揭露资产阶级现代化的破坏性和潜力的论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论点；韦伯对“运动的自由”和政治家风度的向往；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关于工具推理的论点——就显得不足了。这些论点被下述事实所挫败：当代管理部门倾向于不再坚持创造一个顺利运转、和谐和完全官僚主义的社会的尝试。韦伯担心现代世界会陷入一种没有理想的官僚主义静止状态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夸张。晚期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不可能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活都纳入表面上不合理性的领域。哈贝马斯通过这个论点提出他对劳动概念和交往概念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别。这种二元论——作为贯穿他早期（即1970年以前）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的决定性线索——一直是他过去30年里的著作的特色。和莱佩尼斯的说法相反，劳动和交往的截然分开决不是哈贝马斯著作中最近提出的论题。这种二元论的丰富的和有时令人困惑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为他对晚期资本主义

的批判提出的那些意想不到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只有求助于初看起来与哈贝马斯的计划风马牛不相及的古典公式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对技术（technē）和实践（praxis）所作的区别。我的论据是，哈贝马斯的早期批判理论——下面将专门评论这种理论——是以重新提出并随后修改这种区别为前提的。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回到亚里士多德导致哈贝马斯批评现代社会相继抹煞两种形式的生活和知识之间的区别。这种批评针对现代资产阶级传统中某些思想家（尤其是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为官僚主义行政管理政策所作的辩护，而且也针对马克思，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看成是资产阶级形式的合理性的传播者。哈贝马斯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来责备马克思：马克思深信，人类的自我形成是通过社会劳动合并各种互相承认和生产的不同逻辑或合理性的过程展开的。这种对马克思的不满反过来又变成重建劳动—交往二元论、设计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大纲和引起一系列未曾预料到的理论问题的基础。

创造与行动：回到亚里士多德

哈贝马斯早期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认识论研究和政治评论都以亚里士多德早已熟悉的一种重要区别为前提：创造和行动、手段和目的、生产（poiēsis）和实践（praxis）之间的区别。可以想见，亚里士多德认为，世俗世界是一张目的论过程的全景照片，是一个各种事物（ousiai）被赋予把它们的潜在性发展成现实性的内在力量的世界。由最终目标（“为目标而目标”）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现它的力量、变成它能够变成的事物的冲动或倾向（hormē）。事物的“本性”就是它们潜在的命运。人类本身就处在这种目的论过程的全景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生活有三重目的（telē）或目标：①理论（theōria）或关于宇宙

间各种必要的、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事物及其在科学知识中的理解的哲学思考；②恰当地体验乐趣的感官方面的肉体活动，尽管在没有节制或缺乏自制力的情况下是可鄙的；③通过公开的商议、言论和行动发挥实际智慧的能力。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考虑亚里士多德对待肉体享受的谨慎态度以及他认为科学知识和思考生活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对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尼可马亥伦理学》中提出的这个纲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所排除在外的东西：被亚里士多德理解为包括打散工、务农和手工劳动的生活以及家庭里的奴隶劳动和生儿育女在内的生产活动。这种排除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直接显示了亚里士多德在公民（他们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积极参与城邦的交往生活）和那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的人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别。通过他们提供的住房、食物和各种服务，后者始终为了前者而存在。亚里士多德想要证明，“整个生活被……分成两部分：忙碌与闲暇、战争与和平、某些必要和有用的活动与某些旨在获得荣誉的活动”。实际上，那些专门提供公民必需品的人可以被看作永久居住在城市里的侨民；他们的劳动是达到更崇高的实践目标和（可以说是更完善形式的实践）有闲暇思考宇宙的生活的手段。

正像汉纳·阿伦特曾经提到的，必然和（潜在的）自由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这种划分是古代亲属体系遭到破坏并被新传统形式的希腊城邦所取代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区分提醒我们，在这种划分为阶级的古代社会形态中，这两种不同的和等级森严的活动方式之间没有完全平静的共处。因此，手段的领域被亚里士多德看成是由必然性（anagke）构成的，而且首先包括妇女和奴隶的肉体劳动，其次包括手艺人和农民的艺术“创造”。在前一种情况下，奴隶和妇女的盲目劳动是由满足人类永久长存所必需的条

件这个目的构成的。像驯服的和遭到羞辱的畜生，男人必须用劳动提供公民生活的物质前提，而女人则必须承受人类繁殖和养育的重担。因此，奴隶和妇女都天生就是他们主人的有生命的财产，“生活行为的工具”。在照顾荣誉和闲暇的生活时，肉体的劳动也得到技艺的发展和手艺人似的生产知识的帮助。那些（像手艺人那样）进行创造的人在制作特殊的物体时力求运用巧妙的知识。手艺人力求使自己适应他的材料的性质，以便通过运动所获得的技术知识用手工改变这些材料。通过这种有意地用生产知识指导的创造，手艺人“通过技艺（apo technēo）”实现他所加工的物质的潜力；换句话说，技艺“部分地完成大自然所不能完成的东西，部分地模仿大自然”。不过这种生产技能并不立即或直接具有人的属性。手艺人的技术性创造以及奴隶和妇女的肉体劳动都仍然停留在或接近畜生生活的水平；这两种形式的活动都在房子（oikos）隐蔽和幽暗的角落里进行，必然仅仅是实现行动和实践的手段。

在这里，必须消除通常对亚里士多德的手段理论的误解。亚里士多德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不认为为了公民过好日子而生产实用的必需品是不自由的，因为这种生产现在是由奴隶、妇女、手艺人或外国人进行的。相反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反对通过武力和战争征服和奴役他人。例如，现在的奴隶并非天生都是奴隶。更重要的是，奴隶的孩子并不总是注定要过奴隶的生活。最后，亚里士多德甚至承认，通过代之以机械化生产技术，可以废除奴隶劳动（尽管可能不包括妇女的劳动，他设想妇女和男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下对上的关系）。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劳动理论，应该强调的是，创造者的劳动和生产以及公民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分工由于无所不在的必要性而被认为天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生活得很好或者真正活下去，除非他得到各种必需品。”一部分政治生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的可能性以后者从属于前者为先决条件。那些劳动并

得到生产工具的帮助的人受奴役是事物的本性："为了和平就必须有战争，为了闲暇就必须有忙碌，为了荣誉就必须有实用的必需品。"无处不在的必然性使得某些人的生活不可能获得比别人更高尚、更充满人性的成就。有损尊严和仅仅是实用的创造是人类的一种负担；隐蔽的必然王国是盲目地在其中发挥各种能力和行使各种权力的空间，因此必然被别人引向更高的目的。在产生于必然性的努力和痛苦的重担下，那些劳动和创造的人注定要过沉默和愚昧的生活；对于其他人的实践来说，他们仅仅是有用的工具。

劳动和劳动的不自由是精神上的智慧和品德的先决条件，生产和再生产是实践的基础——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在必然性无所不在的背景下保证品德、自由和丰裕生活的"幸福（eudaimonia）"的公式。通过排除那些劳动和工作的人超越必然性，才使人有可能成为有人性的人和政治动物（zōon politikon）。从本性上来说，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能够过丰裕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在城邦中结成伙伴关系或相互交往的能力。在必然性和劳动的领域里，只可能像动物似的生活，相比之下，公民却可以通过政治生命（bios politikos）的互为主体性并在其中再生。他们可以形成新的"习惯（hexeis）"，获得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权力。政治是实践（praxis）和说话（lexis）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活动领域，说话和行动的个人在其中看和听，并且彼此认真对待。说话是一种实践的形式。人是能够说话和思考的生物；善良的"政治学上的"人是高尚地（eu kai kalōs）运用这些能力的人。这些能力的运用排除说话和行动的个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的可取之处，因为说话的实践依靠非暴力和运用充分论据的说服——暴力是压服，是专横地使对方保持沉默，用亚里士多德的比喻来说，好像个人是棋盘上的一只孤立的棋子。因此，说话和行动的公民的生活不

像那些从事奴隶劳动或统治他人的人的生活，因为后者陷入了支配和服从、不平等和屈从的关系之中；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使用一名奴隶没有什么伟大或高尚，只要他是一名奴隶；可是发出关于各种必需品的指令就不同了。”

公民们在其中一起生活和互相交谈的这种公共空间以摆脱繁殖和养育生命的各种要求以及预先假定相互影响的主体之间基本平等为标志，因此也是潜在的自由领域。通过说话和行动，人不仅表现出和实现他们的集体性和互相依赖性（他们的交流语言毕竟不是私有的和孤立的东西），由于像地位相等的人（homoioi）那样交流，所以他们也使自己个体化，**为了他们自己**而说话和行动。在政治生活中并通过政治生活，人的真正的个性可以在各种责任（分担商讨和执行公共决策等任务）的总体中培养起来，这些责任鼓励他们去看清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对一般的他人来说是符合愿望的。这就是参与政治生活意味着在各种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慎重选择的原因。成为政治上的人意味着在涉及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时起带头作用。因为如果行动出于强迫或无知就不是自愿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人只能因为自愿的政治行动而受到赞扬或谴责。因此，实践带来形成道德品质的可能性。“道德品质是一种与选择有关的性格状态，而选择是深思熟虑的愿望。”争取成为有道德品质的人就是承认人类的事情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人能够在“平等和同类的”伙伴中得到发展。这种可能性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描述中看到：人是能够进行社会交往的生物，因此他们的本性介乎动物的本性和神的本性之间。那些过着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道德和孤独生活的人不是动物就是神。

正是通过必然王国和潜在的自由王国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对两种知识所作的补充区别。这两种知识都（可能）赋予人类的活动以选择（proairēsis）以及关于这种活动的

可能性和后果的某种先见之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是由生产知识适当地安排的，而实践的智慧（phronēsis）既是通过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道德考虑（boulēsis）”产生的，又适当地使这种“道德考虑”充满活力。对每种知识的不同范围需要稍作解释，因为它们本质上不同的逻辑之间的差异至少有3个方面。第一，不像技术知识，技术知识是**用来**产生或制造特殊的物质对象的，而涉及人在实践领域里应该做什么的指导原则并非以把具体事例包含在一般规则中为标志。当然也不像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在于对必然的和普遍存在的事物作出判断。而技术和实践的智慧则与变化不定的过程有关。但是，实践智慧的原则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变化的，因为这些原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取决于行动在其中展开的政治条件。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所说的品德（aretē）就等于对“善”的了解，他认为，道德知识决不能像技术知识那样来掌握或运用。在实践上变得聪明起来不等于知道什么是一般的考虑周到。公民只有在完成特别考虑周到的行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概念化的实践智慧。实践的智慧只有通过深思熟虑并在遇到特殊的问题和行动环境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和运用。“我们不是为了知道品德是什么而研究品德的特性，”亚里士多德说，“而是为了我们可以**变得**善良。”因此，道德—实践知识同时力求把公民置身于其中的特定行动环境的特殊性同实际上变得聪明和善良这个可能达到的一般目标联系起来。

第二，技艺和深思熟虑的不同合理性并不取决于这样的事实：道德知识的目的（tēlos）涉及人类的目的，而生产知识只涉及达到较高人类目的的正确手段。归根结底，正像亚里士多德在反对柏拉图关于“善”的观念时再一次强调的，各种形式的道德知识也内在地涉及通过深思熟虑的过程达到具有道德目的的手段和战略。不过，深思熟虑的人并不仅仅聪明能干和具有“做有助于达

到预定目标的事并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这是因为道德知识不仅涉及精打细算的权宜之计，而且涉及为自己作出选择的行为：“它的目的是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创造总是有一个自身之外的目的（它的目的〔tēlos〕可以说存在于自身之外），而有益的行动却是由自我规定的目标所构成的。不像生产知识，自知之明并不盲目地迷失在它对手段的有限关心中。与有知识的实践相对照，受技术知识指导的前政治的或私人的创造活动有自身以外的目的：“每一个在创造的人都在为某一个目的而创造，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某种特殊关系中的一个目的，也是某种特殊行动的目的）——只有**已经完成**才是目的；因为有益的行动是一种目的，而且愿望就指向这个目的。明智地说话和行动，从事有益的活动，就是要克服仅仅通过关心手段和目的的创造中的不自由和可能的盲目性。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公民的活动只有通过他们对什么是可能的和令人满意的自知之明才能变成有益的。

最后，有见识的手艺人考虑如何才能发挥他的不会说话的原材料的潜能，而寻求道德知识的公民不论什么时候都必须留意他和其他人互相依赖的程度；这就是说，他必须借助于在其他人当中通过其他人了解自己来修改他的行动和自我认识。作为和其他政治生物交往的结果，人可以获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知之明”，弄清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聪明能干，即一个说话和行动的主体巧妙地操纵和毁灭其他主体的倾向，和实践的智慧毫无共同之处。

这里所讨论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行动和知识的概说的个别细节，对于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现代世界官僚制度化过程的限度来说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不过我的看法是，青年哈贝马斯对官僚主义合理性的批判不可能被正确地理解，除非他的**劳动**和**交往**等主要概念经过必要的修正被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手段和目的、技术

和实践以及技艺和道德—实践智慧的不同合理性的二元论的详尽发挥和重建。大多数关于哈贝马斯的设想的讨论都漏掉了这一点——如果留意到他本人明确地承认他受惠于亚里士多德，这种疏忽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这种受惠支持了他的有争议的论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和成熟就是不顾一切地削弱关于生产和实践、技术和道德—实践知识之间的区别的理论和实践。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对19世纪有影响，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种开化的文化框架和现代官僚主义国家中的确立排除了两种生活之间的这种旧的区别以及关于政治原有的真实性和深远意义的了解。

哈贝马斯论述了这种使人困惑的生产—政治二元论的许多方面。他认为，科学——一度是沉思的同义词——被带到现实中来，从方法论上来说变得和计算推理的逻辑相似，随后开始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现代性用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a）破坏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也和这种积极生活及其自我理解的戏剧性非政治化同时发生。受实践智慧指导的政治生活的传统目标越来越被当作一种无法实现的特殊要求而放弃。生产和生产知识的名声和范围扩大了，不利于政治生活和深思熟虑的知识。实践智慧的理想屈从于使政治生活充满活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严密和实用性，而政治生活本身现在越来越被理解为通过直接的官僚主义统治组织市民社会的战略。总之，传统的政治学说所关心的通过克服必然性建立一种自由和明智的公民生活被永远放弃了，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精打细算的合理性的一种损失。从20世纪晚期的观点来看，政治生活的传统形象显得已经过时。作为长期被动员起来反对过去的成功地官僚主义化的社会的牺牲品，传统的理想已经不得不被忘掉。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健忘症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达到了极点。如今，在公认为自相矛盾的官僚制度化过程的影响下，“人类对劳动和相互影响二元论的意识消失了”。

政治的消失——和恢复

即使承认哈贝马斯希望写一部批判性的和政治性的现代史而不是一部详细的古代史，也应该承认他关于这种使人困惑的生产—政治区别的论点仍然十分简单。他所提出纲领由于过分简单，所以往往使人感到困惑。这种简单化的后果之一是，对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论以及这种争论由于自我理解而得到调解和从基督教中世纪精神的出现到前现代等级制国家(Ständestaat)的衰落等事件的研究也大大地减少了。哈贝马斯不承认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包括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的逻辑在某些关键的方面根本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传统生产手段，造成了另一个同样严重的空白。生产知识的状况和掌握生产知识的观念根本不同，是这一点的简单例证。现代经验—分析知识力求通过把一切都变成一种可以重复和取代的过程，根据可以计算的数量来理解一切；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生产知识则力求实现或完成这种知识所涉及的事物的潜能。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哈贝马斯无视这种特殊区别是出于他的有争议的假设：生产手段的发展是历史的积累（这个课题将在论文六中进一步讨论）。

这些初步的难点可以放在一边，因为哈贝马斯的总的论点依然令人佩服和不安。这个论点断言，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管理的非政治化不仅仅（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局限于这个阶段。政治生活的消失以及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间的区别决不是（例如）科学化和资产阶级意识或国家干涉主义的败坏的结果，二者都标志着从自由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晚期的过渡。根据卢梭的见解之一（“古代社会的政治家总是谈到道义和品德；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谈做买卖和金钱”），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生产和政治二元论的消失和后者受到抑制是资产阶级现代化过程的基本

特点。不应该认为哈贝马斯把这种过程看成是一种倒退，一种古典时代的美德的简单堕落。实际上，他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求对现代化过程的特殊合理性的批判，同斯特劳斯和沃格林这样的思想家抽象地否认现代社会的成就有着极大的不同。例如，沃格林对“诺斯提教派的疯狂在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表现”的讨伐提出恢复对第一原理（prima principia）的传统哲学探讨——来反对当代的唯科学主义、现代对上帝的践踏和全面清除超然存在的经验。斯特劳斯抵制一切形式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也是在为古人辩护，而且总的说来在于否定被认为是灾难性的现代对亚里士多德发现的“政治真理”的否定。

与这些全面的批判相反，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进步的、解放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契机不应该被忽视。这是一个经过翻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比起早先任何具有改革性和人性的制度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有活力、多产和效率高（见论文六）。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累积的合理化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达到全面地从物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亚里士多德只是推测了这种可能性。然而，现代社会的这种生产优势也是现代社会有限合理性的根源。现代生活的标志是根深蒂固的矛盾，因为合理地推敲和实现政治目标决不等于合理化地改进生产手段。哈贝马斯指出，尽管饥饿仍然支配着地球上的三分之二人口，

> 消灭饥饿却不是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但是解放技术生产力（包括建造能够以大大超过天然意识的能力模拟有目的的合理行动的全部功能的自动化机器和学习机器，从而取代人类的努力）并不等于……在摆脱统治的相互影响中和在允许充分和没有强迫的互惠基础上发展规范。摆脱饥饿和贫困并不必然等于摆脱奴役和屈辱，因为在劳动和相互影响之间没有

自动发展的关系。

这一点在另一处表达得更加简练："生产力的发展不等于'幸福生活'的最终目标，至多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这种论点当然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整整30年里，哈贝马斯一直在鼓吹不要忘记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这又使他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指出必然性领域里的官僚主义合理化和道德—实践的政治发展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进步。两种合理行为方式之间的这种区别由于试图重新肯定正当地同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知识和适当地同（有潜能的）公共生活或交往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知识之间缺乏基本的同一性而被强化。

诚然，哈贝马斯恢复和重建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是初步的。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1961年12月在马尔堡作为就职演说首次发表），他回顾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技术（technē）和实践（praxis）的区别由此而失效的智力发展。由于托马斯主义者早就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概念说成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societas）的间接的世俗目标，所以哈贝马斯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关于社会秩序的哲学的历史看成是破坏关于最终导致幸福生活的伦理、法律和政治联合体的幻想的历史。他把第一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看成是现代政治生活秘诀的作者。他认为，马基雅维里创造了一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古代人来说好像是一种奇怪的矛盾说法。这种**技术政治**理论受在社会中管理人类的目的所支配。哈贝马斯承认，

> 马基雅维里把实际的政治知识贬低为一种技巧。……正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管理人民的技巧也是一种有特色的技巧，但这种技巧只是对人类行为起作用，而不是对大自然起作用——这一点对古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人类本身的行为和

> 举止，尤其是他们对一意孤行和征服的渴望，是君主般的手艺人所要加工的材料。

亚里士多德的中心论点是，公民可以通过遵照事物的天然秩序运用他们的能力，而马基雅维里则坚持认为，政治家可以在技术上控制不可改变的人性的种种含有恶意的倾向。马基雅维里关心传统的败坏、据说是变化无常和自私的个人欲望以及在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许多欧洲政治制度的脆弱性，旨在确保人类通过从技术上改变政治制度生存下去。正是这些表面上看来不能根除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和斗争赋予这种新的政治概念以意义和存在的理由。政治变成增强平民的从属地位和保证君主及其国家机器反对平民的抗议的技巧。在这种条件下，研究政治不再是探索幸福美满生活的条件，而从此以后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生存的现实条件上。维持肉体生活和基本生存变成当前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

哈贝马斯断言马基雅维里鼓吹伦理学全面脱离君主的政治行动，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了。这种过分夸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过分信赖豪克海默的结果，豪克海默最早的著作断定马基雅维里是国家控制人类事务领域的辩护士，而人类事务被设想为只不过是控制的天然对象。马基雅维里为这个事实辩护：政治和伦理学进入了相互对抗的关系，这样说也许更确切。在新的现代性条件下，政治不再等于为争取说话和行动的幸福生活而斗争；从此以后，坚持要求勇猛的君主和狡猾的君主都必须经常显得仁慈、忠实、人道、真诚和笃信宗教。因此，马基雅维里也建议，君主应该消灭他希望垄断其领土的政治者的家庭；真正的大方是慷他人之慨和守住自己的财产；应该分别加快和延长对敌人的虐待和对朋友的仁慈，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等等。马基雅维里的这些格言和其他格言证实了哈贝马斯更全面的提法：政治的进程现

在是战略而不是教育。在马基雅维里的手里，政治的范畴经历了某种决定性的变形——政治现在意味着统治人民(il populo)和平民(la plebe)、通过战略组织和对奸诈、外貌、金钱及人的正确利用调节财富(fortuna)的巧妙的伪政治艺术。

霍布斯关心使对“一个团体的内容、形式和权力”的理解科学化，大大地加速了旧政治的破坏和忘却。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人人反对人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念念不忘，导致他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关心通过国家的行动平息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霍布斯的理论方案符合席卷当时英国的两大过程：政治生活以最高国家权力的形式集中化和官僚主义化；通过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扩大消除旧的家庭生产方式。在来自这两个过程的压力下，霍布斯被认为作出了两个真正新的转折。第一，对这两个过程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手段的调查研究直接依靠自然科学的机械化世界图象。霍布斯的政治学通过对市民生活运动规律的研究，探索一种持久的政治秩序的建立，这种政治秩序充满了其有效性不受空间和时间影响的具有必然真理的种种建议。与马基雅维里形成对照的是，霍布斯利用伽利略的科学的经验——分析自我认识来发现科学地引导的、有计划的政治。哈贝马斯指出，“霍布斯第一个研究了‘市民生活的规律’，其目的显然在于把今后的政治行动置于他已经在当时的机械学中所了解到的受科学控制的技术这个更加可靠得多的基础上。”由于放弃了旧的幸福生活观念和中世纪关于自然规律的种种假设，所以霍布斯关于君主极权国家的论点是客观主义地产生的；他认为各种正确的政治学概念摹拟地符合它们的经验对象，即总是倾向于机械地行动的、有占有欲的、自动的个人。霍布斯坚持认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是强制履行这些有欲望的个人之间的各种契约的惟一和必要手段；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克服民间混乱不断引起的危机。

霍布斯的政治学通过这些经验主义的论点，破坏了传统的政

治概念，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所赞同的作为高级实践形式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在霍布斯的时代，首先确立了科学的、官僚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政治生活原来取决于实践智慧的具体规则，取决于深思熟虑和由背景决定的对该做什么的理解，现在则让位于有科学根据的政治学。理论（theōria），即思考永久的宇宙秩序的哲学行为，被带到人间并变成关于在科学技术上能做到什么的有用的预测性知识。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theōria）的思考性相对照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形式和内容本来就是为实际应用而设计的。马基雅维里对君主们的政治忠告具有通过在当代世界政治事务中的长期经历发展起来的“精巧的技术知识”的性质。哈贝马斯同意汉纳·阿伦特的看法：相比之下，新的政治学力求以科学的精确性产生管理国家的各种机构，这些机构的可靠性可以与靠发条和齿轮运转的钟表相媲美。政治理论的这种合理化——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仍能感觉到它的影响——公开放弃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和“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关心。新的政治学被完全是新的关心所支配，关心避免在新建立起来的商品化交换关系和官僚主义民族国家权力之间发生灾难性内战的方法。由于霍布斯，政治理论向变成一种以从经验中获得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知识为基础的“人性物理学”迈出了第一步。政治学从此以后必须指导权力并为权力服务。

霍布斯方案中的第二个新颖之处是，从性质上来说，它比马基雅维里的方案在更大程度上把重点放在君主的最高权力和在摆脱传统及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的过程中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市民社会之间日益成问题的关系上。哈贝马斯提醒我们，在霍布斯的方案中，社会被假定为一个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政治的由契约保证的交换领域。霍布斯承认和捍卫社会（一个臣民们在其中必须正确地行使其“自由买卖，要不然就互相签订契约；选择自己的住所、饮食、生活方式和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

子女”等权利的领域）的前提是它仅仅是非政治化管理的对象。新政治学不仅改变了政治的传统意义，而且改变了它的对象。“正直行为的”政治目标“变成了管理社会交往”。

哈贝马斯认为，霍布斯坚持认为国家破坏社会交往的可能性必须通过某种正式的法律制度互相调节来加以防止的看法，预示了后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若干重要原则。在这种自由主义传统中，社会公开反对以个人形式出现的绝对政治权力又以政策和国家为了和平和普遍福利而建立为前提。在一种宣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制度下，国家力求为（作为家长的）个人从容而自由地使用和享受他们的财产提供保证。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困窘生活的想象被宣告无效。按照霍布斯的（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福利不仅仅在于保护生活本身，而在于尽可能保护最舒适的生活。但这不是美德的结果，就像‘幸福生活’不是古典传统的结果一样，而是享受自由处置财产的结果”。从这里到洛克关于资产阶级的财产秩序是按契约和自然规律的前提建立起来的国家权力的天然基础的想法只有两小步。第二步——同样不考虑旧政治的实质性要求——是 18 世纪下半期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争论。在这种传统中，资产阶级的自然规律有效地经历了某种形式的社会化。在一个商品化交换领域日益从国家形式上的最高权力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中，这种自然规律被看成是支配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本身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哈贝马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例如潘恩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这种通过赞美一个无拘无束的社会使世界非政治化的运动的顶峰：政府应该产生于我们的软弱，而社会据说是自发地产生于我们的需要。

当然不应该忘记，复杂的过程——现代社会通过这些过程由于严格地同实践和生产的范畴分离而不再认识自己——决不是无可争辩的。正像下面将要论证的，哈贝马斯关于现代试图恢复对政治生活的传统评价的若干做法的说明过分简单，而且也许过分

偏重于德国人的做法（例如几乎根本没有谈到卢梭），因此只要扼要地说明一下就行了。哈贝马斯正确地指出，维科对新思想家（从伽利略到霍布斯）的批判涉及他们试图“把科学的鉴定方法带进深思熟虑的实践中去”的做法。尽管维科并不承认新的政治学揭示（即并不简单地隐瞒）历史上新出现的市民社会及其国家，然而他坚持认为在政治生活中抛弃花言巧语和深思熟虑是不合情理的。按照维科的看法，这种政治的非政治化不承认妨碍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和选择只能通过深思熟虑而不是通过用机械科学的精确尺度来衡量而得到解决。与这种论证相联系，哈贝马斯还谈到保守派反对强求一致的“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时代，尤其是伯克为公共事务中传统的深思熟虑学说进行辩护。最后，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时代公共领域学说的出现预示着要求取消传统的政治生活观念，这种要求虽然简单，但十分重要（见论文三）。按照卢梭等人使之激进化的这种公共领域原则，公民们有能力集合起来形成协调官僚主义立宪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私人需要的公众；他们脱离私人生产领域和家庭生活，进入一个独特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考虑到“自由讨论精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语）的解放。

这是哈贝马斯重新考虑德国唯心主义向自由主义官僚主义政治及其政治理论工具化提出挑战的理论背景。哈贝马斯认为青年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传统的批判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直接恢复并预先假设创造和行动之间的区别。可以回想一下，对康德来说，自我的发展在于形成一种自觉的“我”，这种“我”从世界上一切可能存在的客体中抽象出来，通过把自身看作惟一的客体来了解自身。“我”的自由主观性正是在于“我”能够知道自身是自行构成的。这种关于独立自主的自我的预先假设支持着实际推理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有理性、自由和单独的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和（抽象的）普遍规律是协调一致的，只要每个个人假

设他的行为准则同样是其他单独的个人必须遵守的准则。费希特关于物自体实际上就是思考原则本身的论点加深了康德关于超验自我的综合成就的论点，但决不是断然地和这种论点决裂。按照费希特的论点，这是独立自主的、过分自信的和具体化的自我，他的实践自由是通过争取靠创造世界和自身来实现自身的斗争表现出来的。自我仅仅因为假定自身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而存在。

与康德和费希特把单独的“我”理解为通过反省自身及其对象来创造自身的单纯统一体相反，青年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仅仅作为**互为主体地发展的**自我意识而出现。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精神哲学》激进的、哪怕是唯心主义的见解：自觉的自我的构成被认为不是通过单独反省自身，而是通过几个有明确阶段性的形成过程的复杂交替而发生的。按照彼岸的哲学(Jenenser)分类法，精神的自我形成过程是通过3种没有联系但又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媒介展开的：符号的或语言的表述、独特的劳动过程和相互的影响。第一种媒介，即给予名称，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劳动和相互影响的必要协调条件。黑格尔谈到了人类意识利用符号即给事物以名称的能力。不像夜里做梦时看到的那些乱七八糟和莫明其妙的形象，清醒的意识用符号表述事物的能力就是它区别和系统地辨认并记住它所区别的事物的能力。通过符号的运用，说话的意识通过它的客观化感到自身是主观的。

精明或狡猾的意识的发展（以意识的表述能力为前提）标志着人类通过克服刻不容缓的肉体欲望使自身同大自然区别开来的倾向。按照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解释，这是精神自我形成过程的第二种媒介：精明的意识。通过精明的意识、劳动和制造工具，狡猾的主体用骗过和克服自然过程的力量的办法使自身成为自为的客体。第三，通过和其他主体的相互影响（例如在家庭里），个别的主体学会通过另一个主体或“我”的眼睛认识自己。与他的前辈不同，黑格尔强调，自我意识不是原始的或最初的经验，这种

经验基本上是孤立的。自我意识只是通过精神的互为主观性形成的，因此“我”的发展不是就“我”本身而言的。而是就“我”和作为“我”的他人的另一个“我”的交往而言的。按照青年黑格尔的说法，这个过程（也以意识的表述力为前提）的范例是恋人们之间以原先的冲突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伦理关系。在这里，爱情被理解为产生于恋爱对象的互相承认并依靠这种互相承认维持下去的具体的一般认识。总之，爱情是通过非暴力地克服原先的藐视和缺乏同一性、通过争取互相承认的生死斗争**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不久就放弃了精神的自我形成是通过象征性地起媒介作用的劳动和争取互相承认的斗争的唯心主义说法。或者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从百科全书派（Enzyklopädie）时代起，主体、客体和绝对精神这样一些更为人所熟悉的范畴占了优势：十分重要的亚里士多德二元论遭到了压制；理论和实践的推理立即得到认同。由于自为地存在着，所以精神被看成是假定一个自然的世界，承认这个世界是精神自身自我创造的前提。自然被设想为“他物”，是精神积极地展开自身的凝结物：概念既是思想的客体，也是思想的主体。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关于主人—奴隶辩证法的讨论（在《精神现象学》中）是可以看到黑格尔回顾和描述旧的彼岸的哲学（Jenenser）先验图式的最后机会。劳动、相互影响和精神的辩证法在那里重新受到注意：奴隶对主人的单方面有意识的**政治**承认被奴隶对大自然所占的优势所推翻，这是一种单方面通过**劳动**获得的自觉的优势。

正是这种自觉劳动和政治承认的辩证法被青年黑格尔派所接受，但是又被马克思彻底改造。马克思通过批判地考察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通过社会劳动积累起来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和生产关系（争取相互承认的重大斗争）之间的矛盾的各种可能性，重新解释了这种辩证法。马克思通过把历史解释为主动的有意识劳动的自我运动，力求令人信服地证明，

无产阶级为重新获得他们被冻结的、维持生活的劳动权而进行的自觉斗争就是他们争取被承认是一个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商品化关系的阶级的政治斗争。早期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论点在概念上的模棱两可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意见不一致把我们引向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新亚里士多德式非难的核心。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没有恰当地解释和分析基本上是独立的相互影响和劳动的合理性，反而依靠漫无边际的社会实践概念把前者归结为后者——即把交往行为归结为工具性行为。马克思尽管明确地为革命政治行动的计划辩护，却使这种计划转而反对其自身；至少在范畴的层次上，他不成功地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因此，他关于革命的可能性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论点便受到生产主义的或经济主义的曲解。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对官僚主义的合理性的批判必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害处，因为马克思没有使自己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的行政管理传统。只要这是引起争论并仍然受到激烈驳斥的指责，而哈贝马斯试图根据这种指责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重建生产和实践二元论，对他的论据就需要进一步考察 。

马克思的模棱两可

至少在最早的阐述中，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一种意识内的批评，即和马克思一样思考又反对马克思，试图比马克思自己更理解马克思。必须强调，这种意识内的批评并不完全依靠仔细地分析和“同情地”阅读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从晚期资本主义的优势和更全面地关心官僚制度的合理化出发，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陈述也必须被解释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特有的开创性理论成就，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成就无意中归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传统。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特有的，严

格地说，它的阐述既是现代资产阶级抹杀传统的劳动—政治区别的牺牲品，又是同谋者。马克思坚持认为意识的局限性符合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计划本身。应该指出，这种说法与某些关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逐渐过时的论点（论文三已分析过）并不一致；因为哈贝马斯用一种更认识论的说法补充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由于迷信社会劳动的概念，所以马克思的剥削和解放理论被指责为无意中有助于现代性使创造与行动二元论黯然失色。

诚然，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及其对于社会劳动范畴的依赖关系。马克思的计划对生产的关心看来正确地揭露了一种独特社会形式的逻辑和不合理性，这种社会形式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冲突实际上不再通过直接的政治控制而制度化，不再用文化神话或文化传统来证明其正当。与早期相比，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商品形式来稳定这种剥削和冲突，而商品形式本身是由一系列正规法律和一种意识形态来保证的，这些法律和这种意识形态被用来掩盖这种商品形式的强制性和受权力支配的性质，把商品化等价交换说成是公正的。马克思力求通过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批判性研究来使之改变本性的正是这种非政治化阶级剥削的自然发展。哈贝马斯认为，这些研究是围绕着改造自然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来进行的，通过这些研究看到人类的日常信心及其与自然的结合受到了影响。哈贝马斯提到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著名批判：

> 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的结论——作为活动和生产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中，重要的仅仅是，黑格尔把人类的自我发展理解为一个过程，把客观化理解为失去对象，理解为异化和这种异化的超然存在；因此他把劳动的性质和客观的人类（由于是实际的所以是真实的）理解为人类

自身劳动的结果。

哈贝马斯以下述方式来解释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他说，构成世界的主体不再被设想为一种主动使自己外表化的意识，而是被设想为具体的、在自然条件下主动创造生存手段的人类。这种主动创造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的生存条件。通过其创造生存手段的能力，人类便变成人类，克服其自然状态，与动物区别开来。尽管自然是界这个过程的先决条件或基础，但马克思并不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界似的过程。通过劳动，一部分自然界（人类）变成主观的、自为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外部自然界分割开来，外部自然界因此便变成对于人类的自然存在来说是客观的自然界。历史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结合；通过劳动的过程，外部自然界成功地被人性化，人类的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发展、改造和满足。

应该承认，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的劳动范畴的描述很不完整——实际上是片面的。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贬低马克思的范畴的丰富性和微妙性的做法，而对这种做法令人不快的结果则不得不在别处分析（见论文六）。关键在于，像哈贝马斯一贯所做那样把社会劳动看成是一种“工具性劳动的行为体系（Funktionskreis instrumentalen Handelns）”，（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就是忘记一般劳动正在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变成社会劳动的。奇怪的是，哈贝马斯忘记他自己关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描述（见论文三）的丰富性是由受法律保护的商品化劳资关系的原则构成的。他既提到又贬低马克思的重要见解：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量化的单一性社会劳动制度，它的抽象一般性通过强迫劳动者遵守自然界的支配和商品生产互补的逻辑抹杀他们无可匹敌的主观能力。可以说，哈贝马斯在贬低这种见解和采取“资本的立场”时，还掩盖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抽象劳动制度、一种

主体暂时但并非偶然地不能解放他们自我改造的客观化能力的制度的考虑。显然，马克思的图式（与韦伯的图式不同，哈贝马斯在这一点上与韦伯十分相近）是以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模式为依据的：人类的自然存在通过社会劳动创造他们的客观世界和他们自己。人类通过劳动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改变他们自己的本性，发展他们潜在的能力。人类的劳动既为主体创造客体，又为客体创造主体。

在哈贝马斯的阐述中，避而不谈的恰恰是这种空想的具体劳动作为被解放的主体的自我实现和客观化的概念。他通常认为马克思只谈可以称之为劳动过程的客观演绎阶段的东西——劳动过程有能力通过巧妙地支配客观的自然过程创造大量满足各种需要的物体。哈贝马斯把劳动解释成一种主要依靠工具的活动，只要它的直接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通过努力完善控制和适应自然界的技术手段来满足生活的永恒需要。劳动全力对付普遍存在的必然性；这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合理化过程，其目的是为人类的消费有效地综合加工大量有用的物体。相应地说，在这种工具性活动的框架内产生的知识是“通过在受反馈控制的活动领域里不断摸索所获得的”生产性技术知识。并不奇怪，正是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的这种新亚里士多德式的贬低导致哈贝马斯称赞众所周知的《大纲》中关于用不变资本置换可变资本的段落。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研究。发明变成一种商业行为，因为资本倾向于赋予生产以某种科学性。资本主义力求支配自然界的趋势在加速，到了由生产性知识引导的固定资本取代直接的、活的劳动力的程度，后者相对说来不太重要。由于力求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又继续假定劳动时间是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来源，所以资本本身便成了引起关注的矛盾。这就好比资本的不停运动预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像《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不自由的“物质生产本

身”的减少是由“必然性和世俗考虑”所决定的。

哈贝马斯重新解释马克思并坚持这样的论点：“一旦社会主体把自己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说取得了与科学化生产并列的地位，人类的自我生成行为便完成了。”哈贝马斯解释道，正是根据这种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论点，耗费掉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作为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的指数也变得过时了。有效手段的短缺和劳动的强制性从前给人性化过程投下的阴影由此被驱散。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大纲》的一些段落期望作为劳动的劳动得胜并永远停止。“圣经对劳动的诅咒”将被打破的诺言受到欢呼。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即将衰退标志着即将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梦想的可能性。据说马克思在这里不是设想通过革命用具体的、有分工的劳动取代抽象的、被异化的劳动，而是把劳动过程改造成一个科学地合理化的过程。这种劳动过程的科技合理化会在现在已完全彻底地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类的控制下带来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哈贝马斯最后说，“马克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期待着自动化。他认为，只有在科学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成为第一生产力时，生产力的发展才开始达到这种程度。”

哈贝马斯正确地承认马克思的信念：可变资本倾向于被科学化的不变资本所取代并不以任何铁的必然性导致有关生产者的解放。仅仅把生产者安排成自动化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并不等于他们的解放。这是因为，生产力（包括活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继续由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归化力保证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调节，实际上是被束缚。因此，活的生产力的解放取决于从政治上改变以符号为媒介的权力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权力关系主要采取一种经济上的、由阶级构成的形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点有助于说明这种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潜在的）社会个人抛弃迷信的外衣和限制其日常生活的命运时，19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

功。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不仅仅是无形的，也不仅仅是幽灵。被统治的阶级的成员必须与它的归化作用作斗争。通过他们为争取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必须削弱表面上的权力，因为过去的传统有力地冲击着那些生活在现代的无产者的心灵。

哈贝马斯（甚至考虑到他对劳动范畴的简要解释）原则上同意："劳动力的发展不等于'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然而，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的政治信念的合理性与这种信念在其中产生并被证明是合理的范畴是绝对矛盾的。哈贝马斯用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见解来指责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我形成是通过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作用于自身——展开的，这种论点使人误解地断定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在范畴的层次上，一种彻底的"唯生产率论"和"经济主义"的逻辑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性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被看成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过程——社会劳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正像费希特的自我只有坚持自己的权利才能认识自己，所以自己安排的劳动活动只有通过自己的外表化和客观化的成就才能变成自己的有意识活动。在马克思的图式中，一个由世界组成的主体的杰出成就被认为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人类劳动结构。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第一卷和《评阿道夫·瓦格纳》的论点："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既不意味着"抽象的脑力劳动"（黑格尔的看法），也不意味着产生于政治的意识和规范（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而是意味着创造自身及其自我解释的人类主体在历史上形成的劳动。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人类作为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的范畴是一种行动和理解世界（Weltauffassung）的图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控制万物和他们的伙伴的愿望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成为他们的智力活动的基础。精神原本是空虚的；它所形成的各种概念是积累"实践—工具"经验的结果。

因此，按照对马克思的图式的精确解释，自由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把物质生产力包括在内的限制性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所引起的种种斗争的结果。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对依赖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的消失似乎仅仅是这种生产及其斗争的辩证法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构想，尽管他敏锐地意识到统治阶级倾向于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马克思还是没有恰当地提出并分析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问题。马克思的分析经常是含糊的，甚至是同义反复的（“革命思想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存在是一个革命阶级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往往假定，劳动者在他们的革命运动中的实际行动会自动地改变他们的自我理解，从而清除意识形态思想和传统习惯的“污垢”。

哈贝马斯在这些阐述中出色地和令人信服地发现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看来仍以类似黑格尔思想的方式逐渐表露出来，从而回避那些协调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的过程的逻辑问题。这种论点与哈贝马斯更露骨地反对马克思的理由重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不确切、不明确的社会劳动或“实践”概念不知不觉地合并人类活动的两个在分析时可以分开的时刻：**劳动**，或者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交换中的主客体关系；**交往**，或者彼此交谈和/或互相对立的思考和说话的行动者之间的主体间的、用规范来调节的关系。哈贝马斯因而声称，马克思的经验主义分析和这些分析富有哲理性的自知之明之间有一个奇怪的空隙。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经验主义分析是用物质性活动的范畴和批判地废除意识形态、用工具性行动（劳动）和革命的实践及批判性反思来调整的。然而，奇怪的是，马克思把他的全面研究塞进更受限制的人类通过劳动来反省的概念中。

而且这不是唯一的难点。因为马克思认同和合并象征性地受到限制的互相承识和在单一的劳动范畴内生产的各种不同的合理

性，所以他像他的许多资产阶级先辈那样，不能区别科技知识和作为基本上不能衡量的知识的实际上有启发作用的智慧。他不知不觉地屈从于官僚主义合理化思考的权力；凭经验分析的自然科学的逻辑地位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被适当地区别开来。一种对“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注重实践的智慧的目的〔telos〕的描述）的取决于背景的批判性理解被局限于科技能做到什么的经验知识的范畴。不能区别两种理论方案……从技术观点来解释现实和从实践观点来解释现实——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地考虑到理论的规范依据和政治依据。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解释成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为什么马克思从来没有精确地考虑过一种被当作有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批判来精心设计的“人类科学”、一种本身不同于经验分析的自然科学的工具主义的科学的含义却更加明确了。哈贝马斯用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式语言来概括这些指责：“马克思把政治公众的见解与成功的技术控制等同起来。”

为了支持这种论点，哈贝马斯又说，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变化……可以由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决定”，对这种看法完全不必感到奇怪。这毕竟是这样一个时期，它对科学进步日益强烈的信任说明它是较早的后马基雅维里式的使政治推理工具化的运动的继承者。例如，孔德就赞许地欢呼这个时期是“建设性时代”的开始。他和另一些人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露出曙光——在这个时代里，经验分析科学的好处会渗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严格地遵守观察规则、方法的确定性和关心精确性，技术上可以利用的建设性知识就可以变成社会变革的工具。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与这种官僚主义化的“建设性时代”的影响决裂不是决定性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科学地掌握资产阶级社会动向的经济规律，采取了一种“劳动哲

学”的形式，这种哲学声称它自己的逻辑与经验分析科学的逻辑是一致的。实践批判理性——正像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所强调的，“不留情面地批判一切现有条件，不留情面的意思是指批判不怕它的发现，就像不怕与现有各种权力发生冲突”一样——不知不觉地受到羞辱。道德实践知识被曲解为一种技术知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加强了后康德哲学内部和更加一般地在社会政治生活内部放弃批判性地探讨经验分析科学的逻辑和局限性的倾向。马克思竟然给对分析性科学哲学盲目自信的方法论探讨进行认识论反省带上实证主义的枷锁。由于把批判性反思等同于自然科学，马克思不言而喻地否认这种批判及其认识论任务和政治任务。哈贝马斯当然知道，某些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并没有避开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这种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求助于关于它的科学地位的论据来保持它的可信性，要冒承受任何唯科学主义都会遇到的风险，即忠实地、不加批判地相信自己是可以在技术上完成的通用知识的风险。总之，这种马克思主义有可能遇到盲目地把自己交给晚期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精打细算的合理性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我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印象：哈贝马斯反对马克思时也采取批判经验分析科学的成功和潜力。相反，哈贝马斯却赞扬这种科学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种进步的成就。他认为这种科学曾大大地有助于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过程来控制外部自然界的尝试。把数学式的精确和对照实验的确定性有效地结合起来，科学技术的思考便像马克思所预见到的那样变成了人类为通过征服自然界永远消除贫乏而斗争的主要助手。然而，马克思却被指责没有看到，经验分析科学为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这种计划到了它的力量和影响在现代世界无孔不入的程度时会有倒退的结果。对马克思的阐述的这种不理解与他把亚里士多德严格地区别开来的生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合情合理地运用于必要劳动领域——和

道德实践知识——其目的（telos）是启发说话和行动的主体自我理解——合并在一起是一致的。马克思从而低估了这样一点：在现代条件下，生产性知识和活动一直被滥用，不合理地强加给严格地说来不属于必要劳动领域的生活和智力探索领域。因此，哈贝马斯告诫说："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在被作为一种解放力的科学所充斥时，可以以一种有益的方式起作用，而一旦力求排他地控制技术处理领域以外的实践领域，便成了造成灾难的力量。"技术推理和劳动只有通过否定它们的绝对性才能有它们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它们必须是"相对化的"，通过更加全面地理解合理性来获得它们的地位。这种告诫类似青年豪克海姆30年前在法兰克福的传统中提出的警告。用豪克海姆的话来说，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反映"在于这个时期试图错误地使经验分析科学精打细算的逻辑普遍化，那么，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

知识和人类的兴趣：劳动和交往的对立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论点一直是，哈贝马斯对官僚主义合理性的局限性的关心导致他重新提出和研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区别。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已经成功地抹煞和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二元论。马克思甚至并不与这种忘却过程决裂。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的片面性及其与现代资产阶级对官僚主义合理化思考和行动的盲目崇拜的密切关系相反，哈贝马斯一再坚决主张，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应该把两种形式的解放区别开来。社会从外部的自然力中解放出来，靠的是劳动过程和技术上可以利用的知识；然而社会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制度中自我解放出来则取决于建立和组织根据"不受控制的交往"原则构成的公共生活领域的能力。

通过劳动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和非暴力交往的对立：哈贝马斯试图恢复两种按等级顺序进行和不能比较的有意识活动，这种尝试起先当然是初步的。不过在50年代他最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陈述了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区别。这些著作证明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人所共知的区别。哈贝马斯早期的论文在这种二元论的范围内谈到了一个实现的可能性据说现在经常出现在所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目标：不受干扰的自由（Musse）。这些社会据说表现出某些新的倾向，这些倾向有助于减轻和停止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受官僚主义化劳动的合理性限制的闲暇时间来说的普遍贫困化。哈贝马斯认为，特别关键的是那些促进生产增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发展。他提出，这些倾向给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居民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必要劳动和建立不受干扰的自由空间的新的可能性。闲暇时间——迄今为止一直被一个受商品困扰的时代的种种规定的限制，这个时代倾向于产生种种“额外的虚假需要”——可以变成真正的自由时间。

按照青年哈贝马斯的看法，这种真正的自由时间是普遍的文化创造力的前提。这种论点具有明显的传统推动力。哈贝马斯说，

> 希腊公民由于有奴隶而摆脱了现代意义上劳动，然而仍有种种需要认真关心的事。否则，他们就不会产生城邦，也不会产生庙宇、雕塑和哲学。局限于产生这种人类高级创造物的文化当然是丰裕的产物：不是自由时间的结果，而是闲暇（Musse）的产物。今天的非技术工人有的是自由时间，由他“支配”的自由时间也许甚至更多；但是他不可能产生使他的“业余爱好”首先在文化上有所创造的行为规范。

只有通过真正自由的闲暇时间提供的放松的空闲（entspannten Müssiggang）和从容的努力（mussevollen Anspannung），先进工

业国家的居民才能“自觉地参与社会活动”。

哈贝马斯发展这个论题，在60年代初期的著作中首次明确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技术和实践的区别。这种区别以一种“根本利益的客观复合”理论的形式出现，这种理论构成各种认知过程及其展开和运用的逻辑。在很快就被称之为“人类学的”转折的过程中，哈贝马斯显然受到了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更直接的是，这种人类学的利益理论可以被看成是，通过改进韦伯的著名论点：“不是思想而是物质的和理想的利益支配着人类的行为”，来使亚里士多德的劳动——实践二元论激进化的早期（后来被放弃）尝试。

在哈贝马斯60年代写的较重要的认识论论文《知识和人类的兴趣》中，这种改进最彻底了。1965年6月，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就扼要地谈到了这部著作的要点。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试图把康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用他们的话来证明可能获得的知识的超验条件是由人类各种不变的、“真正的”物质生活活动构成的。作为一切知识的明确的条件，这些活动或兴趣不能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理解——例如，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据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政治感兴趣。而兴趣的概念在人类学上意味着不变的有利地位，人类从这种地位出发积极地理解现实。兴趣是知识的要素，即人类学习过程的形式的要素。兴趣不应该被解释（就像迷惑人的信仰在“纯理论”中那样解释）为妨碍产生客观知识的可以消除的障碍物。相反的，兴趣是一开始就规定逻辑的见识，按照这种逻辑，现实可以变成理性知识的对象。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兴趣是“基本条件的体系（或者“超验的框架”），在这种体系中，我们先验地和先于一切科学地使我们的经验变得有条有理，而且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做，使……科学对象领域的形成也受到这种方式的损害”。在早期的哈贝马斯看来，在这种先验的框架中产生的知识不只有利于达到简单地重复人类肉体需要的

目的。知识既是简单生活的工具，也是幸福生活的工具。人类不仅在与外部自然界所进行的必要的和维持生命的交易中学习，而且通过自身的相互影响学习。适用于必然性的知识和适用于自由的知识之间的区别再一次被提到。人类的知识注定是和人类通过劳动的代谢活动适应自然界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知识也表现出人类通过各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按规范调节的交往活动来超越自然界的斗争。

这种一般图式的形而上学假设——即知识以兴趣为基础，兴趣保证人类对外部自然界的适应和通过符号文化的再适应——是靠坚持认为人类的“基本”兴趣有两种来提出的：工作（有时称为“劳动”、“社会劳动”或“有目的的理性行动”）和交往（有时称为“交往行动”、“相互影响”或“象征互动”）。由于工作和交往等活动，历史被早期的哈贝马斯看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外部自然界通过这个过程被“人性化”，受人类意识的影响和支配；与此同时，“内在的”或人的本性本身也通过思考、言谈和相互影响而得到改造、个性化和解放。

在准备提出几点关于这种图式的用处的结论性看法时，可以扼要地和在一般性的最高层次上考察一下这些非同一形式的知识和兴趣。按照早期哈贝马斯的看法，工作是那种受人类与外部自然界打交道的持久需要推动的以知识为媒介的活动。劳动固有的目标是扩大整个客观的生产力和技术，保证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劳动严格地说来是精打细算的官僚主义行动的领域；通过熟练的工作，事物、事件和条件（包括他人的劳动）被当作客观的过程来体验，而客观的过程在原则上可以受数学计算、行政管理和改革的影响。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劳动是一种灵巧的活动，是“针对我们设置的目标并达到这个目标而做事”的能力。

同样与亚里士多德把生产和劳动描绘成人类出现以前就有的活动相一致的是，早期的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劳动决不是与众不同

的人类活动。从人类学和评价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生态学的证据表明，计算、工具制造和生产活动把所有人科动物（包括人类本身）和灵长目动物区别开来。在智人（homo sapiens）之前，早期的人科动物（例如黑猩猩）也形成了狩猎群体，发展了武器和工具，通过萌芽状态的劳动分工进行合作，甚至按照某些分配规则分配它们的捕获物。因此，哈贝马斯暗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只适用于把人科动物的生活方式同灵长目动物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包括人类在重复人类生命活动时所特有的社会劳动。从评价的意义上来说，劳动也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的。有损尊严的、有用的和强迫性的劳动是一种负担，人类与之斗争而受到责备。这不仅是因为斗争的成功预示着推迟满足各种欲望。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最终和更高的目的——自由的交往——和劳动本身是不相干的；劳动是一种**技术上**的兴趣，是一种受产生生活物质需要的必要性控制和受手段支配的过程。不受拘束的伙伴关系或交往不能进入劳动的领域：劳动原则上是孤立的和无声的，是一个隐蔽的和无声的必然王国。劳动是需要技巧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动。

在这里，早期的哈贝马斯直接吸收了韦伯的观点，后者认为有目的的理性行动是“由对对象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望决定的；这些期望被用来作为达到行动者自己合理地追求和有计划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在哈贝马斯对这个论点的解释中，有目的的合理行动是与在具有对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知识、组织效率及有效资源的条件下实现明确的目标（广义地说是人类通过控制自然界来摆脱物质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与通过组织各种合适的手段成功地达到目标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行动在原则上可以受经验分析科学的理论的指导，劳动与这些理论具有某种特殊的——实际上是内在的——亲合力。有目的的理性活动也可得到经验地产生的、起帮助选择作用的技术和战

略规则的引导。这些规则包括关于经验规律性的科学知识、关于技术上的可能性的预测、关于某些已采取的策略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的推断，等等。

作为有目的的理性行动的劳动可以被分解（正像赫尔德和麦卡锡曾经指出的，哈贝马斯早先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成两个明确的方向或要素。第一，哈贝马斯提出，劳动存在于处理自然对象时使用多种手段的**工具性行动**、被冻结的劳动的对象和按照有效控制标准被看作一种对象的劳动力中。作为工具性行动的劳动是由各种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尊重手段的效力，尊重预见的能力和技术的合适性。劳动遵守以经验分析的预测性知识为依据的技术规则。在这个方面，工具性行动和伽利略以后的科学的经验分析研究有着某种特殊的亲合力。这种科学力求产生在技术上可以利用的、其有效性是实用主义地确定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有条件地预言两者都取决于和预示人类成功地控制对象化的过程。这种预测的和实用主义的科学已经变成生产过程的伟大助手，这一点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非常明显的；实验科学和生产的结合可以说暴露了引导这种科学的知识的兴趣。正像从前的手艺人在加工材料时受已经在他们这个行业的传统中得到检验的经验规则指导一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依靠科学的工具、操作和预测。因此，对现代经验分析科学的知识的作用要和社会劳动制度联系起来理解。这种科学“发挥我们在技术上控制各种对象或——结果相同的——自然界和社会被对象化的过程的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合理化”。

第二，哈贝马斯还谈到劳动的战略选择方面或合理选择方面。在被认为是**战略行动**时，劳动是工具性行动，得到为达到生产目标选择最协调、最合适的手段的规则或决定的补充。战略行动与最大限度地合理选择达到既定目标的合适手段有关。因此，战略行动原则上可以得到分析知识（例如决策理论或管理科学所提供

的知识）的帮助，这种知识有助于正确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战略行动力求有效地协调各种工具性活动，并就一系列可能达到、但不相同的目标正确地分析和评价这些活动的有效性。

通过战略行动概念，早期的哈贝马斯再次提出，作为有目的的合理行动的劳动总是由一系列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产生于劳动的领域之外，即产生于交往兴趣的框架之内。通过交往行动产生的规范性规则具体说明劳动的最终或更高目的——例如，生产应该是为了商品化交换呢还是为了进行政治交易的公民集体的使用。当早期的哈贝马斯谈到交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兴趣时，他的意思是指行动的领域——例如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这些领域用普通的语言建立起来的，受法令和规范的指导。与劳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劳动的过程和自然界被认为是客观的，而且可以受官僚主义的支配——里独白式的、巧妙的行动相反，交往采取说话和行动的主体之间（可能）互为主体或对话关系的形式。交往行动以社会和政治行动者们相互认同为前提，他们的交往由至少最低限度地彼此意识到他们相互影响的传统规则构成。这些规则，以及他们引起的相互期望和义务，通过传统的法令得以实施。这些规则和法令当然会过时和改变。但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的失误被认为是不称职或无能，而相互影响的中断却有时被理解为行为不当或越轨，有时被理解为有理由的或没有理由的反抗，或者自我毁灭的身心失调。

哈贝马斯决不否认交往行动在其中采取假相互依存形式的过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论文五中讨论），所有存在至今的社会形态，包括晚期资本主义的现阶段，一直以制度化地控制和处理人类通过无拘无束的谈话和行动彼此认识的能力为标志。然而这种说话和行动的能力是我们的存在特别具有人性的东西。与自然对象截然不同，人类是他们的语言的创造者和产物。通过语言和交往，主体当然依靠获得从事熟练的手段目的分析能力变成主体；

从而终于有资格在劳动领域里采取行动。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观性通过普通语言交流而获得的发展可能仅仅是熟练的和有目的的理性分析的超越。由于他们成为语言和交往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主体终于被社会化，具有内在化的规范或人格结构，这种规范或结构使他们后来能够接受或拒绝各种规范，并形成个人之间的关系。总之，通过他们在其中成长的语言体系，主体终于能够规定和改变他们和其他人相互影响的意义和形式。

这样论证——他后来将更加系统地发挥其实质和涵义——的结果是，青年哈贝马斯提出一系列新的和仍然有争议的论据，而这些论据的亚里士多德风格却是不会被误解的。按照他的看法，主体在交往领域里学会说话和行动；不管多么不顺利，这种学习过程还是可以产生某种公开审议的能力、实践的智慧和道德实践创造力。语言的学习预示着成年（Mündigkeit）；说话和行动意味着有能力参与和他人的交往的意志。这种交往的能力可以说潜伏在一切交往行动之后。说话的行动者可以变成争取互相承认和理解的政治生物，这种可能性并非仅仅是幻想，因为正像哈贝马斯在他最早和最大胆的陈述中所坚持认为的，“我们的第一句话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达到普遍和毫不勉强的一致的意图”。这个论点对社会文化科学来说包含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涵义。因为交往的能力是在相互影响的领域里表现出来或被预感到的。哈贝马斯正确地告诫人们提防通过经验分析科学的对象化的控制程序来理解交往领域的迷惑人的理论尝试。经验分析科学假设原则上可以官僚主义地控制其进行对象化的过程，而社会或文化科学却必须力求**理解**“对象”，这些对象**也**是说话和行动的主体，他们的有意识发言和生活条件是用符号构成的。正像韦伯更早所认为的（见论文二），文化科学必须预防把有意识的行动变成纯粹的行为。相互影响的过程“不能不参考其指导意图而得到解释；即不能脱离某些近似于思想的东西来加以考察”。

然而，这并不是文化科学的任务的界限。只要交往的结构使个人具有自觉说话和行动的潜力，文化科学就必须力求解释这种潜力在其中被历史上多余的约束所限制的过程的逻辑。相反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文化科学必须干预这种交往潜力得以实现的条件。社会文化科学必须采取一种具有政治意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由于采取“戏剧式的”解释性理解的立场，所以这种批判力求公开和谴责对交往能力的种种限制。在扮演鼓吹者的角色时，这种理论论述的特征是力求重新提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基本上不同一的逻辑，而不顾现代官僚主义机构的巨大权力和影响范围。社会批判理论坚持这样一点：官僚主义的生产和管理形式的扩大并不等于幸福的政治生活。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背景下，早期的哈贝马斯断定，交往行动的规则可以充分适应工具性和战略性行动的类型的变化；但是交往行动的规则要受自身独有的独立自主的逻辑的支配。

两种合理性概念？

这最后一个论点使哈贝马斯可以重建和限制韦伯的官僚主义合理性概念。更早的和明显地相似的重建显然是在曼海姆详细说明韦伯关于职能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理性之间的区别时提出来的。按照曼海姆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肯定已经将一定程度的职能上的合理性引进了现代生活，因为这种工业化已经促使个人为了官僚主义地规定的目的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种工业化并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促进实质上的合理性，即个人明智地判断和行动的能力。这个论点实际上十分接近哈贝马斯的论点。分析起来，韦伯的合理化是越来越有目的地在技术上控制对象化过程的观念（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被哈贝马斯指明为仅仅是合理化的一种形式。官僚主义在劳动领域里发展生产力应该被理解为通过

发展无拘无束的谈话和行动使交往生活合理化的必要先决条件。谈到交往行动的合理化就是鼓吹克服系统地受到扭曲的交往，消除内心的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统治关系，这种关系已经长期妨碍了自由的和双方同意的行动的扩大。从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来看，成功地和有效地发展生产力不应该和争取非暴力的互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混为一谈。官僚主义的合理性仅仅是一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行动是可以合理化的。应该分清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根本不同形式的合理化。

这种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观点的结论，无疑大大地损害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的可靠性以及这种概念为官僚主义和领袖政治所作的片面辩护。这种概念也产生了新的未曾预料到的谜。哈贝马斯对60年代后期的主要著作《知识和人类的兴趣》所作的自我批评提供了解答其中某些问题的线索。但其他的难点依然继续存在。这些难点——在某种程度可以被看成是早期的劳动和交往理论的结果——继续使哈贝马斯后来的著作含糊其辞，而且可能影响他未来的研究。根据关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理论观点，至少可以看出三组难点。在进一步研究（见论文五至七）之前，这三组难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从本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哈贝马斯早期关于一切交往行动的解放前提的扼要论述需要大量的解释和润饰。当然，后来的关于自我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尤其是一般语用学理论的论点已经试图克服这种不足之处。为了在哲学上突出“公开、不受限制和控制的讨论”的政治目的并使之具体化，一般语用学理论特别试图详细阐述所有成年说话者在参与适当的交往行动时都必须遵守的不能废除的一般规则。按照这种理论的研究战略，交往可以被分析为完成由一系列规则或有效性要求构成的言语行为。进一步的推断是，至少在一切未中断和没有受到干扰的交往中，这些规则一起形成某种类似背景一致的东西。交往据说以至少对要

交流的东西表示默契为前提；一切不受干扰的交往都取决于交往能力的反事实的前景。

在60年代最早得到详细阐述之时起，一般语用学理论当然承认，许多机制在掩盖和堵塞交往能力的这种前景。因此，这种理论也承认，需要说明一贯受到曲解的或虚假的交往的机制，并且进一步承认，有必要涉及有关那些最有助于保护“不受控制的交往”的理论战略和政治战略的问题。后来的交往理论没有完全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而是越来越到了停止考虑变了形的交往问题的地步。（至于以下的难点，见论文五。）这些理论必然在理论上特别强调“双方同意的行动”，即说话的行动者已经在共同承认他们的相互影响满足真正的、不受控制的交往的条件这种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交往。交往理论后来所研究的合格的主体大概是**假设的**主体；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存在的各种交往被分析为好像它们的参与者都已经是合格的交往主体。

而且，后来的各种交往理论停止考虑典型地存在于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交往活动的某些方面。根据某种理论观点，哈贝马斯的合格的交往主体被剥夺了某些经验的和有根据的重要素质。例如，后来的交往理论倾向于不再强调交往长期表现出来的特性；它把重点放在双方同意的各种合理言语的形式上，使人误解地把修辞学上的和美学上的交往形式表述为合理的、双方同意的言语的派生物；一般语用学取决于较早的（上面已经分析过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的区别，再加上它的特殊形式取决于双方同意的行动，引起了在理论上不可思议地对公共生活中的争议、不服从和其他有目的的合理形式的行动的正常作用保持沉默；等等。可以看到，这些难点所产生的结果是，交往理论一直被迫通过非常抽象的和一般的论证方式来进行研究。这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倾向于否定哈贝马斯早期关于恢复和保护公开演说和相互影响的传统理想的考虑。交往理论放弃了它的鼓吹作用，越来越依靠合理地

重建抽象地设想、假设有能力的主体的能力的战略。交往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必然彼此脱离关系；交往理论因此不能对当代争取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的实质性方面提出许多见解。

哈贝马斯早期为**两种**合理化概念所作的辩护有争议地引起另一些有关的难点。由于和他的恢复和重建传统政治概念的计划有密切的联系，所以第二组难点甚至在他最新的著作中仍然存在。这些难点产生于他早期的——而且继续存在的——信念：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阻碍政治上独立自主发展的必然倾向。当然，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劳动和交往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赞扬是**有限度的**。他坚持认为（例如与技术决定论的论点相反），通过劳动逐步征服外部自然界也应该被看作一项政治任务。民主地安排产生于劳动领域的使用价值的斗争必须采取在公共交往领域里说话和行动的形式。实现**全面地**“以经济和管理合理性的形式渗入生活领域”的尝试必须放弃。在处理技术和政治问题时没有合理性的连续。然而，哈贝马斯一直坚信，劳动领域中的官僚主义合理化决不会使公开说话和行动的幸福生活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公共生活并不受伴随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而来的各种进步的妨碍。在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控制力原则上可以成功地被用来支持公共生活。

可以说，这种论点一直是哈贝马斯为公共生活辩护时的累赘（见论文六）。他坚信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等于**技术的合理化，这种看法过早地和错误地暗示劳动领域里现有的各种战略性和工具性行动不能变成非官僚主义的交往惯例。用有目的的合理性概念来分析官僚主义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把当代各种形式的劳动说成是**这种**合理性概念本来所指的对象是不能接受的。令人怀疑的是，哈贝马斯对官僚主义合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扩大的指责同时是为这种特殊形式的官僚主义合理性辩护。奇怪的是，他试图包抄和分割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结果却把官僚主义合理性当作

一种合法的合理性来为之辩护；他因此而严重地低估了标志着与外部自然界交换的当代形式的历史偶然性。这些交换形式曾经被提高到绝对起点的地位，提高为一种先于历史而存在、指导并概括历史的“自然力”。这种假设直接产生于劳动和交往之间的早期区别，所以倾向于不考虑科学、技术和劳动（包括家庭劳动和养儿育女）的现有形式问题。为劳动领域里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辩护的合理性不受重视。在这里，哈贝马斯的系统阐述显然（过分）受那些认为公共生活是由正确地排除私事的规则和机制所构成的领域的传统（和自由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在劳动的领域里，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得不保持沉默。

哈贝马斯关于经验分析的自然科学的论述倾向于加强他把劳动当作官僚主义合理性的一个领域来辩护的非政治化含义。他分析这种自然科学是一个积累的学习过程，其目标是成功地预言和控制的有效性；对于这种本来就受官僚主义地控制自然界和劳动领域中的对象化过程的目标指导的自然科学来说，不可能有其他民主的替代物。这个结论并不完全讲得通。例如，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自然科学的官僚主义取向是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成为官僚主义的生产和权力的特殊历史关系的一部分的表现。他的论述也没有谈到产生于医学和生物学、典型地伴随着监视现代世界人口的机制的发展而来的某种经验分析知识的政治含义。最后，他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导致的预言的范围和官僚主义控制的程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有限的。例如，外部自然界本身是否受成功的、全面的官僚主义控制的影响问题就被忽略了。总之，可以认为，哈贝马斯早期把现有的各种劳动形式看成是必然的官僚主义合理化的具体化，掩盖了一系列使人对劳动—交往二元论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的问题。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被暂时压下了：如何证明哈贝马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任何较

早的、具有改造和通人情性质的制度更有活力、更有旺盛的创造力、更有不顾一切的效率、因此更有解放的潜力是正确的？交往的民主化难道实际上并不要求消除劳动领域里的无自由权状态？实现不受控制的交往难道不是视彻底改变晚期资本主义与外部自然界进行交换的形式而定？难道不可以说，保护交往和劳动领域里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意味着在政治上保护外部自然界本身？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第三个问题：可以认为，早期的哈贝马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的消蚀的论述没有充分讨论现代化过程一直受即使官僚主义统治进一步发展也始终存在的政治传统限制的程度。（关于自由契约论，这个问题将在论文七中详细讨论。）关于劳动和交往二元论黯然失色的分析过分围绕着古典时代和动员起来反对古代权威的现代世界的换质位法进行。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他提到维科、伯克、青年黑格尔和传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最重要的例外——，早期的哈贝马斯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传统说成是现代社会革命化运动的不幸的牺牲品或残余。由于依靠阿伦特和沃林的类似论述，他也很容易得出结论说，现代性就是用各种非政治化的交往取代明显政治化的交往。

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化过程已经导致非现代传统的实质性解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像捕食动物一样靠某些传统的残余维持生存，这也是事实。诸如家长制这样的残存传统一直在促进各种官僚主义权力的发展和合法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其他传统已经证明是现代化过程更顽固的敌人。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有权威的死者仍在继续使那些活在现代世界上的人感到他们的存在。现代公民的人道主义传统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正像波科克和斯金纳曾经指出的，从马基雅维里的时代起，公民的人道主义运动就在保卫新古典 共和主义的乌托邦内容。公民的人道主义运动提出了政治行动如何才能在基督教时代的结构——与这种人道主义相反，否认任何在现世实现人道主义的可能性——的框架中得到承

认的问题。面对自身的现世有限性，公民的人道主义有意识地力求在被认为从根本上破坏一切具有现世稳定性的制度的无穷不合理事件中保卫共和主义的原则。

腐败和命运与品德相对抗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对抗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化过程丝毫不起作用的传统中。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社会和政治论述主要涉及公民品德、公共生活和由于契约论原则而合法的政府。这种公民的人道主义论述实际上是由这个时期的平民阶级不断地推翻政府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见不得人的特权——哈贝马斯本人在《社会的结构变化》中相当详细地论证过的主题——也可以被看成是这种公民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自觉的激进化。在来自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一种有限形式的公共生活被当作新文化秩序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公共生活将通过在政治上有能力和在社会上处于平等地位的（男性）公民联合起来进一步加强，这些公民坚持他们有权正式（通过各种选举）和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而把国家统治机构及其秘密政策置于批判性的监督之下。

这种公民监督政府的传统决没有完全消失。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公民的人道主义的、平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保留的独立自主的民主原则继续指导检查、限制和解散各种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政府的斗争。一种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理论，例如哈贝马斯在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那种理论，只有以非常空洞和抽象的一般阐述为代价才能忽视这些受传统指导的斗争。在后期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合理性的论述中，这个难点恰恰非常明显。他的论述的明显抽象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他早期不承认传统的范畴，尤其是产生于他的过头结论：现代社会通过成功地把每一个生活领域强行纳入官僚主义合理性的框框，压制了一切形式的实际合理性。一种对公共生活成为各种历史形式的生活的组成部分特别

敏感的公共生活理论必然公开拒绝这种结论。从“释义学”出发，这种理论可以补充、丰富并从而克服对交往行动的合理性过分形式化的解释。这种对各种历史形式的权力和政治的敏感性不等于不加批判地怀念作为传统的传统。相反的，依靠对抗议、抵制和团结等有一定生命力的传统出自内心的怀疑的理论战略，一种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的理论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公共生活理论可以更公开地承认其政治主张的由历史安排的特点，与此同时从使官僚主义的无理性继续存在——并继续反对这种无理性——的现存的道德—实践理性传统汲取营养。

论文五　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组成部分

公共舆论……应该像受到蔑视那样地受到尊敬。

——G. W. F. 黑格尔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起，一切解放的政治思想都关系到公共生活问题。这种独立自主的政治思想传统是从罗莎·卢森堡对这个革命初期阶段的批判开始的，与加强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共领域的发展有极大关系。至少，这是本文的论据，这个论据也可以被看做对这个传统的功绩或失败的一个试探性但决非包罗无遗的研究。这里必须强调，研究的出发点是内在的。它力求避免“纯粹的说教”（黑格尔语）而对20世纪公共生活理论的几位主要作者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论据将从特尼斯对舆论的开拓性批判开始，然后进一步考察杜威恢复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宣传原则并使之激进化的尝试。杜威为“自由和有计划的交往”原则所作的辩护被认为特别重要，因为它把最近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作为关键的主题置于突出的地位。这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里，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作出了最令人感兴趣和最富于雄心的贡献。本文将详尽分析和评价这些贡献。哈贝马斯近年潜心研究的一般语用学理论本身并不完全前后一致。这种理论设计由于几个固有的难点而受到了削弱，未能实现它的主要政治

意图，因而具有政治上退却的特征。哈贝马斯为新型公共生活所作的辩护与抽象的和形式上的重建理论模式——越来越成为他的研究的指南——是矛盾的。本文第三部分推断，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原则辩护的理论设计必须相应地克服哈贝马斯重要论点中的自相矛盾和形式主义。这种设计必须力求使一系列实质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内在化，本文将简要地分析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公共舆论批判

在开头时，正确评价与理论上为公共生活辩护的提出有关的历史背景是很重要的。很明显，在20世纪，一种持异议的公共政治思想传统的复苏决非事出无因。它必须被看做19世纪晚期以来官僚制度化普遍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对官僚主义的社会机构和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阶级合作关系引人注目的发展表示不满的一种反应（参见论文三）。正如希法亭等人首先认识到的，这种重新塑造生活的阶级合作是许多决定性的历史背景的发展所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文明社会内部经济力量的卡特尔化；有组织的资本和劳动群体的出现；这些利益群体和官僚主义政党之间联盟的形成；官僚制度的国家处处要扩大新的权力的倾向，这种权力通常被授予商业、农业和劳动组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和政治动员，由于议会外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由于想认可有组织的劳动的各种企图，这些阶级合作的倾向大为加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带，无论哪里的统治集团都是把政治上的稳定性看做是要求官僚主义的和集中化的整体性，以便进行讨价还价和控制，这种整体性对于个人权限和公共权力之间早先的区别是满不在乎的。

这种官僚主义的集中化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加速对议会的影响和对代议制政府的侵蚀。进行讨价还价和决策的场所开始从这里

转移到行政当局、非官方政党或联合决策委员会，转移到政府的各个部。政治上意见一致的形成使得专想动员舆论的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主要利益群体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愈来愈受到控制而不能独立行事。这里必须强调，这种讨价还价和动员舆论的过程并不导致单纯的抑制公共生活。在向晚期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官僚机构出于特殊目的，越来越极力动员舆论和充分发挥舆论的重要作用。主要的大公司和国家权力开始不大依靠老式的谴责公众的策略；它们以战时宣传和商品广告的方法为指导，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忠告"的协助下使公共生活得以正常化和井然有序。资本积累似乎越来越成为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积累的先决条件，而公共舆论的管理积累将是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积累中的关键。公共舆论既不应该一味顺从，也不应该单纯地回避。凭借科学技术的高度准确性，人们可以扩大和管理公共舆论并且把它塑成适合特定利益的形态。

19世纪初期，这种用命令的力量严格管理生活是以理性运动为媒介的，这个运动被不合时宜地和使人误解地称之为民主和舆论的"传统"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福利主义自由主义者和后自由主义者的论述对于早期自由主义者捍卫公众的经验和伦理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他们自以为是男性拥有财产和"有全权的公民"提出疑问。提出疑问的过程本身通常依靠深刻地相信经验分析调查的丰硕成果来鼓舞自己。舆论的动机起因据说是能够揭示和分析的，公共舆论的管理效果也是可以衡量的。帕累托坚决主张必须把公共舆论看作是披着唯心主义外衣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衍生物，而沃拉斯则坚信"政治的经验艺术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潜意识的非理性偏爱制造公共舆论"，这样，在分析隐藏在构成和操纵公共生活背后的潜意识力量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两个带有普遍倾向的例证。据称，政治人物在他们力图从老百姓中攫取成果时，善于隐蔽地利用诱导的提法和强迫地要人表态。通

过模仿和集体暗示的方法，很容易鼓动起公众易受感动和反复无常的行为。由于不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动机被认为易受移情的影响；它们可以被公众的目标替代和根据更加普遍的公共利益被合理化。

关于政治行为起因的动机因素这类论述通常都力图对公共舆论作出估量。这种公共舆论调查明显地利用市场消费者的调查，心照不宣地把消费体系和政治体系等同起来。公众据称是可以被探查和衡量甚至预测的。从假设出发，第一，个人肯定不可避免地对所有的事情有看法；第二，这些看法可以通过统计抽样，作为结果制成表格，并且通过数字使之再现，这些调查认为"公共舆论"同公众主动提出的看法和无人考虑的意见是同义词：这就构成了个人以经验为依据的现有信念的总和，它在整个权力关系中的形成被认为完全不成问题而接受（与唯名论的认识论相一致）。

应该强调，这些为衡量和制造舆论所进行的反民主辩护决不是畅行无阻，从未遇到挑战。特尼斯关于公共舆论的论述（也许在他的开拓性著作《公共舆论批判》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是对这种挑战最先作出的最富于洞察力的贡献之一。特尼斯对于公共舆论批判的贡献是复杂的，这里只能谈其梗概。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通过详尽阐述和对"纯粹的"与理想一典型的概念的归纳和经验主义的表述，这些贡献构成了他对于澄清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各方面意义的比较普遍的（与韦伯共有的）关注的组成部分。然而，与韦伯相反，特尼斯把公共舆论这个范畴放在他的设计中心。按照他的图式，现代文明的过程——**社会公有**（gesellschaftliche）的形态战胜以社团（Gemeinschaft）型为特征的形态——明显地改变了占优势的集体意志形态。由理性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契约、国家立法和舆论构成的生活模式占了优势。契约代替了家族的和谐；立法代替了农村

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态度；而公共舆论（在这里，特尼斯的进步超过了韦伯）取代宗教信仰。后者已经成为而前者则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决定因素。在特尼斯看来，现代形式的集体意志日益由这样一些因素构成：习俗或预测（特别是在进行经济生产和交换的场所）；通过建立合理的法规，力求制约人们行为的国家立法；公共舆论（在社团型社会中主要是使它自己适应生活的政治或伦理观点）。

特尼斯确信公共舆论的产生和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觉醒是相连的："最近几个世纪，基督教之所失，正是公共舆论之所得。"公共舆论从前被视为不利于和平和高尚人格而被憎恶和强迫禁止，现在越来越把这个时代置于批判无神论的咒语和"制造分裂及日趋分化的有目的的思想之下"。公共生活和公共舆论被看作政治秩序的主要力量，好像照耀国家路线的指路星。公众则变得被他们自己造成的敌人所钟爱：这些敌人是窒息舆论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专制暴君；逃避法官侦查的犯罪分子；以及批评普遍的无能只是为了替自己辩护的懦夫。已往的时代被掌握舆论的人自信地痛斥为无理性的黑暗时代。用特尼斯的范畴来表达，现代形式的集体意志（其中舆论是一个决定性方面）已经不再是"基本的意志（Wesenwille）"——一个根据它的传统、情感和绝对论的特性定义的范畴。相反，现代集体意志变得和认真思考尔后行动（即通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行为）的"独断专行的意志（Kürwille）"一模一样。同这种倾向一致，掌握舆论的人用来显示他们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的方法是，赞成或者不赞成政治事件，要求国家采取某些做法和消除某些弊端，坚决要求行政改革和立法措施，总之，为了某种所谓的共同利益，依据专为自己打算的判断方法，作出批判性的判断。

这里必须顺便指出，特尼斯反对他的同时代人的这种倾向，即把公共舆论说得好像是对任何事物含糊其词地表达意见的总和。

公共舆论和“众人的意志（Volonté de tous［卢梭语］）”不是同义词。公共舆论不包括在仅为实际存在的个人意见的总和中；它既不是所有人自发的意见，也不是没有任何人思考过的意见。与此相反，特尼斯认为舆论应该被看做对现存的权力关系的调查和对正确的与良好的行为的形成进行适当指导。在现代条件下，舆论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有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思考的意见是一致的。它预先假定这些能胜任的主体能够划清个人私下的意见和有政治觉悟的公众的普遍意见之间的界限和关系。公共舆论是“为了共同利益运用批判性判断的共同意志，它以抑制或促进的方法影响个人的行为举止”。

关于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特尼斯再三地评论到对于设想中的公共舆论日益增长的信任以及这种信任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习惯问题，而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尼斯提出这样的论点：相信舆论是坚强的和有威力的已经成为舆论本身一个关键的和“理所当然”的方面。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舆论的力量同它取而代之的各种宗教信条的力量彼此相像。公共舆论堪与神圣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唯恐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和对自己的自我表白的真理确信无疑的信仰相比较。与它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比较脆弱的状态相对照，公共舆论变得（用特尼斯从物理学中借用的词）更加“固体”了。对于舆论的原则的信任被证明是一种有理性的信念——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义务。公共舆论的经历有些像一个被神化的人，他的有生命的躯体以幽灵的外貌出现在那些成为它的媒介的人们身上。它愈来愈被体现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经常要么被崇拜，要么被诽谤，好像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和半神秘的人”。

正是这种舆论的神化在特尼斯的分析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惶恐心理。公共舆论作为现代集体意志的关键方面洋洋得意地出现，是一种基本上可以作两种解释的发展。公共舆论富有说服力的力

量据说同它的真实性成反比例。特尼斯听从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纲要》中提出）的告诫：公共舆论应该同时既被尊敬又被蔑视。特尼斯主要关注有组织的个人利益使公共舆论理想化的日益明显的倾向。他直率地强调，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公共舆论最经常地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的、有财产的和受过教育的阶级的舆论；“公共”一词通常把平民阶级排除在外。不过，他坚持认为，当前形势下的新鲜事物同它凭借管理手段的比较微妙比较透明的（假）公共舆论形态是一致的。现在，有组织的权力变得热衷于制造一种既有利于它们的特殊作用和目标的公共舆论，又符合它们自己理解的利益的更加普遍化的公共舆论。被急于和同样倾心于制造舆论的被觉察的对手进行斗争或互相勾结所驱使，所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必然力求把公众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改变为喜欢的事情。公共舆论是经过不断工作制造出来的：“公共舆论被不必要地反复说明，通常的结果是，某种公共舆论由此而被制造出来。”

有组织的报纸（当时正式交往的主要媒介）的影响特别关键。报纸越来越把自己描述为公众（实际上是追逐个人名利权位的凝聚体）的有组织的表达——其实是反映。宣传工具这种统率和制造舆论的作用都同样地来源于它的形式方面（例如所有制的垄断形式和对“新闻”版面编排的控制）；它的有选择性（或倾向性）的内容（社论、伪装的广告、对事情有意或无意的弄虚作假）；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权力集团的依赖组织关系。特尼斯认为有组织的资本和报纸的这种共生关系是特殊的决定性关系，因为在工业和商业资本的组织战略中，作为报纸主要生意经的广告同时又是一种关键性工具。所以，特尼斯推断，“判断和舆论”的产生、交换和消费的逻辑趋向于采取与所有商品共有的形式：“在这种交流形式中，判断和舆论像杂货店的商品那样包扎并以它们的客观现实提供消费。报纸以最完善的方式为我们这一代作好了准备和贡献，

它尽可能地以最快速度制造事实和思想、增添花样和分配，就像饭店厨房用一切办法和数量供应食品和饮料。”

特尼斯的愿望是公共舆论在有计划商品化过程中具体化的依赖关系能够尽快结束，他说：“公共舆论还没有冒险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它再也不敢拒绝它。”他希望大众教育的扩大和宣传工具的改革将会促使公众承认舆论形式民主化的必要性。自然，他所期待的“人类的共同提高”没有实现。在他的时代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地方，比较高层的集团无不对独立自主和政治上积极的公众的能力表示疑虑重重。这种疑虑类似早期的保守主义倾向反对启蒙主义。民主的公共生活被指责为虚伪的、动摇的和昙花一现的幻想。它非但没有成为国家必不可少的主要原则，反而被看作把国家引入歧途并且置它于连绵不断的动乱中。这种指责同时还起了替按官僚主义原则管理公共舆论辩护的作用。鉴于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当前秩序的稳定性造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正在篡夺权力和或许失去了理性的公众不断地被劝告不要超越消极的顺从。一切生活领域的非政治化被视为恢复民主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从此开始，公共事务更加安全和有效地受专业管理人员的领导，只不过偶尔受到据说没有能力领导独立自主生活的公众的牵制。抛弃所谓“全权公民”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

韦伯在为全民表决居于首位的民主政体所作的著名辩护中预测和概括了这些发展。他推断，在大众的民主政体的条件下，“公共舆论是共同行为，产生于非理性的‘思想感情’，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由政党领袖和报纸策划和指导的”。由于国家作用的扩大和官僚主义控制的必要性，全面非政治化已成为迫切需要，他说：“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选择他们信赖的人。接着，这个被选中的人说，‘好了，闭上你们的嘴，听我的’。人民和政党从此不再有干预领导者的事务的自由。”

为公共生活辩护：杜威论“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

这种为非政治化辩护的论点决不是没有争议的。除特尼斯外，其他几位评论家试图揭示公共生活中管理生产的独裁主义的潜势。可以这么说，这些评论家想挽救老资产阶级的公共生活原则并使之激进化，反过来用它反对衰老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这些尝试（从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批判到约翰·杜威对公共生活“黯然失色”的忧虑）构成了类似传统背景的东西，与此相对照，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近年来从理论上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所作的辩护了。在这里，可以对约翰·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1927) 这个有影响的实例略加剖析。立足于批判特尼斯，这部著作由于坚信各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常识的作用在于为统治阶层官僚政治的权力辩护，因此提出公共生活黯然失色的论点。杜威认为，这种常识利用被弄得迷惑不解而且已不再存在的公众。实现国家的议会制或代表制的资产阶级公众已经消失。不管它们以前如何真实，老的公民生活原则（例如那些体现在美国自治社团中的原则）已经过时。它们仅仅作为启应祷文供那些从事管理的人单调地背诵才有用处：“公众仿佛失落了；它肯定迷惑不解。政府、官员和他们的活动都清楚地同我们在一起。……政治……倾向于仅仅变成另一种‘买卖’：老板和机器的管理人员特别关心的事。”

公共生活黯然失色的征兆是多方面的，但是，它们决不是以显而易见的简单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杜威提到的征兆包括：对正式的政治大事的参与日趋减少；由雇用的宣传员制造的舆论激增；大企业有接近国家和媒体的特权；中央集权的机器似的政党得到发展；娱乐活动（出于政治考虑而设的有影响的娱乐服务）的数

量和花样空前增加，其价格之低廉也是没有先例的；在制订国家计划中科学技术专家的权威和作用日益增长，等等。杜威确信，在现代生活的初级阶段，这种公共生活黯然失色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政治活动的形式化和集中化是官僚主义化普遍控制日常生活的表现。大规模生产的趋向不再局限于工厂。现在许多人正确地意识到，"他们在巨大得无法理解和控制的力量的扫荡下受到了袭击。思想被窒息，行动被瘫痪"。

要求承认公共生活空前削弱不应该被解释为对过去黄金时代的悲叹。与实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后自由主义关于宣传的论述相反，杜威维护一种批判的和主张社会监督权力的老资产阶级理论的激进观点。他小心谨慎地说："这些公众"还没有这种观点。把他们变成一个更加真实的公众的和边际化的政治力量或"公众"（可惜杜威未详细阐述），必须鼓动和组织起来破坏现存的制度化权力形式。治疗患病的民主制度的灵丹妙药是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只要这些力量或公众把自己建成一个自我管理和多种成分的社会，对它的日常职能加以引导，并且分担它的效果，就有可能奏效。公共生活的恢复则必须有极端发达的"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作为它的先决条件。这个见解令人瞩目，因为它预示了后来对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杜威坚信：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取决于促进讨论、争辩以及交往的公民之间真正的一致等条件的极端发达。只有通过"交往和启迪"（暴力的对立面），当前"顺化的"非政治倾向才可能消除。杜威祈求一种基本的哲学人类学来支持这个观点。他只把自发的和互相联系的行为（那些目前无论如何还没有完全地发展的行为的一般化）同真实的行动区别开来。后者相当于"在分享的意义上渗透了共同利益并受其调节的"行动形式。行动能力是人类特有的。这种能力受到我们产生符号的能力的制约，通过这些符号，不朽的集体经验可以被传播、研究和任意地中断或者重新改造。根据这种本体论，杜威

通过维护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维护自由行动的可能性。他认为，公共生活必须含有这样的先决条件："面对面的联系"和通过提出或接受辩论使他们自己具有个性的公民得到发展的能力。公共生活借以鼓舞自己的是发扬"批判性的观念和有识别力的判断方法"，"打破思想感情上习以为常的惯癖"。公共舆论将首次成为那些积极地组成公众的人们所构成和接受的批判性判断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没有与此有关的问题的充分的"公开性"，那么，也就没有民主的公共生活可言。杜威的格言是：无论有多少障碍和限制，交往也同样限制和歪曲一个民主的和多边的公众的形成。

通过这个论点，杜威实现了对一个传统（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概念的彻底颠倒。虽然不再等同于与他人进行的权力斗争或者合法的地方组织的暴力手段，未来的政治必将成为——杜威暗示——公众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的同义词。这种自治可以经由公众自己的官员实施，这些官员是被指定来履行他们的职责，维护那些授权予他们的人们。这样，国家就变得同不断地被探索、调查和批判的公共机构的总体完全一样。由于政治生活的开放如此明确，"公正的国家"必将成为反政治空想的无稽之谈。就有关形式和内容的问题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被认为是最好的，除非它自己充分重视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和它的不断地自我改造。国家的形成必然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向历史创造的各种可能性敞开大门。

哈贝马斯：从不受干扰的自由到公开性

对于杜威为"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的可能性所作的辩护，无须进一步分析。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他的由于简练地评论特尼斯而增色的自治理论，目的仅在于突出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最新发展的轮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至少在讲德语的社会主义传统中，

对于这个发展惟一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于尔根·哈贝马斯所作出的。对于把眼光逐步深入到交往能力和被蓄意歪曲的交往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哈贝马斯的理论设计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由具有直接政治涵义的思考指导的。这些明显地堪与特尼斯和杜威的考虑相比拟的考虑，决不只局限于他的早期或晚期著作。他始终一贯地和惹人争议地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官僚制度的反政治倾向的严重威胁。从甚至早于他经典地论述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见《公众的结构变化》〔1962〕）的时候开始，到他近年关于交往的著作为止，哈贝马斯始终全神贯注于社会生活问题。出于对所有的活动领域中官僚机构的发展表示严厉谴责，他始终如一地为了后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著书立说，指出在该制度下，生活将完全根据最大限度分担责任和面对面地卷入、参与及民主监督的原则组织起来。

哈贝马斯仿效特尼斯和杜威，强调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共生活将成为官僚主义政府的目标。他也承认公共舆论的说服力往往与它的真实性成反比，因此真实的公共舆论并不单是实际存在的个人和群体的意见的总和。哈贝马斯还否认我们是"天生的"无感情、不让人知道和厌恶政治的人。当前，对于权力和政治的漠不关心；对于思考、批评和（在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中对于共同有关的事积极地）实施决议普遍地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说，不情愿）——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特点，在他看来，都只不过是官僚制度的严格管理和完全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一个暂时的和十分偶然的结果而已。如同在他之前的特尼斯和杜威，他始终坚信必须为"公开的和无拘束的讨论以及从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反官僚制度目标进行辩护。

可惜，哈贝马斯著作的几乎所有英译者都没能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关心其他次要的政治主题，却忘记哈贝马斯为非官僚制度化的合理性辩护早已见诸于他的50年代的早期著作。这些著作

显然是由论述必然的领域与不受干扰的自由(Musse)得以实现的领域之间的区别构成的(见论文四)。晚年的哈贝马斯仍然保持必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的区别,并且用较之特尼斯、杜威等人20年代的著作中颇为突出的主题更加鲜明的政治性主题予以修订。虽然劳动的艰辛和不自由同独立自主的自由领域的区别依然保持,但是独立自主的领域是用大不相同的论据详细阐明的。从《公众的结构变化》时期开始,这种观点的转变在许多著作中很为明显。从原文的内容来看,它透露哈贝马斯著作中的政治转向是在贾斯珀的"无限制交往"理论,特别是他的学生汉纳·阿伦特的特作直接影响下发展的。

通过建立在劳动—交往两重性基础上的两种发展模式的区别,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不再集中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和文化创造力的必要性问题。相反地,他认为,官僚机构的普遍发展是有目的地消灭一切真实的交往行动。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化过程是为了彻底垄断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并且从社会的劳动领域以外扑灭自由的和有目的的交往。回顾亚里士多德,他坚信有目的的、合理的和官僚政治的活动只能限于适当的"**有限的**"范围,即劳动的范围内。而政治生活的发展则必须超出官僚政治及其等级制的命令和服从的集中化关系的界线和规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反的民主政治则必须重申公民的传统目标,追求作为胜任的政治家(zöon politikon)的说话者和行动者的梦想。在政治领域中,或者像哈贝马斯所认为那样,无阶级的后现代社会将努力消灭"上面"和"下面"的范畴。原则上,隐藏在交往领域中的所有权力关系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任何或者所有说话的行动者推论的调查对象。

这个论点与杜威的论点有特别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新颖及其关键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发展了杜威的哲学人类学留下的仅有一点暗示。这个理论试图建立在哲学基

础上，从而使民主的公共生活观点具体化。在以往的十几年里，建立这种基础的企图已经通过所谓的一般语用学理论做过尝试，所谓的一般语用学的论点力求精心创造同一切交往行动的产生和再产生相符合的一般规则。考虑到这些论点的轨线，经常听到（至少是私下的）这样的说法：一般语用学理论同政治没有多大关联，这就不免使人有点惊讶。对待这些急躁和失望的论断必须极其审慎。的确，这里提到的哈贝马斯的看法，对这些论断仅表示部分同情。不管同意还是反对哈贝马斯的看法，本文其余部分承认这些论断的某些价值，无论如何没有否定他对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所作贡献的重要意义。据认为，他对公共生活可供选择模式的可贵倡导同改造的模式以及支持他的设计的(特别是最近阶段)抽象而又拘谨的论点是矛盾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作为这种矛盾的后果是，这种雄心勃勃和才华横溢的设计未能始终贯彻它自己的目的和政治涵义。

哈贝马斯对一般语用学理论的政治地位和涵义一直怀有矛盾心理，可以被看做这种矛盾的一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谦逊地告诫，不要把这种理论的初步成果当作一个实际已经成为现实的理想对待。他认为，对于一般语用学的要求必须在理论上和调查的层次上进行辩论，开始时不作任何特别的政治设计。一般语用学理论的意图在于对人类的能力作抽象的和有条理的一般性论述。它不是有直接政治意图的理论，当然更不是描述实际的或可能的生活方式。然而，哈贝马斯并不总是一贯地遵守这些防止误解的告诫，正是他在探讨中的这种矛盾心理（他同时地否定和承认它们具体的政治涵义）成为下面内在地批评他的关于交往的著作的出发点。例如，一般语用学理论通常被说成只对严格地受限制的和“情况清楚”的交往形式——说话和行动“一致”的形式——有关系，他进一步说，它的逻辑分析可以被积累地延伸到覆盖其他派生的行动形式，还可能包括公众的或政治

的行动本身。在另一处，例如，哈贝马斯在给阿佩尔的答复中，他抽象地正式提到“人类”以及他们对语言的依赖被推论为：我们注定要依赖“语言的非骗人的使用”，它的规则可以通过一般语用学的理论重新制订。

这样谈论人类的能力，就像每个成年人都能够运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谈论的一样，不能不增加人们的疑虑：哈贝马斯的考虑内在地是政治上的考虑。最后，由于他灵活地、有时漫不经心地把概念连同交往一起安排到他的政治告诫中去，或者反过来说，这种疑虑就更加深了。“推论的意志形态”、“摆脱统治束缚的交往”和“公开的和无拘束的讨论”正好是这些游移不定的概念中的三个概念；这些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和政治著作的界限之间任意地来回跨越，引起人们猜想他的理论设计是明显地受政治考虑指导的，虽然这些考虑被坚决地否定。另外，我认为一般语用学理论具有自我瘫痪的矛盾特征。这种理论不能实现它自己要求的政治诺言，所以需要自身的超越——趋向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理论。

关于一般的交往理论

重新批判地解释一般语用学理论及其要求（关于理想的语言状态、交往能力和思想方式，等等）必须在这个超然存在的策略中形成一个出发点。考虑到挽救陷于非政治化和过于形式主义的要求中的一般语用学理论，这种重新解释寄希望于这个理论的要求本身所引起的期望。这些推论在关于“语言的一般有效性基础”和能胜任地做出公开的说话行动所必需的一般能力的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个目的，哈贝马斯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语言行为理论的康德。他的一般语用学目的在于阐明支持或“预先构成”每个语言行为的基本对话要素的一般概念。哈贝马斯否认

我们说话和行动的逻辑是难以理解的，而只是因袭的或不折不扣地武断的。一般语用学理论企图概括出一个必然的和普遍的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是每个成年的说话者（不管他们的惯常语或方言或特定的历史背景怎样）都必须能胜任地掌握，如果他们参与可以理解的交往的话。

在试图这样概括时，哈贝马斯承认通过维特根施坦时代的普通语言哲学传统把重点置于语言运用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仍然坚持，必须超越那个折磨维特根施坦的语言游戏分析的著名的描写主义。交往行动的语言学方面的分析无疑必须包括特定背景下特定语言行为的动力，但是只能通过重新构造一般的和必然的因而是普遍的原则（即构成**全部**语言行为的原则）的途径。

哈贝马斯在进一步阐述这个主张时，提出一个关键的假设。他论证说，交往是一个依据有约束力的规则系统实现语言行为的问题，即使只是盲目的或者直觉的，我们**已经而且始终**遵循着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或先决条件同时又被用来引起或描述两种意识的交流。两种意识交流造成胜任的说话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理解。这些“无名的”先决条件（用塞尔的表达方式）是严格意义上的“基本规则”，它们不仅调节、而且创造或预先构成所有形式的交往行动。

就这个假设而言，根据阿佩尔的著作，哈贝马斯坚持认为，所有不间断或没有受到干扰的交往行动，不管它表面上的复杂性怎样，都无不以一连串互相联系的规则和要求为前提。这些所谓的有效性要求（Geltungsansprüche）构成了所有日常交往所依赖的幕后的一致（Hintergrundkonsesus）。这种根深蒂固和由规则构成的一致创造了人们进行交往行动的条件；它构成“人的运用能力”。“语言游戏”的所有参加者不仅经常而且始终（也就是说，**非自愿地**）认为，他们的交往行动是自觉地同这个一致及其一般规则相符合的。这些一致及其一般规则的存在反过来又能够被证明

是正确的，或者，通过不着边际的辩论被说成是有道理的。总之，交往已经（在有关的对话者之间）预先假定一个关于交往含意的默契。反之，交往行为则预先假定一些提醒注意交往中断（因为对话者设有实现所谓的有效性要求）可能性的方法。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基本要求可以分为4种：第一，说话者的语言能够被他人理解；第二，说话者企图交流的知识和陈述是"真实的"；第三，说话者一致同意他们确立的并在其界限内说话和行动的有关规范性的规则；最后，说话者是"可信的"，即说话时"表里一致"、因而是"值得信赖的"。关于这些对可理解性、真实、正直和准确性的要求，这里还可作较充分的分析。首先，交往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维持和不受干扰，即说话者相互建立关系（像承诺和宣告那样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和他们对话的内容是**可理解的**。当说话者说出的句子语法结构恰当，那么，这个易理解的句子就部分地完成了（如同乔姆斯基的语言运用能力理论所强调的那样）。然而，通过交往达成的一致不仅同样而且永远取决于在两种意识交流方面正确的或有意义的符号的安排，即取决于对于一系列符号意义有一个共同的和互相承认的认识。只有这两方面的理解都得到满足，对于说话者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才有可能从他们自己的同时也从他人的观点上认识符号的意义。没有这种"观点的交往"，说话者只能采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动物立场而淹没在难于理解的个人言语的整体中。

除了这种可理解性的设想外，交往者提出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其中的第二个要求是在和说话有关的范围内起作用的，是和被对象化了的背景与被提到的"这个"世界一致的。由于说话行动意味着谈论某事、某人或其他某些东西（即目前的事物总和，或者哈贝马斯有时称之为"外部世界"的东西），所有没有受到障碍的交往行动都取决于说话主体彼此互相承认他们交往的语言行动所建议的真实性。无疑，哈贝马斯反对奥斯汀认为4个有效性要求

都同建议的真实性有关系的意见。他坚持所有标准的语言行动都包含一个“稳定的”或建议的成分。所有持续的交往都意味着对话者通过对建议的句子的安排，分享和同意他们的认识，因为这些建议的句子真实地表现了事情实际存在的状况。

第三，没有障碍的交往意味着说话者之间已经存在一种真正的和相互承认的一致。所有不间断的交往都取决于所有参与者**能够**而且**已经**认识到规范性规则的适当或正确（Richtigkeit），他们的语言行动对这些规则起了一部分作用，并且根据这些规则，那些（推荐、承诺、阻止等等）行动被满意地和合法地组织起来。因此，构成交往行动的语言行为整体不应该被理解为孤立的、有目的的和合理的行动者的成功。所有成功地实现的交往行动总是意味着参与者的行动是符合某些规范的预期。这些行动意味着聆听者接受并进入说话者提出的“非议”，进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受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的“社交世界”。

第四，交往者总是猜想他们交往的语言行动达到了互相信任的状态。除了关于说话的可理解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假设外，所有未受阻碍的交往还取决于这样的假设，即说话者在表白他们自己时是可信的和真诚的（也就是暴露哈贝马斯所说的“特殊的内心世界”），因此聆听者给予他们以信任。而且当说话者认为他们已经按照“真诚的规则”采取行动时，交往才能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总之，所有交往行动者都推测，他们说话的真实性或准确性（Wahrhaftigkeit）是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在这些有效性要求的图式中有一个论点同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关系甚密，必须密切注意。在哈贝马斯最近的著作中，对有效性要求理论提出了也许是最新颖的见解，他说，在所有没有受到干扰的交往中，这一系列互相依存的有效性要求作为内在的标准起作用，与这种标准相对照，交往的可靠性要求即可被评价出

来。这些要求与事实相反地预期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尚未成为过去的事情：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哈贝马斯坚信，“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理解互相承认彼此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意义”。通过这个论点，他承认加达默的要求，即“深刻的共同一致（tiefes Einver-ständnis）”（转引自海德格尔），是所有交往相互作用的先决条件。这个基本的见解退回到了加达默的哲学保守主义。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共同认识（与说话者互相保证相一致）不可能像加达默的要求那样按照一种恒久的习惯传统（这种传统对其承受者施加很大的无可置疑的压力）来表述。确切地说，使所有的交往行动得以继续的保持一致带有深刻的政治的或公共的特征。交往行动已经而且总是以解放和政治的目的为前提，这个目的就是生活在一起并通过互相理解、分享知识、共同协调和互相信任而达成一致。虽然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事实上难得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所有进行交往的说话者和行动者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交往下去，仿佛他们处在一个真正的公共活动场所，他们的说话和行动是应该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所有不间断或者没有受到干扰的交往都以一个“理想的说话环境”为前提和预兆，在那里，“交往不仅不受外部的偶然影响的妨碍，而且不受由于交往本身结构造成的力量的妨碍”。

关于交往的能力

哈贝马斯通过理想的说话环境的论点，增强了他用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范畴（如公共讲演和活动）来反对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化的做法。至少，一般语用学理论的政治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了，因为哈贝马斯强调，理想的说话环境的原则——确信社会关系是能够建立的，只要“按照这样的原则：依靠摆脱了控制的交往达到的一致，一切有政治影响的规范的有效性是能够被确立

起来的”——在所有交往行动中是明确的。参与一种交往关系意味着有义务使一个人的说话明白易懂，为个人的主张提供有效的根据，以及有义务用值得信任的方法证明个人的价值。这就是说，自由地和胜任地参与由规则构成的交往的能力像过去一样，仍然体现在一个交往环境中所有说话和行动的人背后。与古尔德纳等人的意见相反，这种交往能力不应该被说成是一种“规范”；严格地说，甚至在作出用一种交往能力的理论重新构成和维护交往能力的尝试以前，交往能力就已经被预先假定和预料到了。因此交往能力具有（根据弗洛伊德的意思）一种虚幻的状态。由于一种温和而又不可抗拒的先验的必要性，这种能力无时无刻不在交往行动中被期待着。无意地介入别人的说话和行动意味着有意地介入双方同意并摆脱一切控制形式的说话和行动。“我们的第一句话”，哈贝马斯在他最早和最大胆的公式中说，“就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普遍的和不受约束的一致的意向。”这种意向虽不可被分析为从道德上考虑的调节原则（康德），也不可被分析为一个现存的经验主义现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起作用的有效虚构”，交往的参与者必须相互地和不可避免地互相推委。总之，所有交往行动假定，这种虚构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它有（在这里，哈贝马斯使用了拉斯克的语言）得到承认或公认的一定价值（Anerkennungswürdigkeit）。

作为对理想的说话原则的推断结果，哈贝马斯的一般语用学也许可以被看作意味着或暗示一种激进的政治见解：即关于交往能力，关于成年，关于个体化的和独立自主的公民在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为自己学会思考、说话和行动等等方面的见解。这里所指的见解，在他关于交往的早期著作和关于自我发展的最新著作中尤其明显。他设想中的交往能力取决于实现3个必要条件。首先，培养交往能力的企图必须依靠说话者之间发展有目的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必须有利于促进“对话角色不受限制的可交

换性”，这样就没有一个说话者（或者一群说话者）能够正当地垄断坚持己见、辩论和劝说的权力和手段。在真正的公共生活的条件下，个人和群体的说话和行动不应该在抽象地定义的或所谓绝对必要的意见和规范（如“国家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面前被合法地牺牲。真正的个人间的交往将取决于彼此承认的个人说话者的相互自我表现。

关于这种相互关系，哈贝马斯强调不应该把交往能力同乔姆斯基的语言运用能力概念混为一谈。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能力在于个人创造性地运用一个抽象的语言规则网络系统，人们借助这个网络正确地发出一连串言词。哈贝马斯对此正确地表示反对，他认为，乔姆斯基错误地假设这种“生成语法的”语言规则多少有点是天生就有的。个人创造和再创造这些规则被错误地假设为一个自说自话地展开的过程，这就是说，按照一个“交往的信息模式”展开。这就好像每一个发言者和聆听者已经是而且总是一个自为的实体——一个已经具有某些事前确立的语言规则的孤立的实体，根据这些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和意义，与其他个人的交往就成为可能了。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这个公式彻头彻尾地贬低了胜任的说话和行动的语用学和个人之间交流方面的价值。公众的交往能力不仅现在而且将永远取决于个人对于对话构成规则的实际掌握，以及他们的说话行动在个人之间交流的语言构成范围内的完成。这种个人之间交流的能力在不受干扰的交往条件下已经被预料到：“说话决不仅仅是一些句子。即使说话并不特意使语用学的关系成为说话的主体，由于说话不拘语法方式的力量（即由于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做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说话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相互理解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中。”

个人和群体的非同一性或独立自主是构成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第二个必要条件。由于被设想为说话者真正的个人之间的交流的发展，所以民主的公共生活不会与个性化过程相矛盾。按照哈贝

马斯的看法，个性化只有处在或者通过公共生活的真正的民主过程才可能获得发展。这种个性化决不像乔姆斯基等人假设的那样——是“本体论所赋予的”。尽管个性化在性心理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开始了，但只有通过公众的说话者之间微妙的“既亲近又疏远”的相互作用的发展**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含有和黑格尔的“吵架的情人”这个著名模式中同样的悖论（见论文四）。哈贝马斯暗示，个人可以通过在他人中认出自己来表明他们不同于他人。因此，个性化的先决条件是主体识别他们内在的、秘密的和外在的公共社会（和坚持它们之间的区别）的日益提高的个人能力。在他们公开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同其他人之间不可侵犯的距离，即使他们依靠他人并同他人相互影响，已经同他人结合在一种微妙的和以语言为中介的亲密关系中。这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辩证法也可能在不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层次上起作用。一个民主的公共社会只能被设想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即一个在社区环境中个性化和群体的多样化日益增长的社会。因此，哈贝马斯心中的民主的公共生活模式承认不存在生活将变得自由、舒适和没有分歧的幻想的未来。他推测未来的公共生活将公开地使——实际是鼓励——群体多元化和政治上的不一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真正敌人将不是特殊性——对抗的主张、政治上的争吵和辩论——的存在，而是否认特殊性的合法性。

从相互作用和个性化作为公共生活的两个必要条件的含义中可以推论出第三个必要条件：无拘束的批判性讨论。摆脱了来自上面的任何形式的官方评价，在真正的公共生活条件下的讨论就不会受到拘束。任何教条主义地决定的或者多数派的意见都不可能永远地避免成为公众辩论和批判的对象。政治空间是可以创造的，在那里，通过持续的和不受拘束的或强迫的辩论，公众中的少数派意见可能得到政治社会中更多人的承认。显而易见，这种

无拘束的交往将取决于说话者是否有获得可利用的交往手段的平等机会。(无疑还取决于彻底改造当前可利用的交往手段，虽然哈贝马斯没有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参与者才有可能“在同一个水平上”讨论他们的需要，提出粉碎普遍真理的要求的假设，并且通过进一步质问、回答、要求、推荐和允诺等等，使这种交往永久存在。这将意味着在(类似)打破一致的情况下，公民的能力暂停活动，为的是转入“对话”(哈贝马斯这样称呼它)，即转入从组织和行动的拘束下摆脱出来进行思考。

通过这种旨在达成一致的对话，公众的讨论通过交流事态的发展和交流交往的情况，能够充分地利用语言行动的“双重结构”。依靠东拉西扯的争论，主体迄今为止被压抑的或受外界支配的需要和原则可以互相重新解释和起作用。社会和政治原则的有效性将不再取决于掌握这些原则的群体和个人已经确立的权威。强加的规范必须区别于原则上可以从讨论中证明为正确的规范；从交往能力这方面讲，规范是可以“被规范”的。只有在这种不受限制地讨论的条件下，平等对待现存的政治上的一致和同真正的一致进行无须使用暴力而达到的妥协，才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公共生活必须根据合理的语言原则构成。根据这个原则，或者像哈贝马斯所暗示的那样，判断和观察事实的真理与公众的一致是同义词，这种公众的一致是通过无拘束的和不断地更新的交往(经常是有争论的)才得到保证的。这个公式和阿伦特的古典派论点是矛盾的，这个论点认为，老实话是反政治的，因此公共生活严格地说来属于坚持己见的一致和同意的范围。尼采认为真理同僵化的老隐喻永远是一回事的观点也同样受到断然的驳斥。与纯粹的舆论和老隐喻相反，所谓一致的真理的理论坚持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作出决定的人的能力和达成一致的条件，言语的有效性(以及它们要求的建议性真理、规范的适宜性和诚实)是不可能被决定的。总之，任何通过政治谈判达成的一致不可能被决定，

如果不考虑一切交往借以建立的有效性要求是否实现的话。反之，公共舆论应该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它是根据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3个条件达到目的（并且可以进一步更新）的话，因为这些条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个性化的、平等的和有交往能力的公民之间批判性的和非强迫的辩论。

被有目的地歪曲的交往

从哈贝马斯最初提出一般语用学理论之时起，他无疑就敏锐地意识到许多机制有压制和掩盖公众的交往能力的作用。但是，他从未设想过苏格拉底的交往模式是无处不在或随时都可能存在的。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交往模式同样是行使假妥协和暴力的场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完全不应该被说成是（真正的）交往。的确，以前任何一个社会都从未经历过合理的言语原则下的一致。迄今所有现存的社会（包括那些现代社会中以普遍民主自诩的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有目的地歪曲交往和为战胜这种压抑而斗争的历史。无论哪个已知的社会形态都表明企图曲解在政治上说话和行动的普遍能力，通过扭曲地分配国家和社会的权力、财产和交往能力来抑制可能的冲突。

哈贝马斯为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所作的辩护与这些权力主义的倾向相对立。与过去相联系，一般语用学意味着必须驱散权力主义对于当今时代仿佛天生的控制。这些倾向的教条主义的真理要求必须受到批判，而重要的洞察力则可以保留。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直接有关的是，一般语用学理论也责成自己区别一种强加的“实际上得到实现的一致”和一种没有欺诈的、真正的或者“合理的一致”。因此，它承认特尼斯论点的实质，即公共舆论必须经常地被怀疑，以及这种舆论的说服力往往与它的真实性成反比。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一致和实际的一致之间的这种根本区

别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交往本身所固有的无拘束的说话和行动所允诺的东西对于实际上实现的一致的虚假起衡量其程度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哈贝马斯援引了审判的比喻。交往能力的观念被当作一个“评价法庭（Bewertungsinstanz）”，在这个法庭上，所有现存的一致都可以就有关它们要求成为有保证的一致而被提交审讯。真正的舆论不是必然地等于实际存在的舆论；它和所有人的独立自主的舆论以及没有人考虑过的舆论并不完全相同。说话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一致并没有像最近关于权力和利益的理论中声称的那样具有最后的决定性。

哈贝马斯承认两种形式的一致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且推论，虚假或不真实的一致至少可能被两种相互联系的过程引发：说话者的权力主义的权力关系的内在化（例如，通过家庭监督他们的性心理的发展）和对话的可能性在国家、阶级、地区、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衡分布。在这种导致误解和欺诈的情况下，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不可能设想在流行的权力分配上可能有任何有利于理性的一致。任何虚假地造成的一致都在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的常常不言而喻的逻辑中发现它的局限性和“他性”。因此，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给它的敌人取名：被有目的地歪曲的交往。哈贝马斯毫不含糊地援引并维护沃尔特·本杰明讥讽的告诫：“悲观主义出现在各个方面。确实如此……但最主要的是，对阶级、国家和个人中间达成的一切相互理解表示不信任，不信任，不信任。而只对I.G.法本和爱好和平的空中武器（Luftwaffe）的完善表示无限的信任。”

在这种告诫的引导下，哈贝马斯谈到被歪曲的交往与潜在的自由地说话和行动的人被残害和吓哑相类似。这种对公众的交往能力的破坏可能采取两种在分类上互相联系的方式中的任一种方式。如果发生心理性的扭曲，那么，交往行动的破坏就是说话行动本身组织的缺陷造成的。这些心理上的扭曲（弗洛伊德曾分析过，哈贝马斯毫不含糊地加以引用）看来似乎来源于幼童的痛苦

经历和他想尽量忘掉它的无意识动机。典型的是，这第一类被扭曲的交往表现出行动者的说话和他们的行动举止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未受干扰的交往相对一致的结构瓦解了：说话、行动和身体的姿态变得彼此互不相关了。除此之外，心理上被扭曲的交往可以用它们明显地违反被认为有约束力的或传统的说话方式来描述。缺乏语法上的意义或反义词的利用（以及传统上不能共存的意义的特殊混合）也许可以作为这种违反的例证。最后，心理上被扭曲的交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不由自主的重复和僵化。未受干扰的交往惯常的反思行为退化为周期性发生的刻板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往往意外地受到外部刺激的催化。精神病患者的日常生活被某些陈旧的“古代符号”以及由自主的狂想和充满情感的形象所占领。因此精神病患者不可能轻易地把他们秘密地对于古代符号的固恋同他们公开表露的说话、行动和身体姿态割裂开来。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心理上被扭曲的交往必须和第二种被歪曲的交往方式（即假交往）有分析地区别开来。与心理上的交往截然不同，假交往方式中病态的失调或障碍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形态。说话者不承认这些失调危害他们的主观性本身。交往无形地表现出“未被承认的依赖性”。说话者为他们以为已经通过充分交流的谈判达到真正一致的幻想而苦恼，同时使相互误解和自我误解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说话的有效性要求被天真地设想出来，尽管事实上一直没有实现过。在这种自愿受奴役的情况下，“参与者不承认任何交往的失调。假交往产生一系列相互误解，因为假一致的伪装，相互误解本身也未被承认”。

政治行动是灵丹妙药？

被歪曲的交往的这种类型学的分界线显然是不完善的。例如，有目的地显示武力或恐怖所造成的沉默的假一致仍然未经分析。

不过这种起刺激作用的类型学仍然引起一系列有关它的政治和策略涵义的问题。哪些形式的政治生活和策略——我们被促使提问——最适宜于培养懂得强加的一致和真正的一致是不一样的意识？哪些政治策略和组织最有助于捍卫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总之，被统治的人们怎样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很清楚，哈贝马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坚决地反驳所有为前卫主义策略的合法性和效验所作的辩护。这种反驳——不妥协地针对卢卡奇和含蓄地针对源于柏拉图时代的历史悠久并备受尊敬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是直接利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实践的知识和谨慎的政治行动的理论（参见论文四）。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始终接受对于政治行动的潜力和可能的后果的预见和心中有数的指导。然而，这种“应该做什么”的知识不能被掌握或者当作艺术和科学的知识来运用。在政治上有能力不等于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什么是对公众有益的。政治行动不可能包括全部历史，把一切问题结合成一个整体，然后愉快地引导自己走向未来，而这个未来已经被写入今天的篇章，在那里，一切问题将得到干净利落的解决。政治行动不应该奉承它自己有能力直接掌握一切，因为这是自我虚构过程中的危险行为。哈贝马斯强调：

> 考虑到制度（这需要从理论上解释）和可以避免的镇压与痛苦所引起的冲突，解放的企图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不无道理地作为实际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需要提出来。但是这种企图同时也是检验；它检验“人类天性”可能发生变化的限度，尤其是动机的构成在历史上可变化的限度，那些我们对之缺乏理论知识以及在我看来原则上无法掌握的限度。如果在对这种“实际的假设”进行检验时，我们——有关的主体——本身也被包含于试验计划中，那么，试验者和

> 主体之间也就没有屏障可树。相反，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有机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样，他们就必须不着边际地形成一个共同的意志。

根据这种强迫的观点，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是以说话者**自我卷入**特殊的政治行动为条件的。成为特殊的政治行动只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种通过讨论、冒险和特殊的权力地位来发挥的判断能力。因此，任何企图通过依靠有目的的—理性的官僚手段维护公共生活的运动都意味着自我矛盾。哈贝马斯宣称，这种自我矛盾在卢卡奇的“政党是理论和实践的媒介”的传统公式中十分明显。这个公式不仅把理论上的陈述人为地剪裁成所谓有组织的和策略的行动规则（“纯粹的理论”被看作“机会主义的明证”）；被压迫者（即无产阶级，卢卡奇坚持认为，他们决不应该遭受“一场可怕的内在的思想意识危机的损害”）的启蒙过程也不得不服从政党领袖狡猾的计划。哈贝马斯断然反对这种公式。政治教育家被其他人豁免上政治教育课也不可能没有某些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影响就被断定为特定的、必需的和令人满意的。他明白表示，在反对被扭曲的交往和假交往的斗争中，对结果的判断必须取决于有关的参与者实事求是的讨论。

在他对交往理论进行讨论的初期，他至少是联系某些心理分析的方法论来详细阐述这个论点的。的确，哈贝马斯对于弗洛伊德最早的兴趣集中于密切利希关于现代家长制资产阶级权力衰落这个论点的涵义上。后来哈贝马斯开始信奉艾尔弗雷德·洛伦茨：他把精神分析治疗的情境解释为分析被扭曲的交往的模式，甚至含蓄地解释为策略的范例，通过这种策略，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将会在政治上得到实现。精神分析治疗被理解为根据理想的言语情境规定的原则构成的一个批判的和解放的解释性理解模式。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背景的理解”形式，一

种“深刻的释经学的（Tiefenhermeneutik）”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未来取向的回忆粉碎利用过去压抑今天的权力。精神分析疗法和为了真正的个人间交流而进行以理论为媒介的政治斗争一样，谋求批判被扭曲的交往（从而促使患者从被扭曲的交往中解放出来）；精神分析谋求通过有步骤地依靠自省的“具体化”或者根据讨论来实现这个目标。精神分析是一种语言分析，它旨在限制“无意识地被引起的行动”，扩大个人间交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主体能够自由地和有步骤地自我询问和相互询问。

在这种场合下，无须过于关注精神分析的历史和有争论的具体细节。按照哈贝马斯早期的观点，关键是精神分析家和患者的关系原则上恰好同对话者之间在为公共生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得到的联系相似。分析家和政治活动家一样，力求把他人被扭曲的反应理解为意味深长的（甚至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与此同时，分析家和活动家都打算相应地改变他人自我解释的说话行动。哈贝马斯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相似之处。在启蒙过程中，批判的交往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适用于为真正的非欺骗性交流的可能性辩护。这些理论都力求批判地询问这种交流的接受人，教促他们自我反省理论本身要求的有效性以及在控制和权力的关系中理论本身的束缚。换言之，这两种理论陈述都力求发动批判的反省过程，催化主体通过自由和有目的的交往**自己解放自己**。

援引精神分析作为批判被歪曲的交往的范例，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两种反对意见。这两种反对意见（现在哈贝马斯对此已有所认识，但对于它们的含义，他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产生于强烈的怀疑，即怀疑他把精神分析治疗的情境与激进的政治行动等量齐观，一开始就严重地误入歧途。首先，哈贝马斯自己批判弗洛伊德的唯科学主义时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治疗的情境是以专业的权威和分析家的鉴定作为前提的。姑且承认，弗洛伊德的先验图式坚认，患者对于这种权威的最初敬意出自“自愿地”行

使的意志。其次，精神分析的要求的有效性过程同哈贝马斯提出的真理的一致理论看来是不矛盾的：归根结底，分析的对象是各种权威，因此它们自己必须肯定（或者否定）分析家的假设，也许甚至用它们自己的自我理解来补充这些假设。最后，精神分析家必须克制自己，不对患者未来的行动提出任何建议。这些都必须由患者自己决定。

尽管有这些防止误解的告诫，规定的治疗对话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奇特的独白。开始时，正如哈贝马斯后来承认的，治疗对话中的伙伴决不是平等的。他们的位置也不是可以互换的。精神分析对话使患者处于一个（相对于分析家而言）基本上不利的位置。患者被假定迄今为止还不能进入一种真正的交流关系。这种能力起码要通过一个成功的疗程才能获得。因此，分析家给予启发；而患者只能为他们自己企求启发。精神分析的有效性要求决不可让分析对象有所怀疑。这些要求至少在开始时构成了论证(相互作用在此范围内进行)的无可更改和毋庸置疑的条件。因此，分析家是真正有洞察力而且能够提出真正的自然科学假设的特殊人物，而这种假设能够被证明为公认的“规律”知识。这种知识充其量可能被患者否定，但也只能通过更换分析家或者完全断绝咨询。这一点对于哈贝马斯为政治上的启蒙而提出的深谋远虑和非前卫主义的建议有深刻的含义。这些建议强调，在政治上暴露和消除有目的地扭曲交往的过程可以和精神分析对话相比拟，却不知不觉地隐藏着一种教条主义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哈贝马斯用精神治疗作为审慎的政治行动的一个范例包含着另一难点。盖格和加达默等人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按照他们并非没有根据的观点，哈贝马斯在精神分析方面博学多闻的政治性意见严重地低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富裕的、有权势的和有声望的人们通常谋求窒息、占有或者凶暴地镇压政治对话的种种措施。在交往方面采取治疗模式消除虚伪的一致的政治任务

就不免要迷恋改良主义的幻想：光是论证的论证力量就足以约束和说服现存的官僚机构的司令官。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假设直接的根源在于对治疗法和政治作了使人误解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使人误解恰恰因为在治疗的情况下，患者的不适感和求治愿望符合他们与分析家的约定“存在的理由”。而在政治斗争中，这种为达成某种理解的优先定向是不可设想的。交往行动充其量只可能存在于被压迫群体的内部和之间。那些统治者和那些争取从以专业方式组织起来的官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对抗、妥协和掩饰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正如马基雅维里在现代社会开始时就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是正常现象。另外，哈贝马斯在承认这种关键的见解时不得不危及他自己的论证。那惟一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被歪曲的交往和通过由理论指导的民主和政治斗争排除这种被歪曲的交往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精神分析模式作出充分分析的。

意识形态问题

可以说，这种对哈贝马斯早期保证精神分析法是一种政治斗争模式的尝试的内在限制，当时是用另一个难点来解决的。第二种限制源于他相当短暂而后来放弃的解释关于假交往机制的理论的尝试。这种十分接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假交往理论，旨在（不受任何极权主义影响地）揭露和批判那些掩盖交往能力的可能性和某些说话的行动者奴隶般依赖其他行动者的过程。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形态上来讲，被扭曲的交往起到掩盖统治和暴力之间的制度化关系的作用。在假交往和互相认可的信仰（如对父权制的仁慈和专业人员的功效的信仰）的霸权下，这种统治变得与世隔绝，以抵御个人和社会的质询。关于例行的或正常的日常生活交往的元信息传递从而被阻断。真正的意见一致和相互承

担义务的形成(其可能性是假定在不断的交往行动中被设定的)被中断，甚至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对交往的扭曲是非常荒唐的。一方面，阻碍自由和有序地交往的意识形态“认为彼此推卸责任是一种虚构”。说话的行动者关于他们的交往和这种交往（对可理解性、真实性、适当和诚实）的有效性要求相一致的设想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对真正的交往的意识形态障碍适用于平息预先假定的有效性要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实际存在的交往在其发起人和参与者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和合法的。意识形态从而“强化对合法性的信仰，这种合法性（保持有效性要求得到满足的）虚构并防止其被揭露”。哈贝马斯认为，在正式法律、商品化等价交换和公共领域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这种荒唐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了作为自由平等的主体的成就并因此从个人化形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兴现代世界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常以自己科学的和普遍有效的要求的名义批判过去，从根本上削弱了神话、形而上学和习惯礼仪等体系的客观极权主义力量。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观主义反过来又加强了资产阶级使被剥削者自愿受奴役的能力。资产阶级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公众的利益(pro bono publico)，试图统治而看上去不像统治。

由于用这种方式提出假交往的问题，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论述初看起来似乎十分可信。这种尝试性综合的新颖之处和启发性也为（阿多尔诺等人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现象属于历史运动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然而，这种综合是否有理还很不肯定。这种不肯定性产生于一个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哈贝马斯最近的著作中还没有得到解答。这个问题是：能不能有效地综合一般语用学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哈贝马斯关于意识形态交流的描述中有许多模棱两可

和混淆不清之处而引起的，这些模棱两可和混淆不清之处意味着，在他概述假交往理论的尝试中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难题。这些缺点包括，第一，往往缺乏自信和总是不光明正大地涉及意识形态范畴（例如在关于“盲目崇拜科学的呆板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论点中）；第二，有时使概念具有过多不合时代的含义（例如在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的讨论中，或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通过意识形态发生”演变的更一般的主张中）；第三，在最近关于一般语用学理论的阐述中实际上放弃了意识形态概念。可以说，这些模棱两可和混淆不清之处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令人感兴趣的和没有政治含义的，实际上意味着一般语用学理论和马克思的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案之间的两种关键的、迄今未曾解决的二律背反。可以说，这两种二律背反从一开始就强有力地阻碍了哈贝马斯进一步详尽阐述假交往的问题及其破坏因素，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理论来说依然十分重要。

首先而且更明显的是，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认识论地位和哈贝马斯上述对前卫主义的拒绝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矛盾。这种二律背反是哈贝马斯自己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中发现的。他在这篇论文中告诫说，由于其唯科学主义前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大概需要重建，如果要保留它对批判性社会分析的功用的话。他在批评马克思认为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案时一再重复这一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被当作意识形态批判和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工具主义含义来详尽阐述的一种人文科学的确切含义。”

哈贝马斯后来在讨论假交往问题时不再提到这个结论。他忽视了这样一点：马克思为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革命——这种革命被认为是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形式的真正基础——所作的辩护从逻辑上来说是与这种科学自我误解为一种自然科学联系在一

起的。因此，与它自己的决心相反，批判假交往的方案形成了某种像心照不宣地与唯科学主义结成的联盟那样的东西；应该补充一点，这是一种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早详尽阐述直到最近的修改（例如阿尔都塞的修改）一直纠缠着它的唯科学主义。

第二个难题强化了假交往理论中的这种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产生于这样的事实：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之谜的解答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清除了符号表象的物质活动领域。尽管阿尔都塞的方案有自己的唯科学主义，但是它提醒我们注意早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形而上学的先决条件。阿尔都塞的见解的范围确实可以扩大，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从培根的时代起就一直受到它自己虚幻地相信存在着一种摆脱了符号的确实可信的现实的影响。在这种传统中，意识形态一直被理解成一种对物质生活过程的潜在现实的歪曲。物质生活过程被解释成意识形态的交流前起点，这个起点也是与意识形态的虚假的不存在相矛盾的真理的起点。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与这种推理决裂，这一点在培根的信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培根认为，从理论家们（Idéologues）致力于揭示一切意识的根源到盖格实证主义地指责意识形态是很容易遭到经验检验技术驳斥的纯粹玄想，言语和陈述阻碍着理解并使人类陷入混乱之中。

与这些习惯相一致，马克思对各种表象的起源的根源的探索以接受一个外在于符号交流的起源的神话告终。他用罗马的卡科斯的神话说明这种百折不挠地通过“暗箱（camera obscura）”模式来识别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的热情。按照这种模式，资产阶级虚伪地、颠倒黑白地把自己说成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可以被比作卡科斯的诡计。卡科斯设法把他偷来的牛藏在他的洞穴后部，使之看起来好像这些牛已经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也建议背叛符号的规则。“实际存在的世界”与人类所说的、想象的或设想的东西形成对照，与“这个世界的空话”形成对照。

唯物史观在依赖这种区别时“科学地”通过求助于前者的逻辑来说明前者。符号的形成和假独立由于涉及到上下左右的物质实践本身而被揭露并得到解释。这个时代的幻想据说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人类按照劳动分工和阶级斗争来创造自己满足需要的手段和社会政治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从确切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诞生的逻辑、上升到统治地位和衰落时时处处都感到原始限定的劳动分工的重担。因此，被颠倒的现实的表象可以追溯到“真正有活力的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的颠倒和自相矛盾。反过来说，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除在被统治者嘴上和心里流行的空话。解放是一种实践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内心的或推论的行为。

由于依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哈贝马斯的假交往理论不知不觉地使自己背上了形而上学假设的包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潜在现实的“面具”，这种现实可以被一切变化莫测的符号密度所净化。至少在一种情况下（即在他早期对加达默的评论中），哈贝马斯实际上明确地接受了这种假设。应该承认，这种对加达默的“语言学研究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正确地把语言交流设想为一种“元制度”。交往被看成是所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所依赖的基础。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社会行为只在平常的语言交流中构成”。奇怪的是，这种说法立即被马克思关于语言的传统描述诋毁为一种范围有限的思想运动，一种脱离了日常生产现实的上层建筑。哈贝马斯认为，特定的语言交流方式不仅潜藏着欺骗(Täuschungen)；语言本身也常常骗人。“语言也是意识形态”，因为它能掩盖或掩饰某些在语言“背后”起作用的对现实的限制(Realitätszwängen)。这些限制（例如改变生产方式）也以在任何社会形态内部用符号传播和主体间共享的意义类型“自下而上”地影响着革命。

哈贝马斯接受这种改头换面的基础——上层建筑的说法引起

一种独一无二的反对意见：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掩盖”功能的描述并不充分承认文化——包括生产力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在历史上是多变的、是通过一定的符号图式构成的或多或少是有意义的主客体顺序。“物质的生活过程”决不与生产的语用学相连，因为两者都不能避免符号的调停。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传统描述在这个方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行为者自身涉及其他主体和客体的受符号调停的经验不能被理解为（用施密特的话来说）仅仅是“人类劳动处境的客观逻辑”的一种转化。应该否认，符号与行为的条件必定是同性质的，两者在物质的实用性中有着共同的根源。哈贝马斯的著作承诺过但一直没有完成的重建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应该完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前提，而且应该指出，处于适当位置或“已经形成的”主体的生产和用符号为媒介的交往关系不能被设想为任何社会形态的一个层次或一个方面。这种交往是和由符号为媒介的活动本身一起扩大的。自然界或社会的每一种经验通过生产、再生产和符号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关系——甚至劳动过程本身——是由一个在这个象征性地组织起来的推论领域之外或之下的阿基米德支点形成的（见论文六）。

假设的和抽象的主体

本文关于哈贝马斯的一般语用学的政治涵义的讨论迄今已经提出，一般语用学理论被两个概念上的问题所削弱：第一，它信赖精神分析疗法和公共的政治行动之间不恰当的类比。第二，一般语用学理论的前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论点不一致。哈贝马斯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些难点只够威胁到他的设计的政治涵义，特别是考虑到与此同时由于另外两个问题，使得难点增多而且更加严重。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

在刚分析过的难点的压力下，一般语用学理论首先不得不越来越延缓考虑变形的交往问题。当然，哈贝马斯不会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有目的地扭曲的交往。他也不会不意识到现存的交往模式中的有组织的欺骗、公开的和隐蔽的倾轧以及战略行动——这些，他统称之为“阴暗面”。此外，他也不会不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胜任地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舞台似的、危机四伏和极端危险的个体发育过程的结果，是一个以认识、语言和性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的结果。但是，在上述难点的影响下，一个有交往能力的公众的思想——它的实现交往理论的可能性开始时旨在为它自己辩护——仍然被当作与它有关的交往行动的一般的和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的前提来处置。在认为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正在受到尊重的一般信念（含蓄地或明确地）指导下的交往行动被当作仿佛是交往和战略行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一般语用学于是在理论上给予一致的行动和交往以特权，在这行动和交往中，说话者们已经在相互承认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将依据4个有效性要求相互作用）方面合作。因此，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假设存在胜任的说话者和行动者，他们①已经明确同意合作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性；②已经能够区别他们说话的行动性（即不合语法的）和建议性方面的不同；③已经共同使用一种传统因而也共同使用一个关于他们处境的共同定义。

哈贝马斯的确经常否认这个假设恢复了康德关于假设的和先验的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被去掉一切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它的一般客体概念的超验知识完成一定的结合。这种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他声称已经克服形式的和先验的调查与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传统的分离相反，一般语用学的研究大纲明显地重申一个令人误解的二元论：介乎假设的胜任的公众说话者的先验知识和非先验知识之间；而非先验知识只有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说话